

R U S S I A N S T U D I E S

俄羅斯研究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6年 第2期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目 录

专论·中俄教育年

- 3 阿纳托利·托尔库诺夫 / 论中俄教育年
与中俄关系

大国关系

- 5 杨洁勉 / 中俄美国际战略互动和全球治
理体系建设

国际组织

- 24 邓 浩 / 非西方视角下的上合组织：治
理绩效、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

国别与区域研究

- 48 德米特里·叶夫列缅科 / 俄乌冲突后俄
罗斯政治研究中欧亚主义视角的当
前问题与发展前景
- 67 崔 珩 付兴旻 / 俄罗斯“转向东方 2.0”
与“一带一路”的互动合作前景
- 91 张家郡 毕洪业 / 大国地缘博弈下南高
加索三国的战略调适：供给赤字与
秩序重组
- 121 张泽明 / 美国运筹赞格祖尔的政治逻辑
——走廊治理的制度嵌入与权力重组

146 俄文摘要

154 英文摘要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刘 军

副 主 编：陈大维 肖辉忠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6 年 4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6 年第 2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А. В. Торкунов

О Годах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3)

Ян Цземян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Китая, России и США и построение глоб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5)

Дэн Хао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не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управления, текущие вызовы и пути оптимизации (24)

Д. В. Ефременко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48)

Цуй Хэн, Фу Синъян

«Поворот России на Восток 2.0»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рамках инициативы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 (67)

Чжан Цзяцзюнь, Би Хунъ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и в странах Юж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в условиях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дефицит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и реструктуризация порядка (91)

Чжан Цзэмин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логика стратегии США в Зангезуре: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закрепление и реструктуризация власти в управлении коридором (121)

Аннотации (146)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6 年第 2 期 (双月刊)

Contents

A. V. Torkunov

On the China-Russia Year of Education and China-Russia Relations: to Readers of *Russian Studies* (3)

Yang Jiemian

China-Russia-U.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Interaction and the Building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5)

Deng Hao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from a Non-Western Perspectiv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Paths for Optimization (24)

D. V. Efrementko

Current Issues and Prospects of the Eurasianist Perspective in Russian Political Studies after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48)

Cui Heng, Fu Xinyang

Russia's "Pivot to the East 2.0" and Prospects for its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67)

Zhang Jiajun, Bi Hongye

Strategic Adjustments of the Three South Caucasus States amid Great-Power Geopolitical Rivalry: Supply Deficits and Order Restructuring (91)

Zhang Zeming

The Political Logic of U.S. Maneuvering over Zangezur: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and Power Reconfiguration in Corridor Governance (121)

Abstracts (154)

专论·中俄教育年

论中俄教育年与中俄关系

阿纳托利·托尔库诺夫*

亲爱的朋友们！

根据中俄两国元首的决定，2026年至2027年被确定为“中俄教育年”。这是一项重要且及时的倡议，深刻体现了两国间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与政治互信。中俄关系植根于睦邻友好与相互尊重的对话传统，已成为当今欧亚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两国的互动中，人文领域的交流占据着独特的地位，而高等院校在其中肩负着特殊的使命。目前，在俄罗斯高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已经超过5.6万名，同时有超过2.1万名俄罗斯留学生在我国高校深造。且这一规模保持着连年增长的态势。

对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而言，发展与中国教育及科学研究中心的伙伴关系是学校国际交往的关键方向之一。多年来，我校一直与中国顶尖高校保持着稳固的联系，积极开展联合培养项目、科研项目合作及学生交换计划。俄罗斯青年对中国、汉语学习、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兴趣日益浓厚。据我所知，中国青年对俄罗斯的兴趣亦与日俱增。这种互动正在培养新一代专家，他们深刻了解两国的历史与文化，能够为双边合作关系的发展作出贡献。

尤其令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珍视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访问俄罗斯期间对于与我校师生会面的重视。我们由衷地珍视这种开放的学术对话传统。对我校而言，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莫斯科国立国际

* 阿纳托利·托尔库诺夫 (А. В. Торкунов)，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关系学院并发表演讲，具有里程碑意义，那是他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后首次出国进行国事访问。^①他那场关于共同发展与和平未来理念的内容丰富的演讲，成为令我校师生深受鼓舞的难忘时刻。这样的会晤长久地留在了我校毕业生们的记忆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如今活跃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在各自的事业中继续为深化两国间的专业纽带与人文联系贡献力量。

我相信，“中俄教育年”将为两国学术合作的发展、科研交往与人文交流的拓展注入新的动力。秉持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对话精神，中俄两国高校将一如既往，为巩固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重要贡献。

（翻 译 崔雯怡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后，
太平洋国立大学亚洲与北极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责任编辑 宋羽竹）

① 2013 年 3 月 23 日，正在俄罗斯联邦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了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习近平在演讲中深入阐述了中国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和对国际关系的立场主张，呼吁各国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参见“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24 日第 1 版；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2013 年 3 月 23 日，莫斯科）”，《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24 日第 2 版。

大国关系

中俄美国际战略互动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

杨洁勉*

【内容提要】中国、俄罗斯、美国立足于冷战后国际战略态势的演变，通过在军事安全、经济科技、全球治理领域的战略互动，深刻塑造了全球治理体系的现状并影响着未来体系的构建方向。当前国际格局的特征是：多极化趋势加速，大国博弈表现为高强度、低冲突，经济科技成为竞争的主要领域，全球治理赤字持续扩大。中俄美对该态势的评估与应对各有侧重：中国内外兼修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俄罗斯强调军事威慑并拓展多元外交，美国则以“美国优先”奉行选择性霸权。三国战略互动围绕单极与多极之争展开，呈现斗而不破、争中有合的特点，其博弈在欧洲、亚太、拉美、非洲产生不同的辐射与反弹效应。在全球治理层面，三国理念与谋划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主张“先立后破”的包容性多边治理，俄美则坚持“先破后立”，且美国侧重霸权维护，而俄罗斯聚焦打破西方霸权。短期内三国将各展其长并探索非零和合作，中期或形成“战略竞争对手+有限合作伙伴”关系，长期则需依托多极化定型与全球南方崛起，凝聚全球合力，才能构建起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关键词】中俄美战略互动 全球治理体系 大国博弈 全球战略格局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2-0005(19)

中国、俄罗斯、美国三个大国对全球战略格局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正在深刻重塑国际秩序的底层逻辑，并左右着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方向。本文以当前最新国际战略态势和国际格局变化为切入点，解析三国在军事安全、

*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

经济科技、全球治理领域的互动和联动方式，揭示国际格局从“单极主导”向“多极相持”转型的内在动力和外部表现，研判它们对欧洲、亚洲、非洲等区域的辐射作用和反弹效应，并据此探索建设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方向和路径。

一、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战略态势的演变与分析

自 16 世纪世界开始进入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时代以来，荷兰、西班牙和英国等地区性大国一度先后演变成为全球性大国，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后又逐步形成了中国、美国和苏联的战略大三角，并成为冷战结束至今的中俄美三边关系和当前国际战略态势的前提因素。

根据有的中国学者的定义，国际战略态势通常可理解为一定时期内国际力量对比及主要国家关系与竞争格局所呈现的总体状态。它集中反映政治、经济、科技与军事等领域的结构性变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构成各国制定与调整国家战略的重要外部环境。^①

当前，国际战略态势正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革期，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呈现“变乱交织、危中有机”的总体特征。多极化加速演进与大国博弈深化并存，地缘冲突多点爆发与经济、科技竞争白热化交织，全球治理赤字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凸显，这些构成了当前国际格局的核心图景。

第一，多极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全球力量对比更趋平衡。这一态势不仅体现为物质力量的扩散，更表现为国际话语权的多元分布。扩员后的金砖国家成为多极化的重要推手。截至 2025 年，金砖成员国已增至 11 个，伙伴国达 10 个，覆盖全球半数以上人口，其经济体量占世界 GDP 的 27%。^②与此同时，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鲜明标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接近 80%。如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其经济总量在 2024 年约占世界 GDP 的 61.46%，

① 参见王存刚：《战略环境与国家方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

② “Ambassador Mauricio Lyrio highlights Brasil’s priorities in BRICS and demystifies creation of a new currency”, February 21, 2025, <https://brics.br/en/news/ambassador-mauricio-lyrio-highlights-brasils-priorities-in-brics-and-demystifies-creation-of-a-new-currency>

且其增速（约 4%）持续高于发达经济体（约 1.6%）。^①这种崛起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更体现为战略自主意识的增强，“金砖+”、上合组织等机制的深化，正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二，大国博弈呈现“高强度、低冲突”特征，地缘冲突多点爆发加剧全球动荡。中美关系仍是影响国际格局的关键变量。2025 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对中国的定位从“主要战略威胁”调整为“长期经济竞争者”，战略重心从“印太”回缩至西半球，形成“有限战略转向”与“象征性调整”并存的态势。^②中俄保持高水平战略协作，美欧关系因战略需求差异出现裂痕，亚太地区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场域。地缘冲突方面，俄乌冲突进入僵持阶段，美欧一些智库将“缺乏政治解决的停火”之“冻结化状态”视为较高概率前景，并在谈判方案中提及以实际控制线为基础的领土安排与让步压力。^③中东局势呈现“多点引爆”特征，巴以冲突、红海航道危机与美以打击伊朗相互联动，重塑地区力量对比格局。而且，这些冲突与科技竞争、意识形态斗争交织，使全球安全体系面临严峻挑战。

第三，经济科技竞争成为战略博弈的核心领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2025）》指出，全球化正在经历“双重变奏”：逆全球化与区域合作并行发展，产业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主导”。^④美国推动的贸易保护主义及“技术脱钩”，与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形成鲜明对比。在科技领域，人工智能成为战略竞争制高点，发达国家试图构建“技术垄断闭环”，而发展中国家加速自主创新，形成开源与封闭路线的博弈。同时，“去美元化”浪潮兴起，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机

①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Sustaining Growth in a Less Supportive External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pril 12, 2017, <https://www.imf.org/en/blogs/articles/2017/04/12/emergingmarketsanddevelopingeconomiesustaininggrowthinalessupportiveexternalenvironment>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③ “Peace, Ceasefire, or Stalemate? How Wars End and the Road Ahead for Ukrain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vember 8, 202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eace-ceasefire-or-stalemate-how-wars-end-and-road-ahead-ukraine>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2025）》，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 年。

制的发展，正逐步削弱美元霸权，全球金融体系呈现多极化趋势。

第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滞后于格局演变，“治理赤字”持续扩大。非传统安全挑战的上升进一步加剧了治理难度，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粮食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协作。传统国际组织改革乏力，联合国权威受到挑战，而新兴多边机制与传统机制形成互补竞争关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24/2025）》指出，全球治理正从“单极主导”向“多元竞合”转变，但“领导力赤字”与“规则赤字”并存。^①

二、中俄美评估国际战略态势的异同比较

世界各国的国际战略在相当程度上依据各自对国际战略态势的认识和评估。中国、俄罗斯、美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所处环境不同，在评估国际战略态势时自然不尽相同。中俄美对国际战略态势的评估既体现了各自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利益，更折射出对当前和未来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的筹划和运作。

（一）中俄美对当前国际战略态势的基本判断

中国对当前全球战略态势的判断具有长期的从容，俄罗斯明显具有近期的紧迫感，美国则处于转型期的徘徊波动。

1. 中国的基本判断。第一，当前国际秩序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②第二，全球权力格局深度重构，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逐渐解体，多极化趋势加速演进，各种力量对比处于交织和胶着状态。第三，全球治理体系面临重组压力。地缘冲突加剧了规则的碎片化，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既催生新质生产力，也带来治理和安全的新挑战。

① 《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24/2025）》，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5 年。

② 习近平：“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 年 10 月 25 日第 2 版。

2. 俄罗斯的基本判断。第一，世界正回归传统多极格局，世界在此过程中充满了无序且激烈的竞争。2023 年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指出，人类正经历变革，更公正的多极世界正在形成。同时，国际事务中“信任与可预见性赤字”加剧，经济全球化危机加深，冲突空间在一系列关键地区扩大，国际环境更趋复杂。^①第二，全球冲突风险与意识形态对抗加剧。^②第三，追求无等级的全球治理体系。俄罗斯主流学界认为，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体系将从西方中心的等级体系转为无等级体系。“在全球政治的背景下，这可能发生在没有赢家或输家的情况下。这将标志着新的非等级时代的开始，并限制以前体系中最差的方面，比如追求霸权”^③。

3. 美国的基本判断。第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权力均衡”的原则下承认世界大国影响力客观存在，并以此作为维持全球与地区力量均衡的出发点，强调“大国、富国和强国拥有超大的影响力，这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④第二，在世界主要力量对比中，只有中国有可能与美国一争高下，认为中美在经济上已处于“近乎对等”（near-peer）的关系。^⑤第三，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全球秩序愿景以“美国优先、利益至上”为原则，不再自视为多边秩序的主要供给者，而是按自身利益选择性参与。2025 年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直言，“美国像阿特拉斯那样独自支撑整个世界秩序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并宣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而非‘战后国际秩序’，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目的。”^⑥

^① *The Concept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pproved by 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 No. 229 of March 31, 2023)*, March 31, 2023, https://mid.ru/en/foreign_policy/fundamental_documents/1860586/

^② “On October 27, the President will attend the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October 26, 2022, <https://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9682>

^③ O. N. Barabanov, T. V. Bordachev, et al., “Maturity Certificate, or The Order That Never Wa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October 2, 2023,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maturity-certificate/>

^④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p.1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⑤ *Ibid.*, p.20.

^⑥ *Ibid.*, p.12.

（二）中俄美的基本应对思路和举措

中俄美三国在结合对国际战略态势的解读和维护自身战略利益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应对思路和举措。

1. 中国的基本应对思路和举措。 中国认为，世界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而需要“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①

第一，筑牢内部发展根基，增强自身韧性。一是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培育生物制造、商业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二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涵盖多领域的国家安全体系，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粮食、能源、数据、网络等关键领域的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三是挖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潜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避免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第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塑造合作新机遇。推进制度型开放，从商品和要素流动为主的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层面的对接与创新。通过建设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措施，持续向世界开放市场；同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合作，为全球互联互通注入动力。

第三，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字治理等领域提出中国方案，比如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参与网络空间规则制定等。此外，支持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平台的扩员与发展，巩固与全球南方合作，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2. 俄罗斯的基本应对思路和举措。 俄罗斯认为，当前世界战略态势总体来说不利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因而也是能改变其被动战略地位的机遇。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

第一，上述战略研判是俄罗斯政界与学界的主流共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2024 年 11 月第 21 届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发言中指出，世界秩序“已不再是单极”。在评述西方政策与经济状况时，他强调其面临着多重压力与问题，这为俄罗斯调整对外战略提供了空间。^①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年度预测报告《俄罗斯与世界：2025》在评估西方对乌克兰政策前景时指出，美国新一届政府更聚焦于与中国开展“全球主导地位”的竞争和自身在国内领导力的维系，乌克兰议题在其政治议程中可能转化为“负担性资产”。^②

第二，在军事上强化战略威慑与非对称优势。俄罗斯大力发展高超声速武器、无人机等非对称军事技术，弥补常规力量与西方的差距，以此强化战略威慑。

第三，在外交上深化核心协作并拓展多元布局。一方面，巩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框架下紧密协作，共同推动多极化。俄罗斯在 2025 年对华外交表态中重申，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并将双方战略协作置于推动世界多极化与维护双方共同利益的框架之内。^③另一方面，俄罗斯深化与拉美、非洲国家的务实合作，构建多元国际合作网络。在全球南方方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 2025 年 12 月第二次“俄罗斯-非洲伙伴关系论坛”部长级会议前撰文指出，俄罗斯将支持非洲作为多极世界的关键中心之一，并强调非洲国家有权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与对外伙伴关系。^④

3. 美国的基本应对思路和举措。第一，美国虽然认识到自己在世界战略态势中已经不再拥有“单超独霸”的地位，但决不允许他国超越美国。2025

① “Vladimir Putin Meets with Members of the Valdai Discussion Club. Transcript of the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1st Annual Meeting”, *Valdai Club*, November 7, 2024, <https://valdaiclub.com/events/posts/articles/putin-plenary-session-2024/>

② Дынкин А. А., Барановский В. Г. (рук. Проекта). *Россия и мир: 2025. Экономика и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Ежегодный прогноз*. Москва: ИМЭМО РАН, 2024. С.161, <https://www.imemo.ru/files/File/ru/publ/2024/Prognoz-2025.pdf>

③ “Briefing by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Maria Zakharova”,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July 9, 2025, http://mid.ru/en/foreign_policy/news/2034998

④ “Lavrov: Russian diplomacy will support Africa’s emergence as one of the key centers of a new multipolar world order”, December 18, 2025, <https://russia-isworld.ru/en/novosti/lavrov-russia-will-help-africa-become-a-major-center-in-a-multipolar-world-2025-12-18-53453/>

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不允许任何国家能够成为威胁到美国利益的霸权。”^①

第二，在战略重心调整时兼顾本土安全与区域霸权巩固。2025 年 3 月美国特朗普政府草拟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已显露出将重心向本土和西半球倾斜的趋势。^②例如美国要从欧洲部分国家撤回驻军，同时以打击贩毒集团等名义在加勒比海增加军事存在，围堵委内瑞拉，以此遏制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巩固自身在西半球的传统霸权。同时在亚太地区调整军事部署，将更多力量转移到第二岛链，第一岛链仅保持适度存在，通过“远程威慑”降低直接冲突风险。

第三，在军事领域强化联盟威慑与非传统领域布局。例如，强推盟友分担防务责任，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约成员国和日韩等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试图通过盟友形成对竞争对手的“外包威慑”。

第四，在经济科技领域巩固自身优势和遏制对手。在高科技领域，美国聚焦人工智能、5G 等关键赛道，试图通过技术封锁制约中国发展。同时，特朗普政府频繁使用关税、制裁等经济胁迫手段，不仅针对竞争对手，甚至对盟友也毫不手软，以此维护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优势地位。

（三）中俄美的评估和应对异同比较

中俄美三国虽然共处于同一世界，面对相似的全球性挑战，但因不同的内外条件而在战略态势评估和应对思路上各有所重和各有不同。

1. 三国都认为当前国际战略态势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但对于未来方向，看法各不相同。一方面，三国都认识到当前国际战略态势的严峻性。中国认为，“今天，人类又面临和平还是战争、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抉择”^③。俄方战略界认为，支撑西方约五百年主导地位的军事优势正在走向终结，世界秩序加速向多极方向演化。在这一过程中，国际体系的不确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p.13.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② 2026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January 23, 2026, p.3, <https://media.defense.gov/2026/Jan/23/2003864773/-1/-1/0/2026-NATIONAL-DEFENSE-STRATEGY.PDF>

^③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5 年 9 月 4 日第 3 版。

定性上升，权力在新旧中心之间呈现更快的再分配。^①特朗普总统的话语特征在于，用更具对抗性和颠覆性的“政策宣告”来替代“历史十字路口”这类相对文雅的修辞，但本质上宣告了旧时代的终结和新竞争时代的开始。例如，2017年9月19日他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时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主权国家合作实现和平、繁荣与自由的世界中，而不是通过全球化统治来追求这一目标……美国将永远选择独立与合作，而不是全球治理、控制与支配”^②。另一方面，中俄美对未来战略态势和发展方向的认知却大相径庭。中国可以说是谨慎乐观，认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③俄罗斯相对悲观，认为“当前正处在历史性转折关头，即将面对的可能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最无法预测、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十年。”^④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则过分乐观，认为“（当下是）大梦想和大胆行动的时候。”^⑤

2. 三国在应对思路重点各异。中国、俄罗斯、美国对未来战略态势发展方向的不同判断，导致了三国在应对思路上的不同。中国的重点在于内外兼修，强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做更好的自己，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⑥俄罗斯重在改变地缘战略环境，认为“西方对俄罗斯构成‘生存’威胁，明确提出要消除来自欧洲和北约中不友好国家的安全威胁。”^⑦美国正在推行一种以长期大国竞争为核心、融合了国内复兴与全球选择性霸权的战略。它既有针对关键领域和地域“大刀阔斧”的决断，也有在复杂国际

① S. A. Karaganov, “Eastern Turn 2.0”,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July 21, 2025,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eastern-turn-2-0-karaganov>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2n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19,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72nd-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4-25页。

④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meeting”, October 27, 2022, <https://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9695>

⑤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March 4, 2025,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address-before-joint-session-the-congress-4>

⑥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釜山举行会晤”，《人民日报》，2025年10月31日第1版。

⑦ *The Concept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pproved by 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 No. 229 of March 31, 2023)*, March 31, 2023, https://mid.ru/en/foreign_policy/fundamental_documents/1860586/

局势中寻求“管控风险”的权宜成分，但整体上服务于一个清晰、持久的竞争框架。

3. 三国对具体议题和问题的应对不同。中国因拥有综合国力持续上升的优势而能相对从长计议，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时注重建构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强调“（要）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可靠的稳定性，”并认为通过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推进国际共同安全，既能防范外部安全风险，也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①俄罗斯的长处在于军事力量，而短处是直接面对北约和欧盟的双东扩，所以俄罗斯倾向于以直接的军事行动来解燃眉之急。借此，俄罗斯 2008 年在格鲁吉亚、2014 年在克里米亚、2022 年在乌克兰等问题上都优先采取了军事行动。特朗普政府应对战略挑战是以“美国优先”为核心，奉行交易式外交与单边主义。做法上，以关税大棒重构贸易规则，强调“公平互惠”；大幅退出国际组织，弱化多边机制；对盟友施压，要求其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聚焦大国竞争；国内减税放松监管、优先发展前沿技术，内外联动强化竞争力。

（四）三国战略互动的主要特点

美国在 2008 年次贷危机和伊拉克、阿富汗两次战争后逐步失去全球的战略主动，中俄美的战略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使三边关系成为国际战略态势中最为突出的变量之一。

1. 核心是单极和多极之争。三国的战略互动大都围绕国际格局和国际战略态势展开。美国以维护单极霸权为核心的全球战略，是当前大国战略博弈的主要根源。中俄则强调世界多极化和多边主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三方在战略目标、行动路径、国际主张和关键领域上的互动也都围绕这一核心展开。

2. 斗而不破和争中有合。中俄美虽然进行战略博弈，但由于核威慑、经济依存等现实约束，以及三方在全球治理、地缘安全等领域存在无法割裂的共同利益，所以三国间往往是谈谈打打和斗而不破。例如，核威慑形成终极制衡。美俄各自拥有超 5000 枚核弹头，中国也保有精干有效的核力量，

^① 《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中国政府网，2025 年 5 月 12 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5/content_7023405.htm

三方均具备“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能力，从而成为任何一方都不能轻易突破的红线和底线。再如，经济深度绑定难以切割。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货物贸易伙伴，美国则是中国的第三大货物贸易伙伴。美国依赖中国的稀土、完整产业链供应和农产品市场等，中国在半导体、高端医疗等领域也需美国核心技术支持。若强行“脱钩”，美国通胀可能飙升至两位数，中国产业升级节奏也会受阻。

3. 三国领导人的战略运筹。在当前中俄美复杂的战略互动中，三国领导人的作用凸显且呈现出鲜明特征。这既源于大国博弈的现实需求，也和全球治理的客观要求紧密相关，当然还有领导人的风格和个性的关系。因此，三国领导人都重视相互间的直接联系和对话。中俄间高频互动定调，筑牢战略互信根基，顶层设计引领全方位合作。中美间关键会晤控局，管控分歧与搭建合作框架，平衡竞争与合作的边界。事实上，三国领导人的直接沟通更是避免误判和降低冲突升级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核威慑背景下，美俄均拥有数千枚核弹头，中美在亚太地区存在诸多地缘利益交集，任何层级的误判都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因此，特朗普与普京即便分歧严重，仍会进行电话会谈；中美领导人则通过常态化的元首沟通机制，明确彼此战略意图，防止经贸、科技领域的博弈升级为全面对抗。

三、三国战略互动的辐射和反弹效应

溢出效应是指三国战略博弈对世界其他地区安全、经济、政治等领域造成的直接冲击和间接影响；反弹效应则是指相关国家和地区对这种博弈格局的回应和反制。

欧洲是当前美俄间接军事较量的主战场。在溢出影响方面，欧洲成为美国和俄罗斯间接和可控对抗的场所。在安全方面，乌克兰危机牵动和冲击着整个欧洲。在经济方面，欧洲经济陷入多重困境，还遭遇美俄双重挤压。在跨大西洋联盟方面，美国的独断专行和“越顶外交”动摇了欧洲对北约安全保障的信心，但又无可奈何。在安全和军事方面，欧洲加速推进防务自主，大幅加码防务投入。2025年3月，欧盟委员会拟在2025年至2030年间动

用约 8000 亿欧元实施“重新武装欧洲”计划，^①多国军费开支创下冷战以来新高。在地缘政治方面，面对美俄的强势互动，欧洲多国联合抱团，争取地缘政治话语权，并且还在外交和经济上加强了与中国的互动。

亚太、“印太”是当前中美博弈的主要平台。当前中美俄在“印太”博弈呈军事联盟对抗、科技规则争夺、地缘热点交织、中俄协作对冲四大特征。美国强化“印太战略”，与“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和“四方安全对话”（QUAD）协同，推进前沿部署并实施对华科技封锁；中国提升反介入能力并推动区域合作；俄罗斯以远东与北极介入、联合军演对冲美西方压力。三方避免直接冲突，但台海、南海、朝鲜半岛等热点持续升温。中美俄三国在亚太、“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既产生了改变区域力量格局、影响经贸规则等多方面的溢出效应，也引发了各国政策调整、战略布局重构等一系列反弹效应。

拉丁美洲正在见证三国趋向频繁的战略互动。中美俄三国在拉美形成霸权护持、多元拓展、战略对冲的复杂互动格局。美国秉持门罗主义传统，将拉美视为“后院”，通过经济施压、军事合作、意识形态渗透等手段强化主导地位，极力遏制中俄在当地的影响力拓展。中国以平等互利、不附加政治条件的经贸、基建、能源与金融合作深化伙伴关系，推动地区产业链合作与去美元化进程。俄罗斯则借助军事技术合作、能源布局与多边外交，在关键国家形成战略支点，对冲美西方的挤压。大国博弈既加剧了地区地缘竞争，也显著提升了拉美国家自主外交空间与区域一体化动力，推动西半球格局加速向多极化转型。^②

非洲不是中俄美战略互动的主要地区，但也能感受到溢出效应。中美俄在非洲的战略互动呈现安全、资源、发展模式三重竞争。美国聚焦关键矿产与反恐合作，以意识形态划线，试图限制中非、俄非的合作空间；中国以“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建、投融资与工业化合作为主线，推动非洲自主发展与

① “ReArm Europe plan / Readiness 2030: the plan to finance EU defence”, *European Commission*, March 28, 2025, https://commission.europa.eu/topics/defence/future-european-defence_en

② 高程、董青青：“大国博弈中的拉美地区国家行为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 年第 10 期，第 56-86 页。

产业链升级；俄罗斯则侧重军事技术合作、能源开发与多边外交，拓展在地缘支点国家的影响力。三方博弈加剧了非洲资源与供应链竞争，同时显著提升了非洲联盟的协调作用，扩大了非洲国家多元外交、自主选择的空间，推动地区去单边化，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

四、中俄美关于全球治理体系的理念和互动

战略态势和战略格局密切相关，二者进而影响到三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上的理念与行为。简而言之，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上主张“先立后破”，俄罗斯和美国都主张“先破后立”，但各自的重点有所不同。

（一）三国的全球治理观

当前全球治理正处于转型关键期，中俄美的全球治理观和体系建设谋划反映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定位：中国倡导包容性多边治理，强调共同发展；俄罗斯致力于打破西方霸权，追求大国地位复归；美国则竭力维护霸权，将全球治理视为维护美国领导的工具。三国全球治理理念和实践的碰撞与博弈，正在和继续深刻影响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

1.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中国的核心全球治理观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共商共建共享。这是中国全球治理观的核心。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反对“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的霸权模式。^①二是以联合国和国际法为核心。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少数国家对国际法的选择性适用和双重标准。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强调，世界只有一套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②三是以人为本，兼顾普惠。强调全球治理要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推动包容性

^① 参见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7年1月18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201701/t20170119_7945764.shtml

^② 参见习近平：“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第1版。

发展，助力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成果，认为只有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①

2. 俄罗斯的全球治理观。俄罗斯的全球治理观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坚持多极化世界秩序，反对单极霸权，主张全球治理应反映各国共同利益，普京总统多次指出多极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②二是恪守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优先，支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主张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适配国际格局变化。^③三是强调区域协同治理，以新欧亚主义为指引，推动区域一体化与全球治理相衔接，视上海合作组织为构建更公正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④

3. 美国的全球治理观。美国核心的全球治理观有三点：一是“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底色，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均以维护美国利益为核心，其“多边主义”实为选择性多边主义，依托盟友体系维系霸权；二是国际规则工具化，将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工具化，不符利益便“退群”或阻挠，如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否决加沙停火决议等；三是霸权式安全与利益逻辑，追求绝对安全，通过海外军事基地、盟友体系维持霸权，将自身利益置于全球共同利益之上。

（二）三国关于全球治理体系的谋划

中俄美根据各自的全球治理观并以各自的节奏推进各自版本的全球治理体系，可以说，目前尚处于谋划而不是全面推进阶段。

1. 中国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主要谋划。在三国中，中国对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关注不仅最多，而且也最为具体。

第一，在维护原有基础上的改革完善。习近平主席强调，“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不必推倒重来，也不需另起炉灶，而是应在悉心维护的基础

① 参见“全球治理倡议正逢其时、指引方向、彰显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5年9月1日，https://www.mfa.gov.cn/wjbzhd/202509/t20250901_11699857.shtml

② “Address to participants of 10th St Petersburg International Legal Forum”, June 30, 2022, <https://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8785>

③ *The Concept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pproved by 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 No. 229 of March 31, 2023)*, March 31, 2023, https://mid.ru/en/foreign_policy/fundamental_documents/1860586/

④ 参见孙壮志：“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功能定位”，《现代国际关系》，2025年第7期，第5-26页。

上改革完善”^①。所谓原有基础，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国目前改革的重点在于提高全球南方在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推动治理结构更贴合全球政治经济现实等。

第二，积极推进新兴领域的建章立制。中国通过“倡议-规则-机制-实践”的路径，在新领域治理中既尊重国际法与现有机制，又注重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权与话语权，推动构建更加公平、高效、可持续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人类共同福祉提供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第三，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的贡献。2025年9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系统回答了“由谁治理、如何治理、为谁治理”等核心问题，提出“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五大理念，形成与全球发展、安全、文明倡议协同的“四大全球倡议”体系，为破解和平、发展、安全、治理“四大赤字”提供系统性思路。^②

2. 俄罗斯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主要谋划。俄罗斯侧重以战略协作与实力制衡反对单极霸权、构建多极秩序。

第一，安全上以军事与机制化合作对冲单极压力，经济上用能源与基建绑定伙伴、拓展市场，二者相互支撑，既巩固周边影响力，又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服务多极世界目标。

第二，联合新兴力量改革体系。俄罗斯强调与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等的合作。普京总统指出：“上合组织在加强欧亚大陆合作与互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我们正在共同推动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安全、包容的发展体系，这一体系将超越陈旧的欧洲-大西洋模式，真正体现多极世界的利益平衡。”^③

第三，维护能源与安全领域权益。将能源合作、国家安全融入全球治理，通过能源出口、技术合作等方式增强国际影响力，同时依托集体安全条约组

① “习近平会见出席‘2019 从都国际论坛’外方嘉宾”，《人民日报》，2019年12月4日第1版。

② 参见廖凡：“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10月17日第A01版。

③ “SCO Heads of State Council Meeting”, September 1, 2025,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7891>

织维护区域安全，对冲西方军事联盟的压力。^①

3. 美国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主要谋划。美国谋划的本质是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霸权治理。规则与机制服务于维护其主导地位，而非全球共同福祉。

第一，交易思维主导责任分配。特朗普政府强调减少美国对外安全负担，要求盟国显著提高防务开支，强化负担分摊。在 2025 年 6 月的海牙北约峰会上，北约盟国在特朗普的压力下同意上调防务开支目标，并重申集体防御承诺。^②

第二，时常破坏性地而不是建设性地认识和对待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其遗作中谈到，特朗普第二任期若将对外关系过度“交易化”、强调强制性手段并弱化制度性合作，将持续侵蚀美国的软实力与盟友信任，进而削弱支撑既有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础。^③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拆解多边治理的集体决策机制，将全球治理从“集体行动”变为“美国与各国的双边利益博弈”，如从七国集团和二十集团等多边治理平台转向一对一的“交易谈判”来解决全球治理分歧。

第三，聚焦关键利益区域与资源控制。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减少对非洲等“非核心利益区”的投入，将北极航道、关键矿产供应视为战略重点，特朗普总统宣称，“要控制格陵兰岛以掌握北极制海权”^④，并通过能源、矿产领域的单边制裁与合作，强化对全球供应链关键环节的掌控。

（三）三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方面的互动趋势

鉴于当前中俄美关系的现状，三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方面以各自表述和各自行动为主，但今后随着内外形势的发展，中俄美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问题上的斗争和妥协将会增加且向纵深发展。

① *The Concept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pproved by 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 No. 229 of March 31, 2023)*, March 31, 2023, https://mid.ru/en/foreign_policy/fundamental_documents/1860586/

② “NATO leaders set to back Trump defence spending goal at Hague summit”, *Reuters*, June 25, 2025,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nato-leaders-set-back-trump-defence-spending-goal-hague-summit-2025-06-24/>

③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Jr., “The End of the Long American Century: Trump and the Sources of U.S. Power”, *Foreign Affairs*, June 2,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end-long-american-century-trump-keohane-nye>

④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March 4, 2025,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address-before-joint-session-the-congress-4>

1. 全球意识和大国视野的指引。中俄美都有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全球意识和大国视野”。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明确中国“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使命。^①中国倡导并践行一系列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理念与行动，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中国提出了系统性的全球治理方案，将其体现为四大全球倡议，并通过相应的合作平台和多边行动加以落实。俄罗斯反对单极霸权，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积极与非西方国家构建合作框架，主动塑造一个以欧亚为中心、俄罗斯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多极化世界。普京总统指出，为使“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更加可持续，需要共同构建兼顾各国利益的全球发展新模式。他还呼吁合作伙伴为构建这一全球发展新模式作出贡献，以“确保各国繁荣和世界未来的稳定发展。”^②美国源于“美国例外论”的道德自负，经由“战略实用主义”的冷酷计算来实践其所设想的全球治理，并在二战后塑造成“自由霸权”的全球秩序。当前，这种意识正处在“理想收缩”与“现实聚焦”的转型阵痛期，但其确保美国在全球格局中首要地位的核心诉求不会改变。就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而言，是在“美国优先”前提下的实用主义现实主义，以维护国家利益、重塑地缘格局为核心。

2. 战略博弈和务实妥协的相互作用。当前，中俄美在重构全球治理体系过程中呈现出“战略竞争为主、务实妥协为次”的复杂互动，但值此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酝酿成形期，稳定性和可塑性虽然面临重大挑战，但也不能一概排除。

战略博弈主要集中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度主导权、规则制定权与地缘影响力三个方面。在制度平台之争方面，中俄以联合国、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为支点，推动“多边共治”叙事，强调主权平等与文明多样性，试图稀释美在西方主导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盟友网络权重。美国则通过“印太经济框架”、“芯片四方联盟”、“蓝色太平洋伙伴”等排他性小圈子，重塑供应链与科技标准，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话语优势。在规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国政府网，2021年11月16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② “Plenary session of St Petersbur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 June 20, 2025, <https://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7222>

则制定权之争方面，美国在数字与高科技领域对华实施史上最严半导体出口管制，并拉拢日本和荷兰构建“高墙”，阻止中国进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产业核心赛道。中俄在网络与太空等议题上，在联合国提出“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倡导国家主权延伸至网络空间；美国则力推“先占者先用”叠加公私合营的模式，维持其技术-资本双重主导。

在务实妥协场景方面，三方在安全治理领域的合作相当有限。在经济治理的务实安排方面，美国在欧洲能源危机期间，默许印度转口俄罗斯石油、中国扩大俄罗斯能源进口，形成事实上的“次级制裁豁免”。又如在斯里兰卡、赞比亚等国债务处理中，三方通过巴黎俱乐部/非巴黎俱乐部混合模式达成个案妥协。在功能性议题的“隔离式合作”方面，中俄美对气候变化形成三边排放核查技术对话，与地缘政治脱钩；对公共卫生保留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的疫苗认证互认机制；在涉及太空治理的国际空间站合作延期谈判中，技术协作与军事竞争并行不悖等。

五、结 语

当前，中俄美谁也无法单独重塑全球治理，并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很难在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三国及整个国际社会只能在国际多极化进程中，通过分步或局部地推进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

在一到五年的短期内，中俄美将各自争取在政治外交领域中成为主动方，在安全军事领域中防止直接对撞，在经济科技领域中成为领先方。在此期间，中俄美能否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找到更多“非零和”合作空间，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全球治理的转向是和平演进还是冲突推进。

从大约十年的中期看，即到 2035 年，可能的一个路径是三国形成“战略竞争对手+有限合作伙伴”双重关系，在全球治理呈现“功能领域分化”，即安全上阵营化、经济上部分脱钩、功能性议题保留多边合作，后者类似冷战时期美苏在核控、太空等领域建立“竞争性规则共治”。而且，“议题性联盟”也将越来越多地成为新常态，气候领域可能中欧合作、安全领域俄中协调、科技标准美欧同盟并行，形成“多孔型”治理结构。这样，中俄美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方面仍将在“核心竞争+局部妥协”的双轨上长期运行，

直至世界主要力量对比发生质的变化。

从更长的时间框架看，世界在 2050 年左右才能基本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其主要根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点：

第一，世界在完成多极化到多极的长期过渡后，主要国际力量对比的国际战略态势得以相对长期稳定，它们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上的最大公约数达到足以定格定局的程度和力度。从目前的经济科技发展趋势看，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的发展是与此耦合的。但是，问题在于处于“下降”趋势的美国会利用其尚存的军事、科技等优势制造事端而延缓或逆转上述基本趋势。从特朗普政府目前的所作所为和某些暂时得逞看，这一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相应的底线思维也是应该有的。

第二，全球南方还需要作出更加长期和艰苦的努力。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南方经过了政治独立、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各个历史阶段，目前已进入整合集体力量和争取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者的阶段。但是，全球南方在达到这一宏伟目标前，还需增加各自和集体的力量，在经济、科技、政治、外交、安全和文化等方面达到质的提高，努力防止内部争斗和外部离间，有效提高全球治理体系的战略思维、顶层设计、机制建设和务实推进的综合能力。

最后，努力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形成“全球各方”的合力。回顾二战结束以来八十年的历史，“全球各方”在广义的全球治理上虽然道路坎坷，但也有过阶段性的成果。例如，二战结束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解放和独立主要归功于这些国家的自身努力，但前殖民地“宗主国”的审时度势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从而形成了联合国的权威和代表性。又如，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的“南北对话”形成强大的时代风气，并催生了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再如，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21 世纪的恐怖主义威胁和金融危机等，全球各方还是能够共同应对并取得基本成功。展望未来二十五年，世界面临的挑战将比过去更加复杂困难，因而更需要全球各方作出更大的共同努力，争取在现有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出更大的步伐。

（责任编辑 崔 珩）

国际组织

非西方视角下的上合组织： 治理绩效、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

邓浩*

【内容提要】既有国际秩序研究与多边组织评价长期被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主导，习惯于以西式自由主义国际组织的制度标准、运行逻辑与价值取向评判非西方多边合作机制，进而对上合组织的治理成效、发展模式与未来前景形成片面认知甚至负面定性。上合组织作为冷战后欧亚大陆最具代表性的非西方多边合作平台，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内核，走出了一条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治理道路。本文立足非西方视角，超越西方单一评价标尺，尝试构建一套非西方多边机制评价体系，对上合组织治理绩效进行系统性重新审视和评估，并客观剖析上合组织作为新型多边探索面临的现实挑战，提出契合其发展逻辑的优化路径，旨在还原上合组织的真实价值与历史定位，为非西方国际组织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非西方视角 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精神 多边治理 治理绩效 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D814.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2-0024(24)

2026年是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上合组织从安全合作起步，逐渐向经济、人文、治理领域扩展，现已发展成为全球幅员最广、人口最多、代表性最强的综合性区域多边

* 邓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新疆师范大学“天池英才”特聘教授，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大使馆原政务参赞（首席馆员）。

组织，成为欧亚大陆稳定与发展的关键支柱，也成为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中最具标志性、示范性的新型多边主义实践平台。

长期以来，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组织评价体系呈现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①西方国家依托其主导的国际机制与话语优势，将自身倡导的制度模式、合作理念与绩效标准奉为“普世范式”，对发展中国家主导或参与的非西方多边机制进行选择性地解读与倾向性评判。上合组织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主权平等、协商一致、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打破了阵营对抗、强权主导的传统多边合作逻辑，成为欧亚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关键支柱。然而，西方学界与舆论常以决策效率、制度化水平、强制执行力度等西式标准苛责上合组织，忽视其成立背景、区域特征与成员诉求，贬低其治理成效，甚至将其标签化、污名化。^②事实上，上合组织的治理逻辑、合作重点与价值目标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对其评价必须回归非西方视角，立足欧亚大陆的地缘现实、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诉求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需要。基于此，本文立足非西方多边机制评价体系，重新审视和评估上合组织的治理绩效，以求更加全面、客观、辩证地认识上合组织，破除西方话语偏见，彰显非西方多边合作的独特优势与时代价值。

一、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评判上合组织的偏颇性、片面性与非科学性

西方视角评判国际组织，本质上是以欧美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蓝本，以霸权稳定、阵营对抗、制度霸权、价值输出为核心逻辑，将是否符合西方制度模式、是否服务西方战略利益、是否接纳西方价值规范作为核心评判依据，实质是以效率优先替代公平正义，以强制制度化替代协商民主，以价值同质化替代文明多样性，以大国主导替代主权平等。在此框架下，西方对上合组织的研究与解读长期存在预设立场、双重标准与事实扭曲，最终得出上合组织“低效”、“松散”、“清谈俱乐部”等错误结论，其认知谬误集

^① 高飞：“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中国人大网，2021年3月1日，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103/t20210301_310219.html

^② 戚振宏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回眸与前瞻（2001—201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第153-183页。

中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以同盟体系标准衡量上合组织，混淆制度属性导致定性错位。西方传统国际秩序以军事同盟为核心支柱，强调对外威慑、内部等级化决策、集体防御义务与统一行动指令，将是否具备强制约束力、快速反应能力、统一指挥体系作为判断国际组织有效性的核心指标。而上合组织自成立之初便确立了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的基本定位，摒弃排他性阵营构建与对抗性安全思维，以协商一致为决策原则，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为理念，聚焦地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致力于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西方无视上合组织的非同盟属性，生硬套用北约等军事同盟的运行逻辑与评价体系，批评上合组织缺乏强制执行、决策效率偏低、难以形成统一行动，进而将其定性为低效松散的论坛性机制。这种评判完全无视上合国家的主权平等诉求与自主安全选择，忽视非传统安全治理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本质是将同盟模式普世化、绝对化，用单一制度模板裁剪上合组织合作实践，必然导致认知偏差与结论失真。

第二，以价值优先逻辑替代实效导向标准，忽视上合组织治理成效，陷入意识形态偏见。西方评判国际组织时，普遍将所谓民主标准、人权规范、西式治理模式作为前置条件，将国际组织视为推广西方价值理念的工具，优先考量机制的价值契合度而非实际治理效能。上合组织诞生于欧亚地区复杂的安全与发展环境，成员国涵盖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始终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文明包容互鉴的核心原则，不搞意识形态划线，不推行价值输出，聚焦地区国家共同关切的安全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现实议题。西方因上合组织拒绝接受西方价值标准、不服务于西方地缘战略，便刻意无视其在反恐维稳、边境管控、禁毒反毒、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实质性成果，片面放大机制运行中的协商成本与协调难度，将上合组织污名化为“缺乏价值引领的清谈俱乐部”。这种评判完全脱离上合地区治理的现实需求，以意识形态偏见取代客观事实，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与战略排他性，既不公正也不科学。

第三，以霸权主导逻辑否定平等共治模式，无视多极化趋势，固守陈旧思维。西方主导的传统国际组织体系普遍存在权力分配失衡、决策机制不平

等、发达国家垄断规则制定权等特征，霸权国家与核心盟友掌控组织主导权，广大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与代表性严重不足。而上合组织开创了以大小国家平等、协商一致、互利共赢为基本原则的新型多边合作模式，摒弃强权政治与单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充分保障成员国平等参与决策、共同分享成果的权利。西方基于霸权稳定论与强权政治思维，将平等共治视为效率低下的根源，将协商一致解读为决策虚化，本质是不愿接受非西方国家自主构建多边机制、自主主导地区事务的现实，试图通过负面评判否定上合组织的制度创新价值与合法性。这种认知违背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忽视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要求，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无法解释上合组织持续发展壮大、吸引力不断提升的现实趋势。

综上所述，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对上合组织的评判，从预设立场、评价标准到结论导向均存在根本性谬误，其核心目的是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与制度霸权，而非客观认识新型多边合作机制。以此为依据得出的“低效论”、“松散论”、“清谈俱乐部论”，完全脱离了上合组织的运行实践与地区治理现实，是典型的片面认知、偏见解读与错误定性，必须予以坚决破除。

二、非西方多边机制的评价体系：基本原则与系统构成

上合组织作为当代最具代表性的非西方多边机制，其价值逻辑、合作模式与目标追求均显著区别于北约、欧盟及其他西式国际组织。若简单套用西式标尺，不仅会低估上合组织的安全治理成效，也会忽视其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的开创性意义。因此，亟需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窠臼，构建一套真正属于非西方世界、同时具备科学性与严密性的多边机制评价体系。

构建适配非西方多边机制的独立评价体系，核心在于打破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垄断与单一标准霸权，改变以西方制度模式、价值理念来评判全球治理与多边合作的不合理格局。这既是维护各国主权平等、尊重发展道路自主选择、抵制外部干涉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上合、金砖等新兴多边机制实现理念落地、规范运行、提升效能的内在要求。通过确立以主权平等、共同安全、互利共赢、协商共治、务实高效为核心的评价标尺，能够更公正

地反映非西方世界的发展诉求与治理实践，增强新兴力量与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秩序重塑中的集体话语权，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均衡的方向发展。

构建适配非西方多边实践的独立评价体系，并非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全球治理知识霸权的学理矫正，是基于主权平等、内生发展与共同安全逻辑，对多边主义正当性与有效性标准的系统性重构。

（一）非西方多边机制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

非西方多边机制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植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历史遭遇与现实需求，既是对传统西方评价范式的反思与超越，也构成整个评价体系的基石与逻辑前提。

1. 主权优先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主权平等与互不干涉内政是非西方多边评价体系的首要原则，是构成评判多边机制正当性的逻辑起点。西方主导的评价体系隐含“人权高于主权”、“有限主权论”等预设，将主权视为可让渡、可干预的对象，本质上服务于强国对弱国的秩序特权。^①而非西方世界普遍具有被殖民、被干涉、被分裂的历史经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是生存安全与发展稳定的底线保障，^②而非多边合作的约束条件。以此为评价标尺，核心学理逻辑在于：主权稳定是多边合作的前提，外部干涉则是区域动荡与机制失效的重要诱因。只有以尊重成员国主权、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为底线，多边机制才能获得坚实的政治合法性，避免沦为外部势力介入区域事务的工具，进而实现安全兜底与秩序维系的基础功能。

2. 内生性与发展自主性原则。该原则强调，多边机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应该以当事国自身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与发展需求为依据，拒绝单一制度模板的外部移植。从比较政治与制度主义理论视角观之，制度是社会需求的产物，而非先进理念的简单嫁接。^③西方评价体系惯于以制度同构性为标准，忽视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贫困、治理能力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等核心

① 王友明：“全球治理：中西方的定位与认知差异”，2026年1月4日，<https://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260104/44109.html>

② 王毅：“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发展中国家的护身法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1年8月6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xhd/202108/t20210806_9137753.shtml

③ 曹沛霖：《比较政治制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困难，强行推行外来制度。这样，极易引发水土不服与社会撕裂。非西方评价体系坚持内生性导向，其学理逻辑体现为：有效治理源于内生需求，而非外部设计。只有契合成员国发展阶段与自主选择的合作安排，才能形成可持续的制度生命力。这一原则将评价重心从是否符合外部范式转向是否解决本土问题，回归社会科学情境化与事实优先的基本立场。

3. 共同安全与综合安全原则。区别于西方多边机制以同盟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为核心的评判取向，非西方多边评价体系采用共同安全与综合安全标准，将传统军事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纳入评估范畴，涵盖反恐、反极端主义、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发展安全等多重维度。对广大非西方国家而言，贫困与发展失衡是最大的不安全，外部制裁、地缘博弈与单边霸凌是重要安全威胁，零和安全逻辑难以实现区域持久稳定。该原则的内在逻辑是：安全具有整体性与关联性，单边安全与同盟安全不可持续，只有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为目标，兼顾不同国家的安全关切，才能降低区域冲突成本，构筑稳定可靠的合作环境，为多边经济合作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4. 发展实效优先于程序形式主义原则。此原则主张以民生改善、减贫增效、基础设施联通、区域一体化进展等实质性发展成果为核心评价指标，超越对程序规范、透明度、投票规则等形式指标的绝对化偏好。西方治理评价体系将程序正义置于优先位置，却往往回避发展正义与分配正义问题，导致形式合理与现实失效并存。从政治发展次序来看，全球南方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生存权与发展权，形式化制度建设可在发展进程中逐步完善，而发展机会的错失具有不可逆性。其学理逻辑体现为：发展实效是多边机制合法性的现实来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能够巩固社会稳定、提升治理能力、促进制度完善，形成“实效-稳定-治理-制度”的良性递进链条，而非颠倒为“先制度、后发展”的理想化路径。

5. 平等协商与非集团化原则。该原则以大小国家权利平等、协商一致、开放包容、不针对第三方为评判标准，反对霸权主导、等级决策与集团政治。西方多边机制多为同盟体系延伸，内部存在明显的权力等级与排他性安排，难以代表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从国际公共产品理论视角，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多边合作机制，应建立在平等参与、共识决策、责任共担、利益

共享的基础之上，而非强国主导、弱国依附的依附性结构。其内在逻辑在于：平等参与能够提升成员国的制度认同与履约意愿，非排他性能够扩大合作范围与公共产品供给范围，从而增强多边机制的代表性、可持续性与全球治理贡献度。

6. 文明平等与发展模式多样性原则。该原则拒绝以单一文明、价值观与发展道路作为评判多边机制的终极尺度，承认制度多样性、文明多样性与现代化路径多样性。现代化理论与世界历史经验已然证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不同文明与国家均拥有自主探索适合自身发展模式的合理性。^①西方评价体系隐含文明等级论与制度一元论，易加剧文明冲突与区域对立。非西方评价体系坚持文明平等，其学理逻辑在于：跨文明包容是区域长期稳定的基础，多元发展模式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实践选择，打破制度霸权与话语垄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包容、均衡的方向转型。

（二）非西方多边机制评价体系的系统构成

在上述基本原则的指引下，非西方多边机制评价体系并非零散指标的简单叠加，而是一套目标明确、层次清晰、逻辑自洽、可用于实证评估的系统性分析框架。该体系以多边机制的正当性、有效性、包容性与可持续性为总体评价目标，从价值基础、功能绩效、制度运行、外部效应与长期韧性五个维度展开，形成覆盖“价值-功能-制度-影响-韧性”的完整评价链条，实现原则导向与体系建构的内在统一。

1. 价值正当性维度。作为评价体系的价值基石，价值正当性维度集中衡量多边机制是否契合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文明多样、自主发展等非西方多边主义核心理念。主要内容包括：是否坚持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与强权政治；是否尊重成员国发展道路与制度选择的自主性；是否体现大小国家权利平等，摒弃集团政治与排他性安排；是否秉持共同安全、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价值导向。价值正当性维度从理念合法性层面判断多边机制的根本立场，区别于西方主导的价值先行与意识形态评判标准，为整个评价体系确立了价值坐标。

^① 徐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内涵及时代意义”，《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1-22 页。

2. 安全治理绩效维度。安全治理绩效是评价体系的现实基础，聚焦多边机制在区域与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实际效能，以综合安全、共同安全为标尺，摒弃单一军事同盟逻辑。评价内容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领域：传统安全层面侧重冲突预防、危机管控、边境稳定、维稳防控等合作成效；非传统安全层面涵盖反恐禁毒、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公共卫生安全、跨国组织犯罪治理等领域的合作水平。同时，该维度还关注安全供给的公平性，即是否优先回应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关切，是否摒弃零和思维与牺牲他国安全的排他性安全模式，突出安全治理的实用性与普惠性。

3. 发展合作实效维度。发展合作实效是非西方多边机制评价体系的核心内容，充分体现发展实效优先的基本原则，以发展实绩、民生改善、区域联通为核心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贸易投资便利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水平；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金融合作与发展融资成效；减贫脱困、就业促进、民生保障、技术转移与发展能力建设贡献；以及合作模式对全球南方国家发展自主性的提升作用与可推广价值。这一维度将发展权置于评价中心，以结果导向替代形式主义程序偏好，彰显发展型多边主义的本质特征。

4. 制度运行效能维度。制度运行效能维度考察多边机制自身的组织架构、决策模式与治理效率，强调协商民主与务实高效相统一，不追求与西方制度形式的机械同构。评价内容包括：决策机制是否体现平等协商、开放包容，是否存在霸权主导或内部等级化倾向；机制运行的制度化水平、政策执行力与成员国履约效率；内部分歧管控、危机应对与协调成本控制能力；适配区域现实、服务合作目标的制度适配性。该维度摒弃了程序至上的形式化标准，更加注重制度运行对合作目标的支撑作用，体现了内生性与实用性的统一。

5. 包容外溢与可持续韧性维度。包容外溢与可持续韧性维度是评价体系的延伸指向，衡量多边机制的外部效应与长期生命力。在包容性与外部效应层面，重点考察机制是否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是否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全球多极化进程，是否缓解全球发展失衡与南北差距，是否与现有国际组织形成互补并增量供给全球公共产品。在可持续韧性

层面，关注成员国政治共识基础与利益契合度、应对外部压力与地缘冲击的抗风险能力、机制升级与代际传承潜力及在地区格局变动中保持稳定合作的内生动力。该维度从长时段视角判断多边机制的全球价值与持久生命力。

总之，非西方多边机制评价体系以对西方中心主义知识霸权的反思为起点，以主权优先、内生自主、共同安全、发展实效、平等协商、文明多样为基本原则，构建起涵盖价值正当性、安全治理绩效、发展合作实效、制度运行效能、包容外溢与可持续韧性的系统性框架。整个体系实现了价值原则与评价维度的有机统一，既摆脱了单一西方标尺的意识形态束缚，又形成了可比较、可检验的学理化分析工具。其内在的学理本质是，从价值先行转向现实先行，从外部强加转向内生建构，从霸权秩序再生产转向全球治理民主化。

三、基于非西方评价体系的上合组织治理效能再评估

基于前文构建的非西方多边机制评价体系，以主权平等、内生自主、共同安全、发展实效、平等协商、文明包容为原则，从价值正当性、安全治理绩效、发展合作实效、制度运行效能、包容外溢与可持续韧性五个维度对上合组织进行系统性再评估，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还原其真实治理效能，揭示其作为新型多边机制的独特价值与制度优势。

（一）价值正当性：坚守非西方多边主义的核心立场，具备坚实合法性基础

从价值正当性维度来看，上合组织从成立之初便严格恪守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协商一致、互利共赢等原则，高度契合非西方多边评价体系的价值观内核，它的合法性并非来自外部认可，而是源于成员国的共同需求与自主选择。

上合组织始终坚持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明确反对以“民主”、“人权”等名义干涉成员国内政，拒绝意识形态划线与集团对抗。2002 年 6 月，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上合组织第二次峰会上，由成员国元首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是上合组织的一个奠基性的纲领性基础文件，被称为上合组织的“宪法”，它在第二条“原则”中开宗明义地规定了“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国家边界不可破坏，互不侵犯，不干涉内政……所

有成员国一律平等，在相互理解及尊重每一个成员国意见的基础上寻求共识”的核心规则。^①这构成了非西方多边体制“主权优先、自主决策”的制度基石，区别于西方主导机制的规则霸权与价值干预。2007年，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上合组织又一个基础性、纲领性的法律文件，它进一步重申：相互尊重各自根据本国历史经验和国情选择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的权利。^②从而以条约形式固化不干涉内政、尊重发展模式多样性的非西方治理准则。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强调：成员国主张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权利，强调相互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原则是国际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③这是在新形势下对上合组织核心价值的再次确认和发扬光大。

上合组织奉行大小国家权利平等，在决策中坚持协商一致原则，充分尊重中小成员国的发展诉求与安全关切，不搞霸权主导、不设一票否决、不形成内部等级结构。“协商”是“上海精神”的重要内涵。《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在第十六条“通过决议程序”中明确指出：“本组织各机构的决议以不举行投票的协商方式通过。”^④同时，上合组织尊重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与不同发展道路的差异性，倡导“尊重多样文明”，将文明包容与合作共赢作为组织存续的精神纽带。2006年上合组织上海峰会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明确指出，“必须尊重和保持世界文明及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应互相尊重文明差异，各种文明应平等交流，取长补短，和谐发展”^⑤。2015

①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编：《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第4页。

②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国人大网，2018年12月24日，http://www.npc.gov.cn/zgrdw/huiyi/cwh/1103/2008-12/24/content_1866831.htm

③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2025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s://www.mfa.gov.cn/zyxw/202509/t20250901_11699651.shtml

④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编：《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第15页。

⑤ 《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2006年6月15日，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07年7月31日，https://www.mfa.gov.cn/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0707/t20070731_9867707.shtml

年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批准的《上海合作组织至 2025 年发展战略》强调，成员国要“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与进步”，“重视维护国内不同民族和宗教间的和谐，巩固各民族、宗教和谐共存的悠久传统，开展有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参与的跨文明对话”^①。2018 年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青岛宣言》明确提出，要“巩固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成员国的文化传统和习俗，保护并鼓励文化的多样性。”^②2019 年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强调，“进一步巩固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上合组织地区推进文明对话，造福各国人民”^③。正是始终坚持协商一致决策的基本原则和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上合组织实现了成员国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多元复杂地区的和平相处，闯出了一条文明共存共荣的新路，为上合组织全方位合作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由此可见，上合组织的价值立场完全立足于欧亚大陆的历史文化与地缘现实，其正当性植根于内生需求与主权平等原则，而不是对西方制度范式的模仿。西方以“缺乏强制性权威”、“决策不够高效”为由否定其价值合法性，本质上是将自身决策模式绝对化、普世化，忽视了多边主义本身具有的多元实现形式。

（二）安全治理绩效：应对地区核心威胁成效显著，绝非“清淡化”安全平台

在安全治理绩效维度，上合组织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为导向，聚焦地区最紧迫、最现实的安全挑战，形成了高度务实且成效显著的合作体系，有力驳斥了“论坛化、清淡化”的不实指责。

上合组织在地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势力猖獗的特殊背景下诞生，其核心安全使命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在传统安全与地区稳定领域，上合组织通过边境管控、军事互信、联合演习、危机沟通等机

①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до 2025 года.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овет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10 июля 2015 г. <https://rus.sectsc.org/images/07e8/0b/1c/1605079.pdf>

②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青岛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8 年 6 月 11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dozys_673577/dqzsoys_673581/shhz_673583/zywj_673595/201806/t20180611_7627431.shtml

③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新华网，2019 年 6 月 15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6/15/c_1124625929.htm

制，有效缓和了成员国间历史遗留的边界争议与安全猜忌，极大降低了地区冲突风险，为中亚地区从冷战后动荡转向总体稳定提供了关键制度支撑。在上合组织前身“上海五国”时期，本着相互尊重、互谅互让精神，“上海五国”机制国家分别于1996年和1997年先后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从而成功实现了成员国之间的边境地区安全，开启了边境地区和平稳定安宁的新时期，为五国建立团结互信、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世界其他地区和平解决类似问题创造了先例，彰显了上合组织新安全观的价值引领和实践示范效应。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上合组织的治理效能更为突出。以“三股势力”、毒品走私、跨国组织犯罪为重点，地区反恐机构常设运作，情报交流、联合执法、网络安全、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日趋成熟，多次成功挫败极端势力渗透与暴恐风险，显著提升了地区安全韧性。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2001年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合组织成立峰会上签署了该组织第一个正式法律条约《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①，为成员国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构建了非西方集体安全范式。2004年，上合组织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建立了地区反恐怖机构，为上合组织打击“三股势力”提供了机制保障。2005年后，上合组织开始定期举行“和平使命”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对“三股势力”形成强大震慑。2009年、2017年，上合组织元首相继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和《上海合作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②，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打击“三股势力”的法律体系，标志着上合组织打击“三股势力”实现法制化。截至2025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反恐能力建设、情报交流、去极端化、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等方面开展了有效合作，挫败1400余起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案件，开展40余次“和平使命”、“天山”、“协作”等联合反恐演习和联合行

① 《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2001年6月15日，上海），<https://chn.sectsc.org/files/43441/43441>

② 《上海合作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中国人大网，2018年12月29日，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1905/t20190521_281792.html

动,地区恐怖袭击频次较成立初期大幅下降,地区安全与各国稳定显著提升。在打击贩毒、非法贩运武器和非法移民等跨国犯罪活动方面,2004年,上合组织首次通过打击贩毒的合作文件,随后出台了禁毒战略,并开展了“捕鼠网”、“蛛网”等联合禁毒行动,成效显著。2008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合作打击非法贩运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品的协定》,积极应对跨国有组织犯罪。^①在信息安全领域合作方面,2005年,上合组织首次提出要防范信息恐怖主义,将上合组织安全合作从传统领域扩展到网络空间。2006年6月15日,成员国元首签署了上合组织第一个关于信息安全合作的专门性文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国际信息安全的声明》^②,随后出台了共同行动计划、政府间合作文件和共同措施,开展了网络联合反恐演习并逐渐使之机制化。在应对流行病等方面,2018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共同应对流行病威胁的声明》正式签署,^③开启了上合组织应对“软性”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序幕。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上合组织积极应对,出台了包括联合声明、共同措施在内的多项举措,彰显了成员国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信心和决心,显示了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巨大潜力。近年来,面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物安全、金融安全等新型挑战,上合组织亦快速组织协同应对行动,签署相关合作文件,展现出较强的危机响应能力,为新形势下应对多样化的新型非传统安全威胁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西方舆论常以“没有军事同盟条款”、“不具备强制执行力”来贬低上合组织的安全功能,但这恰恰是上合组织区别于北约等同盟体系的优势所在。上合组织以共同安全而非排他性安全为目标,以合作安全而非威慑对抗为路径,以综合安全而非单一军事安全为内容,其安全效能体现为风险预防、

①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合作打击犯罪协定》(2010年6月11日,塔什干), <https://chn.sectsc.org/files/270429/270429>

②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国际信息安全的声明》(2006年6月15日,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07年7月31日,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wj_683106/200707/t20070731_9388594.shtml

③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0年11月10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011/t20201110_9869240.shtml

环境稳定、韧性提升，而非对外威慑与集团对抗。上合组织自成立以来，作为核心区的中亚在周边乱象险情不断的情况下一直保持着难得的稳定大局，彰显了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强大效能。显而易见，将上合组织这种稳定器功能简单地说成“低效松散”，是对地区安全现实的严重无视。

（三）发展合作实效：推动区域联通与民生改善，成果可见可感

发展合作实效是非西方评价体系的核心标尺。上合组织坚持以发展促安全、以合作谋稳定，在经济联通、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成果，完全打破了“只谈安全、不重发展”、“重宣言、轻落实”的片面认知。

在经贸与互联互通领域，上合组织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深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合作，大力促进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效激活了欧亚大陆腹地的发展潜力。中俄、中国与中亚油气管道、中欧班列规模化运行、跨境口岸升级、区域交通走廊建设等重大项目落地，极大降低了区域交易成本，提升了内陆国家的出海能力与发展空间。成立 20 多年来，上合组织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等一系列基础性合作文件，为区域经济合作奠定了重要法律基础，构建了官方、半官方多层次合作机制，为经贸合作发展提供了相对完善的机制保障。上合组织成员国保持了较快和稳定的增长，GDP 平均增速高于全球同期平均增速。^①以 2023 年为例，上合组织成员国的 GDP 平均增速为 4.25%，同期全球平均 GDP 增长率仅为 2.7%，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增长率则为 1.7%。^②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2025 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合组织+”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尽管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但 2024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的 GDP 总量增长了 5% 以上，高于全球水平”^③。成员国人均国民收入也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以中亚成员国为例，哈萨克斯坦 2014 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12090 美元，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这一指标一直保持在一万美元以上，2025 年更是

① 李建民：“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下的区域经济合作”，载戚振宏主编：《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机遇和挑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 年，第 180-181 页。

② “上合组织成员国 GDP 增速远超全球平均”，2024 年 7 月 4 日，<https://cn.inform.kz/news/shangchengguogdpquan-116738>

③ Заседание в формате «ШОС плюс». 1 сентября 2025 г. <https://promishkino.ru/articles/politika/2025-09-01/zasedanie-v-formate-shos-plyus-4386246?ysclid=mo0wfjp94y66342297>

达到 14770 美元，超过俄罗斯位居独联体国家之首。^①乌兹别克斯坦于 2009 年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正在向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稳步迈进。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也分别于 2013 年和 2014 年先后脱贫，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②成立 20 多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快速增长。以中国为例，近 5 年来，中国同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接连突破 3000 亿、4000 亿、5000 亿美元，2024 年达到 5124 亿美元。^③2025 年，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额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 1063 亿美元，首次跃居中亚各国第一大贸易伙伴。^④在互联互通上，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 11 万列；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输气超 5000 亿立方米；开通国际公路运输线路近 1.4 万公里。^⑤在投资方面，中国对其他成员国投资存量超 840 亿美元。^⑥

在民生与减贫维度，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农业合作、减贫经验交流、公共卫生合作、教育与人文交流持续深化，直接惠及各国民众。许多成员国通过技术转移、产能合作、就业带动，实现了经济结构优化与民生改善，发展成果可感知、可评估、可追溯。与西方主导的部分多边机制偏重规则输出，并强调政治条件不同，上合组织发展合作坚持无附加条件、不搞排他性壁垒、重落地实效、强自主主导，更加契合发展中国家的真实需求，与西方主导的经济胁迫与阵营化分工形成鲜明对比。

从非西方评价视角看，判断多边机制是否有效的关键，既不在于议程设置是否华丽，也不在于表决程序是否为西方式的，而在于是否真正解决发展问题，是否改善民生福祉。上合组织以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证明，其发展合

① Айсулу Омарова. Казахстан вышел в лидеры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по ВВП на душу населения – данные МВФ. 1 августа 2025 г. <https://www.zakon.kz/finansy/6487380-kazakhstan-vyshel-v-lidery-postsovetskogo-prostranstva-po-vvp-na-dushu-naseleniya-dannye-mvf.html>

②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тановятся всё богаче. 10 ноября 2022 г. <https://www.mk.ru/economics/2022/11/10/strany-centralnoy-azii-stanovyatsya-vsyo-bogache.html>

③ 王毅：“鉴往知来，携手推进上海合作组织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5 年 8 月 30 日第 6 版。

④ “商务部欧亚司负责人谈 2025 年中国-中亚货物贸易情况”，2026 年 1 月 18 日，https://www.mofcom.gov.cn:8443/xwfb/sjzfrfb/art/2026/art_270483e390aa4a3887485973245eabf2.html

⑤ 参见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 开创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25 年 9 月 2 日第 2 版。

⑥ 参见同上。

作功能具有高度务实性与有效性，绝非形式化的论坛摆设。

（四）制度运行效能：协商高效与灵活适配，超越形式主义效率观

西方对上合组织“松散低效”的批评，大多集中于决策机制：无强制表决、无惩罚性条款、协商一致导致效率不足。但从非西方评价体系的制度效能标准来看，效率不等于强制，有效不等于同构，上合组织的制度运行恰恰体现了高度适配地区现实的治理优势。

首先，协商一致并非低效，而是在多元主体、复杂地缘格局下降低协调成本、提升履约意愿的理性选择。上合组织成员国政治制度、发展水平、安全诉求差异显著，强制表决极易引发分裂与退出，而协商一致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保障政策可持续执行。实践表明，上合组织在联合军演、反恐行动等关键领域行动迅速，协同顺畅，其务实性效率远高于形式上的程序效率。实际上，上合组织的协商一致性并不是僵硬的教条，《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在第十六条“通过决议程序”中指出，“任何成员国都可就所通过决议的个别方面和（或）具体问题阐述其观点，这不妨碍整个决议的通过……如某个成员国或几个成员国对其他成员国感兴趣的某些合作项目的实施不感兴趣，他们不参与并不妨碍有关成员国实施这些合作项目，同时也不妨碍上述国家在将来加入到这些项目中来”^①。

其次，组织采取渐进制度化路径，不追求一步到位的超国家架构，而是根据需求逐步完善机构设置、法律工具与合作机制，从会晤机制到常设机构，从双边协作到多边规则，呈现出内生、稳健、可扩展的制度成长轨迹。上合组织成立以来，建立了涵盖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的 50 多个合作机制，^②形成了以元首理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总理会议为经济合作总协调、外长会议为政治安全统筹、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为专业支撑的完整机制体系，为各方搭建了平等协商、共促发展的有效平台。同时，上合组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和议事规则，从宪章到条约，从专项公约到落实计划，基本

^①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编：《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年，第 15 页。

^② “李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2025 年 11 月 19 日，https://so.china-embassy.gov.cn/zgyw/202511/t20251119_11755763.htm

实现各项合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关系向制度化、法治化、长期化方向发展。这种需求导向型的制度化，避免了制度超前与水土不服，提升了机制韧性。

最后，上合组织具有高度灵活性与包容性，通过成员国、上合组织伙伴等分层参与模式，扩大合作半径而不降低决策效率，形成了“核心稳定+外围拓展”的弹性结构。西方以自身“高效率强制机构”为唯一标准，本质是制度霸权思维，忽视了不同地区需要不同制度形态的基本规律。

（五）包容外溢与可持续韧性：推动多极化，具备长期生命力

从包容外溢效应与可持续韧性来看，上合组织不仅是地区组织，更成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多极化的重要力量，其吸引力与生命力持续增强。

上合组织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不针对第三方，与联合国及其他国际、区域组织保持协调互补，为全球治理提供增量公共产品。随着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白俄罗斯先后成为正式成员、更多国家申请加入或深化合作，上合组织的代表性与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凝聚欧亚大陆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平台，有力对冲了单边主义与集团对抗趋势。成立 25 年来，上合组织始终是真正多边主义的坚定倡导者和践行者。在国际舞台上，成员国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双重标准，反对搞阵营对抗和集团政治，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全球治理重要议题上，上合组织提出一系列共同主张：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均衡、协调、普惠、开放的发展观，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上合组织的理念与主张，丰富了全球治理的思想内涵，为应对全球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提供了重要理念和路径。

在外部压力与地缘变局下，上合组织展现出较强韧性。面对大国博弈、外部制裁、疫情冲击、能源和粮食供给波动等多重挑战，成员国始终保持政治共识，合作基础未被动摇，安全与经济两条主线协同稳定，体现出深刻的利益契合与战略互信。这种以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为纽带的凝聚力，远胜于

单纯基于价值观捆绑的同盟体系。

可以说，上合组织的可持续性并非来自外部压力或强制约束，而是来自内生需求与互利共赢，它的长期发展潜力与对全球治理的贡献被西方舆论严重低估了。

基于非西方多边机制评价体系对上海合作组织进行系统再评估可见，西方对上合组织的所谓“低效、松散、论坛化、清淡化”的评判，本质上是单一制度标尺裁剪多元现实，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从价值正当性、安全治理绩效、发展合作实效、制度运行效能、包容外溢与可持续韧性五大维度审视，上合组织始终坚守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共同安全、务实发展、协商一致、文明包容的非西方多边主义特质，在稳定地区局势、应对非传统安全、促进区域联通、改善民生福祉、推动多极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展现出高效、务实、稳健、包容的独特治理效能。

上合组织的实践充分证明，非西方多边机制不必依附西方制度范式，完全可以走出一条符合地区历史、文化与现实需求的合作道路。其治理效能的真正衡量标准，不是是否符合外部模板，而是是否回应了成员国的真实需求，是否能够实现地区和平稳定，是否能够推动共同发展繁荣。这既是对上合组织真实面目的还原，也为理解新型多边主义、重构全球治理评价体系提供了重要实践依据。

四、基于非西方评价体系的上合组织短板与完善空间

在本文构建的非西方多边机制评价体系下，上合组织的治理绩效与发展模式理应得到充分肯定。无论是在主权平等与互不干涉内政的价值坚守上，还是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的实践成效上；无论是在发展实效导向的合作路径上，还是在平等协商、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上，上合组织均高度契合新型多边主义的内在要求，其治理效能突出，历史成就显著，整体上是成功且高质量的新兴多边实践。但同时也应看到，作为一项前无先例的制度探索，对照主权优先、内生自主、共同安全、发展实效、平等包容、文明多样等原则，以及价值正当性、安全绩效、发展实效、制度效能、可持续韧性五大评价维度，上合组织在运行实践中仍存在若干短板与弱项，与理想型的非西方多边

机制标准尚有一定差距。

（一）对照“发展实效优先”原则，经济合作绩效仍显不足

按照非西方评价体系“以实质性发展成果为核心标尺”的要求，多边机制应把民生改善、区域联通、减贫发展、经济融合作为重中之重。相较安全领域的突出成效，上合组织在经济发展合作实效维度仍存在明显短板。

一是区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高，多边层面的制度性经济整合不足，合作成果更多体现为项目层面的点状突破，尚未形成网络化、机制化的区域经济生态；二是金融支撑体系滞后，缺乏统一的区域性开发金融机构与常态化本币结算协作机制，对重大互联互通与产能合作的资金保障能力不足；三是多边经济合作多停留在倡议与共识层面，项目统筹、落地督导、成效评估机制不健全，部分合作议程推进缓慢，与“重实效、重落地”的评价标准存在差距。

（二）对照“共同安全与综合安全”原则，安全合作的均衡性仍有欠缺

非西方评价体系强调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可持续安全，要求安全供给兼顾各方关切、覆盖全域议题、突出预防与韧性。上合组织虽在反恐、边境管控等安全合作领域成效显著，但对照综合安全标准仍显得不均衡。

一是安全合作重心长期集中于“三股势力”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产业链安全等发展型安全议题的统筹谋划不足；二是安全资源配置更多向核心成员国倾斜，对中小成员国差异化安全关切的回应与保障能力有限，共同安全的普惠性有待提升；三是安全预警、危机管控、灾后协同等机制建设相对薄弱，安全合作的前瞻性与韧性不足，尚未完全达到综合安全、全域安全的评价要求。

（三）对照“制度运行效能”标准，制度化与执行能力仍有薄弱环节

依据非西方评价体系对制度适配性、决策效率、执行效能的要求，多边机制应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实现务实高效、权责清晰、督导有力。上合组织坚持协商一致与渐进制度化，有效维护了主权平等，但也带来相应短板。

一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与规则供给不足，大量合作仍以政治宣言、联合声明为主，刚性约束偏弱；二是执行监督、成效评估、争端协调等配套机制不健全，部分共识难以转化为落地行动，与“重执行、求实效”的标准

存在差距；三是秘书处及专门机构的统筹协调权、资源动员权相对有限，跨领域、跨成员协同能力不足，难以充分支撑复杂议题下的高效治理；四是在组织扩容后，成员异质性上升，协调成本增加，决策周期有所拉长，在平等性与效率性之间的平衡仍需优化。

（四）对照“内生性与发展自主性”原则，区域内生发展动力仍显不足

非西方评价体系高度强调内生性、自主性、可持续性，要求多边合作立足成员国自身需求，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减少外部依赖。以这一标尺衡量，上合组织仍存在提升空间。

一是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整合程度不高，经济互补性挖掘不充分，内生增长动能偏弱；二是技术合作、创新协同、人才培养等能力建设方面合作不足，较多停留在资源与产品合作层面，对提升成员国自主发展能力的支撑有限；三是部分领域合作仍受外部市场、外部金融体系、外部规则影响较深，区域自主调控能力与抗风险能力不足，与“自主可控、内生驱动”的理想状态存在距离。

（五）对照“包容外溢与可持续韧性”标准，社会基础与长期韧性仍需夯实

按照非西方评价体系对包容性、社会认同、可持续韧性的要求，高质量多边机制应具备广泛社会基础与强抗风险能力。上合组织在这一方面仍存在短板。

一是合作主要依托政府间高层推动，企业、地方、智库、民众等社会层面参与不足，合作成果的社会感知度与获得感不强；二是人文交流、教育合作、媒体互信、青年交往等“软联通”滞后于基础设施“硬联通”，民心相通程度不足，影响长期合作的社会根基；三是面对外部地缘挤压、舆论抹黑与单边制裁等压力，集体应对与话语协同能力不足，国际传播与形象塑造滞后于实践发展，组织整体韧性与外部认同度仍有提升空间。

（六）对照“文明平等与多元包容”原则，跨文明治理能力仍可深化

非西方评价体系将文明平等、包容互鉴、多元共治作为重要原则，强调尊重差异、协调多样。上合组织虽以“上海精神”倡导文明包容，但在实践层面仍有可深化的空间。

一是跨文化、跨宗教、跨区域协调机制尚不系统，在文化差异引发的认知分歧、地方壁垒等问题上缺乏常态化沟通平台；二是在数字治理、绿色转型、伦理规范等新兴议题上，尚未形成体现地区文明特质与发展诉求的共同规则，对全球治理的价值引领与话语供给不足。

综上，以非西方多边机制评价体系衡量，上合组织的治理模式与总体绩效无疑是合格且优秀的，其主流与基本面完全契合新型多边主义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要求。当前存在的短板与弱项，并非方向性、制度性缺陷，而是在高标准、严要求下呈现的阶段性差距与完善空间，集中体现为发展实效不够均衡、制度执行不够有力、内生动力不够强劲、社会基础不够厚实、长期韧性有待提升等问题。正视这些差距，并非否定上合组织的成就，而是为了使其更加符合非西方多边主义的理想标准，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真正成为引领 21 世纪新型多边主义的典范机制。

五、彰显非西方多边优势视角下上合组织的优化提升路径

在非西方多边机制评价体系下，上合组织已然展现出主权平等、共同安全、务实高效、包容不排他的鲜明制度优越性，具有成为新型多边主义典范的巨大潜能。面向未来，上合组织的优化完善，不必照搬西方多边机制的制度架构与运行模式，而应在坚持自身特色与优势的基础上，扬长补短、精准施策，针对对照非西方评价标准所显现的发展短板精准发力，进一步放大制度潜能、提升治理效能，使组织发展更加契合主权平等、内生自主、发展实效、共同安全、包容可持续的核心要求。

（一）强化发展实效导向，补齐经济合作短板，夯实共同发展根基

针对经济发展合作实效不足、安全与经济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突出弱项，以“发展实效优先”为根本遵循，推动上合组织从安全驱动型向安全与发展双轮驱动转型。加快推进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安排，完善多边经贸协调机制，推动形成机制化、网络化的区域经济合作格局；强化金融支撑体系建设，加快建设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健全本币结算、发展融资、信用担保等多边金融工具，为互联互通与产能合作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建立重大项目统

筹、跟踪督导与成效评估机制，推动合作共识加快转化为落地成果，切实提升经济合作对地区增长、民生改善与减贫发展的实际贡献，使发展实效成为上合组织最鲜明的优势标识。

（二）完善综合安全布局，提升共同安全普惠性，增强安全治理整体性

对照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可持续安全标准，在巩固反恐维稳优势的基础上拓展安全合作外延。统筹推进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协同治理，将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金融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网络与数据安全等纳入核心合作议程，构建覆盖全域的综合安全体系；健全安全预警、危机管控、应急联动机制，提升安全合作的前瞻性与韧性；更加兼顾中小成员国安全诉求，完善安全资源分配与能力建设支持机制，提升安全公共产品的普惠性与可及性，真正实现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共同安全。

（三）提升制度化与执行效能，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增强治理刚性

围绕制度运行效能偏弱、重共识轻落实的短板，坚持协商一致原则不动摇，同时稳步提升制度刚性与执行能力。推动更多合作领域从政治宣言向具有约束力的协定转化，完善规则供给体系；建立履约监督、成效评估、分歧协调等配套机制，强化决策落实的闭环管理；适度强化秘书处及专门机构的统筹协调、资源动员与跨领域协同能力，提升机构专业化水平；在坚持平等性前提下探索分领域、分议题的灵活决策安排，合理降低协调成本、提升治理效率，实现平等包容与务实高效的有机统一。

（四）增强内生发展动能，提升自主可控水平，减少外部依赖

紧扣内生性、自主性、可持续性要求，着力提升区域自主发展能力与抗风险能力。深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合作，充分挖掘经济互补潜力，培育内生增长动力；加强科技协同、技术转移、人才培养与创新合作，推动合作从资源型、项目型向能力建设型升级；稳步推进区域内规则对接与标准协调，增强在金融、贸易、数字等领域的自主调控空间，降低对外部市场、外部货币体系与外部规则的过度依赖，真正实现立足自身、主导自身的内生发展格局。

（五）厚植社会基础与民心相通，提升包容性与长期韧性

针对社会参与不足、软联通滞后、外部认同偏弱等问题，持续扩大合作

的包容性与社会根基。推动合作主体从高层政府向地方、企业、智库、媒体、青年等多元主体延伸，增强社会参与度与成果感知度；深化教育、文化、旅游、媒体等领域交流合作，打通人文纽带，夯实民心相通基础；加强集体话语传播与形象塑造，主动讲好上合的合作故事，对冲负面叙事与外部舆论压力，提升国际认同与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组织在复杂地缘环境中的凝聚力与可持续韧性。

（六）深化文明互鉴与价值引领，提升上合模式的示范意义

立足文明平等、多元包容、不搞排他集团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彰显非西方多边主义的价值优越性。完善跨文明、跨宗教、跨区域对话协调机制，以“上海精神”引领包容共治；在数字治理、绿色发展、安全伦理等新兴领域提炼体现地区发展诉求的共同理念与规则、方案，提升对全球治理的价值引领与话语贡献；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不针对第三方、不搞对抗性集团，以实践证明新型多边主义的先进性与可行性，使上合组织真正成为引领 21 世纪国际关系转型的标志性多边平台。

六、结 语

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体系遭遇严峻考验的时代背景下，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叙事框架，以更加公允、更加贴近现实的非西方视角重新认识多边机制的价值与效能，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更具有紧迫的现实必要性。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评价范式将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制度模式、价值偏好与治理标准包装成“普世价值”，以单一标尺衡量多元世界，不仅遮蔽了非西方国家多边实践的真实成效，也加剧了全球治理的认知分裂与话语霸权。破除这种认知垄断、反思其内在局限性，已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转型的重要前提。

本文所构建的非西方多边机制评价体系，本质上是对霸权话语的理性超越，是对主权平等、内生发展、共同安全、互利共赢等多边主义本源价值的回归。以此标尺审视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与治理实践，能够更加清晰地把握其作为新型多边合作平台的独特优势与历史方位，也更能增强我们对上合组

织未来发展的战略信心。

作为 21 世纪新型多边主义的开创性实践，上合组织承载着非西方世界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推动共同发展繁荣的厚重使命。它以“上海精神”为纽带，摒弃集团对抗与强权逻辑，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同盟体系与排他性机制的合作新路，为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开展多边协作提供了重要示范。在单边主义冲击国际秩序、地缘博弈加剧、全球治理赤字凸显的当下，上合组织的稳定存在与稳健发展，本身就是对多极化潮流的有力支撑，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推动，对完善全球治理的建设性贡献。

需要强调的是，倡导非西方视角、构建非西方评价体系，绝不意味着对立西方、排斥西方，更不是要走向阵营化与新的分裂。非西方多边主义的核心要义，并非以一种霸权替代另一种霸权，而是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局限、历史偏见与话语垄断，超越零和博弈的陈旧逻辑，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发展道路的自主性、治理模式的差异性。上合组织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不依附既有范式、不盲从外部标准，坚持从地区实际与共同需求出发，以务实合作解决真实问题，以包容开放凝聚广泛共识。这种不搞排他、不搞对抗、注重实效、兼顾公平的治理探索，既代表了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诉求，也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具备面向未来、引领变革的强大生命力。

展望前路，上合组织的成长与完善仍将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在充分肯定其历史性成就的同时正视阶段性短板，在彰显制度优越性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治理效能，既是组织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站在全球治理转型的历史关口，上合组织肩负的已不仅是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区域共同发展的区域使命，更承载着为新型国际关系探路、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上合智慧与多边方案的世界意义。坚定看好上合组织的发展前景，尊重其自主探索的实践路径，支持其在包容普惠、合作共赢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必将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注入持久而坚实的动力。

（责任编辑 宋羽竹）

国别与区域研究

俄乌冲突后俄罗斯政治研究中 欧亚主义视角的当前问题与发展前景

德米特里·叶夫列缅科*

【内容提要】自2022年以来，欧亚主义在国家领土开发与外交构想上实现了理论深化：对内，提出“西伯利亚化”战略，主张将俄罗斯的精神、文化与经济重心东移，通过在西伯利亚建设新中心及探讨迁都议题，强化国家安全与发展后劲，扭转区域发展失衡；对外，确立俄罗斯“文明型国家”的属性，并提出“世界多数”理论，意在联合广大非西方国家，消解单极霸权，构建公正的多极化国际体系。在2022年2月之后，俄罗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界的欧亚主义者代表人物就俄罗斯内政与外交所提出的理念与倡议中，欧亚主义已从最初的文明研究范式，发展为指导“转向东方”及“大欧亚”构想战略基础。在应对特朗普重返白宫带来的不确定性时，欧亚主义流派强调：尽管俄美可能重启对话，但两国利益与价值观的深层分歧依然存在。俄罗斯应保持战略定力，在利用俄美互动机遇的同时，绝不以损害中俄关系为代价。继续深化与中国、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的协作，是俄罗斯在后西方时代维持战略主体性、推动大欧亚建设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欧亚主义 欧洲安全秩序 西伯利亚化 文明型国家 世界多数

【中图分类号】D8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2-0048(19)

俄罗斯的欧亚主义是一个相当宽泛且略显模糊的概念。欧亚主义在社会思想史上首先被视为一种文明研究范式，该研究范式在俄罗斯的奠基人是尼

* 德米特里·叶夫列缅科（Д. В. Ефременко），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系海外区域研究部主任，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古拉·丹尼列夫斯基（Н. Данилевский），他提出了文化-历史类型（文明）理论，将俄罗斯连同斯拉夫世界视为一种新兴且独特的文化-历史类型。^①20世纪上半叶，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Н. Трубецкой）、彼得·萨维茨基（П. Савицкий）、格奥尔吉·维尔纳茨基（Г. Вернадский）等俄罗斯欧亚主义重要代表人物摒弃了丹尼列夫斯基对民族性的过度关注，将“俄罗斯-欧亚”视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实体和独特的地理历史世界；它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但在地缘政治和文化方面又有别于二者。^②尽管这一时期俄罗斯欧亚主义的领军人物不接受十月革命并流亡海外，但他们理想中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存在于1939年之前苏联国境之内的联邦制欧亚国家。

苏联时期，列夫·古米廖夫（Л. Гумилев）是欧亚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被视为转向现代欧亚主义的过渡性人物。古米廖夫的多部著作内容涉及公元1000年至2000年中期欧亚大陆北部及中部森林草原地区的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广受欢迎。然而，他提出的“民族起源激情理论”的科学性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③

苏联解体后，欧亚主义思潮的兴起源于“地缘政治灾难”（借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著名表述）的现实处境，以及在新的国际秩序中为俄罗斯发展寻找战略方向的迫切需求。同时，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部分知识分子精英对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和亲西方外交路线的日益不满，也是推动欧亚主义转向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成为反对首任总统叶利钦政治改革阵营所支持的思想潮流。在这些反对者中，亚历山大·杜金（А. Дугин）的名字被频繁提及，尤其在西方分析人士眼中，他是新欧亚主义的关键代表人物。他撰写了大量关于俄罗斯欧亚主义发展方向的文章，并发表了诸多言论。^④但他的思想非常复杂多样：除欧亚主义基本命题外，还融合了欧洲“新右翼”等多种西方思想流派的理论主张。

①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 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Взгляд н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авянского мира к Германо-Романскому. СПб.: «Глаголь», 1995.

② Трубецкой Н. С. Взгляд на русскую историю не с Запада, а с Востока // Классика геополитики, XX век: СПб. М.: АСТ, 2003.

③ Шнирельман В. А., Панарин С. А.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Гумилев: основатель этнологии? // Вестник Евразии. 2000. №3. С.5-37; M. Laruelle, "Lev N. Gumilev (1912-1992): biologisme et eurasisme en Russie", *Revue des études slaves*, 2000, No.1-2, pp.163-190.

④ Дугин А. Г.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путь. М.: Арктогея-Центр, 2002.

亚历山大·杜金的声望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一些其他对欧亚主义思想发展作出独特贡献的学者。特别是亚历山大·帕纳林（А. Панарин），他曾深入探讨文明议题，将俄罗斯视为一个融合了斯拉夫、突厥及其他北欧亚民族身份认同的东正教文明国家，并认为俄罗斯有能力与其他传统文明共同抵御西方的全球化。^①鲁斯捷姆·瓦希托夫（Р. Вахитов）则发展了另一种欧亚主义思想研究路径，重点关注欧亚各民族文化遗产与其地缘政治地位之间的相互关联。^②

欧亚主义思想的政治意义在 2007 年 2 月后得到显著提升。当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实质上宣告了俄罗斯单方面亲西方政策的终结，因为这种政策忽视了俄罗斯在安全领域的核心利益。自此，俄罗斯外交政策专家们开始寻求替代性理念，意在取代让俄罗斯融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构想。随后数年间，一些曾主张优先与美国和欧盟合作的俄罗斯知名外交与防务政策专家相继提出一些理念，这些理念与复兴的欧亚主义意识形态内核高度契合。这一转变也促使欧亚主义者自身的理论主张在更大程度上积极适应具体的外交政策需求。

自 2000 年代末以来，“转向东方”理念在俄罗斯政治话语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经济层面，这一倡议是对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地位提升的自然回应，也反映了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多元化的必要性。在政治层面，“转向东方”是对与中国关系优先性的明确认可，相比日益复杂的与西方的关系，俄中关系更加稳固和具有前景。同时，这也体现了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即便在南非加入之前）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转向东方”被确立为官方政策的一部分，极大地推动了俄罗斯临太平洋地区的发展。

后苏联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强，尤其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建立关税同盟的这一重要阶段，需要更多意识形态层面的论证。在这一过程中，欧亚主义思想因剔除了针对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的批评而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一思想体系通常被称为“务实的欧亚主义”^③。该思想体系为区域

① Панарин А. С.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мире. М.: Алгоритм, 2002.

② Вахитов Р. Р.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Логос. Эйдос. Символ. Миф. СПб: Владимир Даль, 2023.

③ Винокуров Е. Ю.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ое евразийство//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3. №.2. С.49-58.

一体化提供了理论基础，成为解决主要后苏联国家实际经济问题的工具，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的商品、资本和服务市场，并与东西方外部伙伴开展合作。

早在 2010 年代中期，就出现了进一步发展欧亚主义理论构建和使之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日益契合的迫切需要。于是，“大欧亚”概念应运而生。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在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和顿巴斯武装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转向持续对抗，这一转变推动了“大欧亚”概念的发展。与此同时，“大欧亚”理念也反映了这样一种认识：后苏联区域一体化进程俨然构成了对整个欧亚大陆（乃至更广阔地区）更大规模变革的一种独特补充，而这些变革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密切相关。为“大欧亚”理念发展作出主要贡献的是谢尔盖·卡拉加诺夫（С. Караганов）及其身边的外交政策专家。“大欧亚”建设被理解为：“朝着一个新的地缘战略共同体——一个合作发展、和平安全的泛欧亚空间迈进，旨在消除冷战遗留的分裂，防止出现新的分裂，并协调合作伙伴之间的分歧与摩擦。”^①

在官方层面，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构建已被视为一项长期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2017 年于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表示：“俄罗斯所设想的欧亚伙伴关系的未来，不仅仅是建立国家和经济体之间的新联系。它应当改变整个大陆的政治经济面貌，为欧亚大陆带来和平、稳定、繁荣以及全新的生活品质。我们的公民需要非常明确的东西：安全、对未来的信心、能工作并提升家庭福祉的机会。为他们提供这些机会，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在这方面，大欧亚并非抽象的地缘政治构想，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一个真正面向未来的文明工程。”^②

自 2022 年 2 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国际关系与安全专家中的欧亚主义支持者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概念框架的发展和领土发展战略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① Караганов С. А. От поворота на Восток к Большой Евразии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017. №5. С.16.

② Путин рассказал о взгляде России на будущее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14 мая 2017 г. <https://ria.ru/20170514/1494251850.html>

一、“西伯利亚化”战略与俄罗斯迁都至西伯利亚地区的议题

优先发展俄罗斯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是重要的政治议题，随着“转向东方”战略的实施，相关讨论热度显著上升。在与普京总统关系密切的政治领导人中，出生于图瓦共和国的谢尔盖·绍伊古（С. Шойгу）在推动这些理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绍伊古曾于 2012 年至 2024 年担任俄罗斯国防部部长，自 2024 年起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早在 2012 年，绍伊古就提出，有必要设立专门负责西伯利亚和远东发展事务的部委，并考虑将首都迁至西伯利亚的可能性。2021 年 8 月，绍伊古在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科学家的会晤中进一步提议，在西伯利亚新建 5 个人口规模达 30 万~50 万的科学、工业和经济中心，并将俄罗斯的首都迁至西伯利亚。^①

绍伊古的顾问安德烈·伊尔尼茨基（А. Ильницкий）随后发表文章，提出了更多论据来支持这些建议。^②伊尔尼茨基认为，建设新城将是堪比苏联时期伟大工程的国家级重大项目，有助于扭转西伯利亚人口减少的趋势，并推动经济增长。伊尔尼茨基还提到了西伯利亚新城建设计划中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其中包括：向动员型经济转型，以及与日益分裂的全球世界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离；国家在领导与组织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需严格控制国家的经济、信息和地理空间；经济规划需要考虑市场经济的特点；金融体系应当服务于经济增长的目标；放弃导致少数特大城市快速扩张的城市化战略；依据“非我即敌”原则实现精英阶层的民族化；在发展西伯利亚的背景下培养新一代管理人才，并将部分首都职能转移至西伯利亚的某个城市；依托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历史和文化来发展教育；吸引海外同胞回国；确保人口增长，包括将生育率提高到不低于人口自然更替的水平；俄罗斯军队和军工综合体应当被视为经济动员、经济复兴的核心，包括基于国防采购的管控与规划原则；国土空间规划与社会政策必须紧密结合国家的军事布局与安全需求。

① Шойгу предложил построить в Сибири города-миллионники и перенести столицу. 5 августа 2021 г. <https://www.rbc.ru/politics/05/08/2021/610c0dc49a79475818b2d7f0>

② Ильницкий А. Время больших решений. 23 сентября 2021 г. <https://www.pnp.ru/politics/vremya-bolshikh-resheniy.html>

显然，伊尔尼茨基方案的“动员”方针旨在为应对军事冲突作准备——其主要对手甚至不是乌克兰，而是其背后的西方集体。然而，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关于需要国家预算巨额投入议题的讨论暂时中止，时任国防部长的绍伊古则忙于处理其他事务。

2023年，卡拉加诺夫以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和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为基础组建了一个项目组，负责制定“西伯利亚化”战略——一项旨在推动俄罗斯“精神、文化与经济中心东移”的综合性国家发展新战略。^①值得关注的是，该计划的制定本质上是为乌克兰战事结束后的俄罗斯指明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并确立地缘政治优先目标。“西伯利亚化”战略是此前“转向东方”战略方向的延续。但正如卡拉加诺夫等项目参与者所指出的，以往的“转向东方”主要侧重毗邻太平洋的远东地区及部分北极地区，而幅员辽阔的西伯利亚腹地则被排除在国家地缘政治重新定位的范围之外。最初的“转向东方”战略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局限性与矛盾性：

远东地区虽已获得亚洲市场的准入，却并未与西伯利亚及乌拉尔周边地区完全融合。这导致远东地区的蓬勃发展与西伯利亚大陆的停滞不前之间出现断层。与此同时，亚洲则持续展现出强劲的经济发展趋势，一方面为俄罗斯创造了新机遇，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区域内部发展的失衡。^②

“西伯利亚化”战略可以说是“大欧亚”构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实践。“大欧亚”概念的提出，旨在改变一个固有认知：将俄罗斯视为占据亚洲大部分地理空间的欧洲国家。2010年代中期提出的“大欧亚”概念的各种版本，首先将俄罗斯定位为欧洲（实际上是欧盟）与亚洲（主要是东亚国家）的潜在纽带；其次，强调俄罗斯亟须作为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加入不断发展的亚洲区域合作进程。随着21世纪20年代初俄罗斯与西方对抗加剧，“大欧亚”理念日益发挥着推动俄罗斯在政治制度、经济乃至文化上疏离欧洲的功能。然而，该构想的客观缺陷在于，乌拉尔以东的众多俄罗斯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人口持续减少。这些地区内部及其与亚洲经济增长主要地区（尤其是中国）

^① Вукович Н. А., Караганов С. А. и др.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2.0, или Сибир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2025. С.7.

^② Там же. С.6.

之间的交通连接不足，令人对“大欧亚”构想的可行性产生怀疑。因此，“西伯利亚化”战略若能成功实施，将为“大欧亚”构想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截至 2026 年年初，卡拉加诺夫的项目组提交了两份关于开发西伯利亚议题的报告，并发表了系列文章。在一份题为《转向东方 2.0，或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化》的报告中，明确了该项目的关键性政治、文化优先目标，其中包括俄罗斯“欧洲之旅”的彻底终结，以及俄罗斯作为复兴的欧亚大陆平衡者、整合者和资源库的新角色定位。^①西伯利亚作为新兴的多极化国际秩序中极为重要的地区，必须在这一转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西伯利亚被视为一个特殊区域，其开发将对当代俄罗斯的国家认同产生深远影响，可强化国家制度体系，并为俄罗斯社会中最活跃的群体开辟施展创造力的新机遇。国家发展重心向西伯利亚转移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力，能巩固国家安全，增强科技潜力。西伯利亚资源潜力的开发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将显著加强俄罗斯在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工业、贸易合作中的地位。报告中还探讨了将首都迁往西伯利亚或将部分全国性行政职能转移至西伯利亚某一城市的可能性，但作者同时也强调了可能引发的社会经济和区域发展失衡风险，并指出必须大幅提升移民政策的效能。^②

德米特里·叶夫列缅科（Д. Ефременко）、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和伊利亚·科济洛夫（И. КОЗЫЛОВ）于 2026 年年初发表了一篇英文文章，^③深入探讨了迁都至西伯利亚的问题。文章指出，将一批国有企业的总部迁至西伯利亚城市是一种积极趋势。作者认为，下一步应将一些重要部委和机构迁至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进而在西伯利亚建立总统官邸。叶夫列缅科、卡拉加诺夫和科济洛夫还提出了其他观点。他们指出，特别军事行动的经验——包括积极方面（莫斯科的防空反导系统已被证明能提供可靠防护）——表明，将所有决策中心和通信枢纽集中在一个城市群的做法存在巨大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就建设一座紧凑型首都城市的问题进行讨论，或许可以基于

① Вукович Н. А., Караганов С. А. и др.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2.0, или Сибир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2025. С.7-9

② Там же, С.51-52.

③ D. V. Yefremenko, S. A. Karaganov, I. S. Kozyllov, “Corridors of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The International North-South Transport Corridor in Greater Eurasia’s Geopolitic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26, Vol.24, No.1, pp.114-127.

某个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历史定居点展开。

西伯利亚具有首都功能的城市的选址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

1. 地缘政治考量。不仅需要加强俄罗斯在中部地区的力量，还需根据潜在移民流动、资本流向、价值链形成和创新生产发展等因素，对整个欧亚大陆中心区域进行重新布局。

2. 对邻近城市的辐射效应。周边城市可承担科技教育、技术创新、能源供应等不同功能。

3. 靠近跨大陆交通干线并具备交通可达性。除了现代化的国际机场外，还应有便捷的的东西向与南北向公路及铁路干线；大型河流夏季可通航则更为理想。

4. 自然气候条件。最理想的是接近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气候环境，即日照时间充足、季节温差不大以及宜居的环境。

5. 文化底蕴。需有机融合东北罗斯与欧亚大陆中心及西伯利亚地区的历史脉络，周边应有考古遗址与历史遗迹，并具有承载大型博物馆展览项目的潜力。

政府代表、专家和公众预计将于近期围绕“在西伯利亚设立具有首都功能的城市”这一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归根结底，这一问题关系到俄罗斯东部地区政治影响力的显著提升。然而，此次讨论须回避对西伯利亚政治地位的解读，以免导致西伯利亚地方主义意识形态的复苏，^①更要警惕近年来在西方文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关于俄罗斯联邦领土构成与民族结构的“去殖民化”叙事。

二、欧亚运输格局

2026年年内，在“西伯利亚化”战略框架下，将对运输-物流问题进行详细研究。此次讨论的核心是“欧亚运输-物流格局”这一概念。该概念是

^① S. Watrous, “The Regionalist Conception of Siberia, 1860 to 1920”, in Diment G., Slezkine Y. eds., *Between Heaven and Hell: The Myth of Siberia in Russian Cul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pp.113-132.

在欧亚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叶夫根尼·维诺库罗夫（Е. Винокуров）主持撰写的银行报告中首次提出的。^①欧亚运输格局是一个由相互连接的东西向和南北向国际运输走廊与路线组成的网络，旨在保障欧亚国家内部及跨大陆的互联互通。该架构的基础是连接亚洲、欧洲和中东的东西向与南北向国际运输走廊，总长度超过 5 万公里。这些相互连接的走廊可产生协同效应，具体表现为货运量的大幅增长（可达 40%）。维诺库罗夫及报告的其他作者认为，欧亚运输格局形成的前提是主要国家和超国家组织开展广泛合作，且不受制于安全问题和国际秩序方面的矛盾。同时，他们回避了地缘政治竞争，这种竞争也体现在欧亚大陆的各类运输-物流基础设施发展项目中。这种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报告的作者们所任职的国际组织成员国之间本就存在政治利益分歧。

在开发西伯利亚计划以及同样由卡拉加诺夫主导的另一个“南北国际运输走廊”计划框架下，欧亚运输格局的意义得到了更全面地理解。首先，以卡拉加诺夫为首的专家团队提出了与俄罗斯亚洲部分的交通、物流发展及生产力布局相关的战略选择方案。保守方案是完善和升级现有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将各种运输方式连接成一个统一系统，并遵循先前已确定的生产力布局模式。风险更高的方案则是对现有布局进行重大调整，首先就要重新定义西伯利亚及其部分城市中心的政治功能，使其在全俄罗斯范围内发挥作用。“西伯利亚化”战略思想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因为它能够克服单纯经济考量的局限性。

除了经济效益外，还须考虑长期发展、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巩固安全等任务，而安全目标参数需要结合特别军事行动的经验重新审视。就安全而言，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特别军事行动框架下的战斗结束后，俄罗斯不要指望在与西方的关系中获得长期喘息的机会。将基础设施建设中心从俄罗斯欧洲部分转移到乌拉尔以东地区，对于巩固特别军事行动的地缘政治成果至关重要。最终，这意味着需要重新审视交通政策的根本基础，意味着构建运输

^① Винокуров Е., Ахунбаев А., Шашкенов М., Забоев 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транспортный коридор «Север – Юг»: создание 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 каркаса Евразии. Доклады и рабоч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банк развития. 2021. <https://eabr.org/analytics/special-reports/mezhdunarodnyy-transportnyy-koridor-sever-yug-sozдание-transportnogo-karkasa-evrazii/>

格局的主要目标不再是服务于过境运输，而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保障内部互联互通，并为俄罗斯自身，尤其是其亚洲领土的区域加速发展创造基础设施条件。

卡拉加诺夫主导的计划参与者认为，欧亚运输格局的新构想从设计阶段起就必须与亚洲邻国进行协调，充分利用它们的资源和经验。^①俄罗斯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给俄罗斯带来了多重影响，包括欧亚大陆运输-物流路线与价值链体系的发展。其中一些影响已显现出积极效益，而另一些则可能在未来产生积极作用，届时欧洲有望解除对俄罗斯过境潜力的限制。“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发展以东西向为主的运输走廊来保障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当前在欧亚中部地区连接各类运输走廊的经验表明，这在提升货运总量和运输效率（尤其是集装箱运输）方面具有显著的增长潜力。^②

除了利用这些机遇之外，在现有（主要是东西向的）运输路线基础上增加一系列新的南北向路线，从而将西伯利亚的城市、自然资源开发中心与中国北部、西部地区以及蒙古连接起来，这一切都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至关重要的南北向路线是南北国际运输走廊，它将俄罗斯与伊朗相连，并进一步延伸至印度及印度洋沿岸其他国家。南北向的运输通道极其重要，因为当前此类路线的不足实际上阻碍了俄罗斯亚洲地区资源潜力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更遑论建立新的、更复杂的产业链。^③

南北国际运输走廊对俄罗斯的特殊价值在于，其稳定运行将大大降低黑海海峡、苏伊士运河或曼德海峡货物运输可能面临的封锁风险。此外，南北国际运输走廊的一条支线很可能延伸至西伯利亚的某个城市，该城市未来或可承担首都职能；若该城市能同时连接中国的铁路与公路网，也合情合理。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欧亚运输格局的发展应有助于减少俄罗斯对海上运输的

① D. V. Yefremenko, S. A. Karaganov, I. S. Kozylov, “Corridors of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The International North-South Transport Corridor in Greater Eurasia’s Geopolitics”//*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26, Vol.24, No.1, p.117.

② Винокуров Е., Амангельды С. и др.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транспортный каркас. 2024. <https://eabr.org/analytics/special-reports/evrazijskij-transportnyj-karkas/>

③ Караганов С. А. и др.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коридоры России в Евразии: гео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Доклад по итогам ситуацион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Москв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экономики», 2025.

依赖，这是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①

对欧亚运输格局的广义理解，应将北方海航道纳入其中。作为 21 世纪主要运输通道之一的北方海航道，正成为日益加剧的政治经济竞争（包括军事层面的角力）舞台，同时也为各国利用该航线发展贸易与开发北极资源提供了合作空间。^②在中俄合作的背景下，北方海航道常被视为“冰上丝绸之路”的关键组成部分。^③对俄罗斯而言，这也意味着必须加快北方海航道全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并确保其与内陆稳定连接。最终，欧亚运输格局中俄罗斯部分的全面形成，唯有通过重启拥有多个太平洋出海口的跨极地多式联运大通道这一超级项目来实现；同时，北方海航道有望与南北国际运输走廊互相衔接，特别是在利用内河航运潜力的条件下。这项工作的推进动力源于 2025 年 9 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第十届东方经济论坛，普京总统在该论坛上责成政府评估有关建设跨北极运输走廊的提案。^④

从长远来看，如果俄美关系、中美关系能够得到显著且持久地改善，那么通过白令海峡建立美洲与欧亚大陆之间稳定交通连接的长期构想将有可能成为现实。^⑤理论上，该计划有望通过统一的陆路交通网络连接全球最大的两个市场。2025 年 8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克雷奇会晤后，这一构想再次引发热议。然而，实现该构想最基本的条件是：在特朗普政府发挥重要调停作用的和平进程下完成特别军事行动，最终将俄罗斯的安全利益纳入考量范围。即便如此，更现实的预期或许只是俄美在北极地区的合作氛围回暖，而非双方在连接美洲与欧亚大陆交通体系方面采取具体举措。

① Караганов С. А. и др.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коридоры России в Евразии: гео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Доклад по итогам ситуацион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Москв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экономики», 2025.

② Стрельникова И. А. Арктическая кооперация в рамках БРИКС в условиях его расширения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для меняющегося мира// Вестни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2025. Т.20. №1. С.176-201.

③ *China's Arctic Policy, Belt and Road Portal*, January 26, 2018, <https://eng.yidaiyilu.gov.cn/p/46076.html>; Erokhin V., Gao T., Zhang X. *Arctic Blue Economic Corridor: China'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Connectivity Paradigm in the North*, 2018, pp.2-15.

④ Путин поручил оценить идеи по развитию Трансарктического коридора. 5 сентября 2025 г. <https://ria.ru/20250905/putin-2039904686.html>

⑤ J. A. Oliver, *The Bering Strait Crossing: A 21st Century Frontier Between East and West*, London: Information Architects, 2006.

三、2023 年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创新点与“世界多数”理论

2023 年，俄罗斯正式批准了新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其主要创新在于将俄罗斯定义为“文明型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а-цивилизации）：“一千多年的独立国家经验、前辈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与欧洲传统文化和欧亚大陆其他文化深厚的历史渊源，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确保不同民族、种族、宗教和语言群体在共同的土地上和谐共处的能力，决定了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特的国家文明、一个将俄罗斯民族和组成俄罗斯世界文化和文明共同体的其他民族汇聚一堂的幅员辽阔的欧亚和欧洲太平洋大国的特殊地位。”^①这一定义出现在外交政策纲领文本中，反映了文明范式（包括在俄罗斯政治领导人的言论中）日益受到重视的趋势。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的发言尤为典型。例如，在 2022 年的俱乐部会议上，他使用“文明”或“文明的”相关术语达 15 次，而在接下来的 2023 年，更是多达 23 次。^②

然而，俄罗斯学术界对“文明型国家”这一概念尚未达成统一共识，而关于俄罗斯在东西方之间地位的讨论已持续了两个多世纪，^③仅仅将“文明型国家”概念纳入外交政策构想，远不能终结这场讨论。批评者认为，国家的存在并不依赖于文明的特征；^④或者说，俄罗斯试图与西方和欧洲、个人主义文化及自由主义价值观保持距离的做法，可能会对俄罗斯的身份认同产生负面影响。^⑤然而，俄罗斯现行外交政策构想中提出的这一新概念，完全可以被视为俄罗斯政治学界欧亚主义流派的代表性成果。他们秉承尼古

①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В. Путиным 31 марта 2023 г.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s://www.mid.ru/ru/detail-material-page/1860586/?lang=cn&ysclid=mibpblzvevn73426259>

② P. Robinson, The Rise of Russian Civilizationism, April 28, 2025, https://russiapost.info/politics/russian_civilizationism

③ A. Walicki, “A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Marxism.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④ Блюхер Ф. И. Можно ли утверждать, что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 особ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20. №10. С.203-209.

⑤ D. A. Davydov, “The Temptation of Civilizationism: Is It Possible to Resist the West without Bias and Reductive Thinking?”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25, Vol.23, No.4, pp.30-48.

拉·丹尼列夫斯基和列夫·古米廖夫的思想，主张将俄罗斯视为众多历史文明中的一个独特的欧亚文明。

对于俄罗斯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官方解读，其根本意义在于：俄罗斯文化认同的核心特征被界定为民族与宗教的多样性，而民族主义（包括俄罗斯民族主义）是不可接受的，它是一种可能威胁“文明型国家”统一的破坏性力量。^①从本质上看，这种对“文明型国家”的阐释宣告了：各民族本是命运共同体，他们在千余年间于北欧亚大陆上携手建立了一个伟大强国——俄罗斯。

对俄罗斯作为“文明型国家”的阐释也是以苏联的历史成就为基础的。主要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及其在战后国际秩序构建中的作用：“鉴于俄罗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在建立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和消除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俄罗斯作为世界发展的主权中心之一，肩负着独特的历史使命，即维护全球力量平衡和建立多极国际体系，确保在统一和建设性议程的基础上为人类的和平和持续发展创造条件。”^②

将俄罗斯描述为一个独特的（欧亚）“文明型国家”，旨在强调其与西方根本性的决裂，否定西方在价值和政治制度层面的普世性主张。但这也突显了“文明型国家”（如中国、印度、伊朗）及文明共同体（如阿拉伯、非洲、拉丁美洲）在国际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在国际政治的理论反思层面（特别是考虑到 2022 年后的新动态），也有必要阐明：那些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拒绝服从西方国家强加的政治意识形态准则的各种文明、文化及国家，在原则上是具有统一性的。正因为如此，“世界多数”的概念在俄罗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世界多数”（Мирово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这一术语于 2022 年由俄罗斯政

① M. P. Laruelle, *Russia'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War in Ukraine*, The 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rch 2024, p.15, 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migrated_files/documents/atoms/files/ifri_laruelle_russia_ideology_2024.pdf

②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В. Путиным 31 марта 2023 г.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s://www.mid.ru/ru/detail-material-page/1860586/?lang=cn&ysclid=mibpblzevn73426259>

治学家卡拉加诺夫和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Ф. Лукьянов）首次引入公共话语和学术话语。他们最初是为了寻找“非西方”概念的替代表述。卡拉加诺夫强调，俄罗斯终将与欧洲-大西洋文明分道扬镳，并在日益崛起的“世界多数”中占据一席之地。^①严格来说，这一论证思路并非全新创见。例如，法里德·扎卡里亚（F. Zakaria）就将西方与“其他地区”（the Rest）对立起来，认为后者的崛起正是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驱动力。^②

而在 2022 年的特殊背景下，尤为重要强调的是强调俄罗斯属于“多数派”阵营，作为“少数派”的西方孤立俄罗斯的企图终将无果。因此，卡拉加诺夫等政治分析家将研究焦点锁定在“世界多数”阵营内部的相互关系和权力平衡，特别是俄罗斯与中国及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根据他们的分析，“‘世界多数’阵营涵盖百余个国家对乌克兰冲突持中立态度甚至亲俄立场的国家，这些国家始终保持与莫斯科的经贸往来及各种合作关系。‘世界多数’并非‘反西方’，但其客观需求与当前全球主义精英定义的西方利益相悖”^③。也就是说，俄罗斯与“世界多数”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其中包括：推动国际秩序民主化，消除全球政治和货币金融体系中的新殖民主义行径、胁迫与讹诈手段，建立替代性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全力保障（包括运用军事-政治手段）那些追求独立自主外交的国家享有完整主权。对俄罗斯而言，“世界多数”本身具有独特价值，与之合作需要运用网络外交手段，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开放式议题联盟，并将政治-外交重心转向深耕区域伙伴关系。^④

很显然，这种对“世界多数”概念的诠释从一开始便带有鲜明的政治属性。^⑤这种认知的建立以下列理解为基础：俄罗斯与中国以及众多强调对西

① Караганов С. А. От не-Запада к Мировому большинству//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2. Т.20. №5. С.6-18.

② F.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And the Rise of the Rest*.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③ Караганов С. А., Крамаренко А. С., Тренин Д. В.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Мирово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Москв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экономики», 2023. С.5. https://globalaffairs.ru/wp-content/uploads/2023/12/doklad_politika-rossii-v-otnoshenii-mirovogo-bolshinstva.pdf

④ Там же.

⑤ A. Stent, “Russia, the West and the ‘World Majority’” January 25, 2024, <https://www.russiainmatters.org/analysis/russia-west-and-world-majority>

方保持相对独立立场的全球南方国家，不仅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权方面构成多数，更是在人口规模、领土面积、资源潜力以及包括经济效能等在内的日益增多的指标上占据主导地位。正是在这些国家正在发生影响深远的变革：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经历人口结构转型，推进城镇化进程，大众群体适应信息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标准，主要科技平台数量持续增长，身份认同的转变。这些变革的最终结果显然是塑造 21 世纪全新的“后西方”时代世界图景。

自 2022 年以来，全球南方的众多国家以不同方式避免像西方那样将俄罗斯定性为侵略者或乌克兰战争的唯一责任方。不能将这种态度仅仅解释为这些国家试图维持与俄罗斯及美国、英国、欧盟的平衡关系。它们更倾向于赞同俄方观点——强调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野心、经济扩张及其对俄罗斯安全利益的漠视，是导致俄乌军事行动的深层根源。这与全球南方国家自身的经验相符：它们屡次遭遇西方的双重标准、单边主义以及对合作伙伴核心利益的漠视。在这些国家看来，西方的行为是新殖民主义战略的变体，而美国、英国、欧盟对俄乌冲突和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的不同反应，恰恰印证了这种判断。在他们看来，诸如欧盟前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著名的“欧洲花园论”之类的言论，是欧洲式傲慢甚至种族主义的又一次公开表现。^①

应当指出，“世界多数”概念与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本质上很相近。显然，俄罗斯对“世界多数”概念更为详细地阐述充分考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基本原则，将其视为基于公平公正、互利互惠、尊重主权和开放包容原则向新型国际关系过渡的最权威、最全面的纲领。习近平主席于 2023 年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进一步拓宽了共同发展一系列理念的空间，这些理念关乎文明对话以及抵制西方推行文化、政治制度单一化的企图，而西方的主导地位已日趋式微。

除文明议题以外，“世界多数”最核心的课题在于寻求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原则，使之成为更稳定持久的全球政治现象，而不是出于各种原因不愿认同西方政治体系的异类国家群体。在这样的背景下，诸如上海合作组织、金

^① M. Bishara, “Josep Borrell as Europe’s racist ‘gardener’” October 17, 2022, <https://www.aljazeera.com/opinions/2022/10/17/josep-borrell-eu-racist-gardener>

砖国家等制度性结构或多边对话机制，正是非西方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加强多元互动的平台，是一种独特的、不受制于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机构和机制的多边对话平台。尽管当前上合组织与金砖国家仍以政府间合作为主，但已显现出网络化结构效应，不同层级的国际行为体正在逐步构建紧密的横向联系。

这些互动本身就可被视为跨文明团结网络的构建。从长远来看，“世界多数”的形成应基于以下重要原则：尊重文明多样性；为维护文化独特性与传统价值而相互支持、团结协作；缓和各种宗教间的紧张关系并开展不同信仰（首先是传统宗教）间的对话；在解决全球生态与社会问题、实现能源与粮食安全方面确保公平正义；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数字化转型领域形成统一路径。

遵循这一逻辑，向公正、平衡的多极世界转型，已经成为大多数国际行为体的首要任务。此举旨在加强这些行为体在全球政治中的主体性，消解单极世界秩序模式中的等级制度——因为在这种单极模式下，国家主权的大部分会被霸权国家所侵蚀。

四、结论：当代俄罗斯欧亚主义面临的问题与发展前景

许多分析人士将 2022 年 2 月开始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视为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最激烈、最危险的对抗。正确认识此次军事政治挑战的严峻性，有助于推动俄罗斯外交政策和长期发展战略新思想、新举措的制定。相关工作有望在未来几年得到持续推进，当前的核心议题在于确定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结束后的政策方向。俄罗斯政治学界的欧亚主义代表们在这些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活动涉及方方面面——从把握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趋势，到制定关乎俄罗斯乌拉尔以东地区优先发展的具体方案。

为进一步推进“西伯利亚化”战略，应优先考虑人口问题、移民流动调控、生产力布局以及俄罗斯亚洲部分的区域发展问题。短期内有必要将这些讨论提升至国际层面，吸引中国、蒙古及中亚国家的相关专家、政府机构与

商界代表参与其中。尽管西伯利亚开发需要进行重大的内部变革，但这项战略的长期实施只有在“大欧亚”国际框架内才可能实现。

与此同时，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外交政策专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迫切需要应对美国政策的变化。重返白宫的特朗普正试图改变游戏规则，不再依靠以往联盟和全球治理多边框架中的惯性领导力，而是致力于美国经贸、政治和科技优势的最大化。这一策略能否成功尚未可知，但特朗普的举动所引发的动荡正在成为未来国际局势变化的重要因素。贸易体制自由化与世贸组织机制几乎被新一轮保护主义浪潮推翻；本就效率不高的全球治理机构正在加速退化，或不再具有全球代表性；对国际法原则的广泛认同日益沦为纸上空谈。

西方集团内部的团结互信正经历着严峻考验。俄美重启对话，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 2022—2024 年俄罗斯提出的“世界多数”概念的有效性问题的，这一概念曾设想将全球政治划分为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区域，以及俄罗斯与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区域。

严格来说，特朗普登上美国及世界政治舞台，本身就是美国政治分裂和西方文明面临整体危机的又一表现，与此同时，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正在日益加强。特朗普主义本身就是源自西方霸权主义政治文化内部的一种挑战。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运动，本质上是一场针对自由主义政策和左翼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觉醒主义）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特朗普主义的支持者认为，进步精英应承担主要责任，他们将启蒙时代的自由主义理想扭曲为一种思想上的（最终演变为政治上的）少数人专制，他们强加给社会（不仅是西方社会）彻底的道德相对主义，从而将社会引向无可挽回的衰败。^①

在国际舞台上，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府给所有国际行为体（包括盟友、伙伴、客户、对手和公开的敌人）带来了全球规模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这给了美国更大的行动自由。另一方面，特朗普及其亲信为制造这种不确定性投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其目的是借此获取重大的战略优势，夺取对盈利性资产和重要战略资源的控制权，即便这些资产和资源目前掌握在美国的亲密

^① Ефременко Д. В. Es schwindelt. Перекройка мира как MAGA-проект//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5. Т.23. №3. С.74.

盟友或伙伴手中。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对“世界多数”和“大欧亚”的构想极有可能因具体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调整，这主要涉及与乌克兰军事对抗活跃阶段的结束、俄美对话的重启以及解除制裁限制的前景。俄美之间达成“大交易”的可能性本身就是一个全新变量，而这种可能性早在 2022 年还微乎其微。特别军事行动初期，俄美关系的基调是尖锐的地缘政治对抗，拜登政府用民主和价值观的说辞加以掩饰，实则排除了建设性对话的可能。如今，特朗普主张以交易主义逻辑构建对话，这种基于政治现实主义与利益平衡的逻辑对莫斯科而言是可理解、可接受的。而在 2010 年代末，俄美以“大交易”形式达成战略妥协的可能性被描述为“通过在次要问题上相互让步，俄美双方得以实现各自的核心利益”^①。

如果确实有可能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大交易”，那么对于俄罗斯国际关系与安全专家而言，这一预期可能引发新的理念分歧，其核心首先在于对俄美“大交易”长期效益和可靠性的评估，其次在于衡量莫斯科为达成交易作出让步的尺度与可接受度。主张恢复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战略伙伴关系的人士很可能重新活跃起来。事实上，即便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这种观点也时有出现，例如，普京总统前助理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В. Сурков）曾发表文章指出，或许可以由美国、欧洲和俄罗斯共同构成“三位一体的地缘政治联盟”，以此与“全球南方”相抗衡。^②

俄罗斯政治学界与国际关系专家中的欧亚主义流派代表显然将坚持另一种思路。该观点认为，在特朗普任内重启俄美政治对话为莫斯科提供了诸多机遇，应当加以利用，同时又不损害俄罗斯现有欧亚政策已经取得的成果。即使俄美在某些重大议题上可能达成协议，也无法消除两国利益的分歧。在涉及价值体系以及政治制度规范的认知层面，没有理由期待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可以化解。此外，即便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所谓“大交易”的可持续性也无法得到保证。如果民主党重新执政，美俄“大交易”很可能被单方面修

① Караганов С. А. Перенастройка, а не «перезагрузка»//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09. Т.7. №4. С.68.

② Сурков В. Рождение Севера. 27 сентября 2023 г. <https://actualcomment.ru/rozhdenie-severa-2309262036.html>

改甚至彻底废止。

就实质而言，特朗普政府将试图利用“大交易”前景来破坏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但在欧亚主义者看来，为了与美国达成协议而导致中俄关系的严重损害是不可承受的代价。在安全领域，俄罗斯仍将作为中国可靠的后盾（反之亦然），继续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并在涉及该问题的各种情况下站在中国一方。以欧亚主义视角来看，绝不可能为了迎合第三国而损害中俄关系。

在“全球北方”概念框架内，俄罗斯有可能失去其欧亚主义发展前景以及作为“世界多数”代表的特殊角色。相反，无论与特朗普政府的互动如何发展，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的是继续与中国、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其他成员国一道，携手构建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稳定而公正的国际秩序基础。

（翻 译 李 畅，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宋羽竹）

俄罗斯“转向东方 2.0” 与“一带一路”的互动合作前景*

崔 珩 付兴昶**

【内容提要】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历经十余年演进，从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的被动外交调整，升级为以“西伯利亚化”为核心的“转向东方 2.0”国家战略。该战略以重塑文明独特性、重构国际秩序、再定位外交方向、开发西伯利亚与远东为核心主张，突破了此前仅停留在外交政策层面的局限，成为俄罗斯主动谋划国家发展、重塑欧亚大陆秩序的关键选择。2014—2024年，俄罗斯“转向东方”在贸易结构、能源合作、制度建设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果，亚洲成为其外贸核心市场，中俄能源基础设施合作实现突破，但也暴露出贸易结构失衡、远东发展不均、基础设施碎片化等系统性问题。“转向东方 2.0”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形成高度战略契合，俄罗斯从被动参与者转变为积极共建方，双方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全产业链合作、海洋经济与安全协同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北方航道”与“冰上丝绸之路”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成为合作亮点。二者的互动合作已超越经贸互补与项目合作，升华为重塑欧亚大陆政治经济秩序的战略协作，为欧亚区域一体化探索了平等包容的新路径。同时，双方合作仍面临俄罗斯经济结构单一、内部认知分歧、亚太地缘博弈复杂、西方外部干扰等深层次挑战。

【关键词】转向东方 “一带一路” 中俄关系 西伯利亚化

【中图分类号】D822.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2-0067(24)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俄罗斯文学中的西伯利亚文本研究”（项目批准号：20YJC752014）成果。

** 崔珩，上海政法学院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合作交流培训基地讲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付兴昶，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政治学专业博士生。

俄罗斯自帝国形成以来，始终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徘徊，其国家身份认同充满了内在的矛盾性。19 世纪的俄罗斯思想家彼得·恰达耶夫曾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指出，“我们从未与其他的民族携手并进；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我们似乎置身世间之外，我们没有被人类的全球性教育所触及”^①。恰达耶夫的论断揭示了俄国在面对现代化进程时的身份焦虑与文明归属困境，被视为 19 世纪俄国思想史上西方派与斯拉夫派论争的起点。需要说明的是，恰达耶夫的原意绝不是赞美俄国的独特性，而是借此批判俄国的历史停滞与文化落后，认为其由于脱离西方文明的影响，而陷入了一种“空洞的存在”。后世思想家如别尔嘉耶夫则在此基础上引申，将俄国定义为巨大的“东西方”，即一个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的文明结合部。这种独特的、介于东西方之间的文明定位，塑造了俄罗斯民族心理中根深蒂固的“双头鹰”特性：一面望向欧洲，汲取技术与制度文明；另一面则永恒地注视着广袤而神秘的亚洲。然而，俄罗斯的思想界，无论是哪一流派，都未能产生对亚洲的归属感。

俄罗斯的西方派思想者自不必多言，这一思想流派始终主张俄罗斯属于欧洲，理应回归和拥抱欧洲大家庭。而斯拉夫派虽然提到过“东方”的概念，但是他们理解的“东方”，无论在地理意义上还是文化意义上，都并非今天通常所说的亚洲。斯拉夫派呼吁“回归东方”，实际上是指向相对于西欧而言的斯拉夫文明回归，也就是回归俄罗斯本身，而非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儒家文明。斯拉夫派主张，俄罗斯的传统与历史有别于欧洲，具有自足性，俄罗斯应走自己的道路，就是斯拉夫道路。基于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特性，1921 年萨维茨基、特鲁别茨科伊、苏符钦斯基和弗洛罗夫斯基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出版的集体著作《面向东方·预感和实现·欧亚主义者的观点》（*Исход к Востоку. Предчувствия и свершения.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евразийцев*）中提出欧亚主义思潮，根据其理念，俄罗斯既具有欧洲特征，也拥有亚洲特征，但它既非欧洲，也非亚洲，而是一个“封闭且完整的地理、经济 and 种族整体”。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出现了多种流派的新欧亚主义，

① [俄]恰达耶夫著：《哲学书简》，刘文飞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年，第 6 页。

他们不再满足于学理探讨，而是表现出强烈的实践导向。当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纷纷成为独立国家时，亚历山大·杜金等新欧亚主义学者也逐渐提出了特定的政治和地缘政治理念，并继承了欧亚主义中关于斯拉夫地区自足性的思想。由此看来，无论是斯拉夫主义、西方主义，还是欧亚主义，都没有将目光投向亚洲。

既然俄罗斯主要的思想流派均未以亚洲为导向，那么自 2014 年乌克兰危机以来的“转向东方”为何会发生？“转向东方”是否只是俄罗斯在面临西方战略压力下的自救之举？如果缺乏必要的思想基础，在俄乌冲突或于 2026 年进入尾声、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有望改善的背景下，“转向东方”下一步将如何发展呢？这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

一、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的动因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曾一度全力推行亲西方的外交路线，试图通过政治制度的全盘西化、激进的“休克疗法”经济改革，快速融入大西洋共同体，这也是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背景下几乎所有转型国家的普遍选择。但是，全面倒向西方，非但未能带领俄罗斯走出后苏联时代的困境，反而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经济震荡，加速了其国力的衰落和国际影响力的严重萎缩。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始终没有被西方接纳为“平等的一员”。转型道路带来的深刻挫折感促使俄罗斯民众与精英阶层在叶利钦执政末期开始进行全面的战略反思。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大行其道的新欧亚主义作用下，俄罗斯的目光随之转向已经呈现出勃勃生机的亚太地区。于是，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 1998 年提出“中俄印三驾马车”战略，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转向东方”战略理念开始萌芽，但是仅停留在外交政策层次。

普京在 21 世纪初刚就任总统时便展现出对亚洲的重视。在其首次召开的外交部高级官员会议上提出了“在所有亚洲事务上站稳脚跟”的目标，并明确指出，“俄罗斯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是一致的，二者不可分割”^①。2012 年，普京在第三次竞选总统期间撰写了纲领性文件《俄罗

^① Путин определил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27 января 2001 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135945>

斯与不断变化的世界》，他在文中再次强烈呼吁，“必须努力发展与东方国家的关系”^①，并在 2012 年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向国际社会明确表达了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战略愿望。2011—2012 年，与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关系十分密切的重要智库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在莫斯科、上海等多地组织了多场关于俄罗斯“转向东方”的讨论，并且发表了主题为“奔向大洋”（К Великому океану）的系列报告。然而，客观地看，虽然这一阶段的“转向东方”是俄罗斯学术界积极讨论的议题，但是在具体政策落实和实际成果上进展相对有限，更多的是停留在少数官员和学者的理念表达层面。这也是俄罗斯在历史惯性与现实利益之间、在西方诱惑与东方机遇之间摇摆的真实写照。正是因为“转向东方”缺乏俄罗斯思想史提供必要的思想源泉，俄罗斯学者关于“转向东方”的讨论始终停留在外交政策维度，甚至主要存在于对中国、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喊话之中，看起来更像是俄罗斯为了摆脱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自救之举。

2014 年乌克兰危机以及后来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引发的西方集体制裁，成为俄罗斯加速并实质性推进“转向东方”战略的根本性转折点。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上的孤立、地缘战略上的挤压以及经济金融领域的严厉制裁，俄罗斯不得不彻底重新评估其国家安全的脆弱性以及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从而进行国家发展战略的深刻调整，加快“转向东方”的步伐以改善急剧恶化的地缘政治环境。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总监丹尼尔·叶尔莫拉耶夫指出，“真正的、不可逆的转折点是 2014 年，当时世界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俄罗斯内部，东方路线的支持者不再受到质疑，其主张成了国家共识”^②。2022 年乌克兰危机的全面升级与长期化，以及西方随之而来的史无前例的极限制裁，更是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推向了公开对抗的深渊。俄乌冲突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打破了俄罗斯执着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幻想。

① Путин В. В. 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27 февраля 2012 г. https://er.ru/activity/news/putin-rossiya-i-menyayushisya-mir_76109

② “‘转向东方’，俄罗斯人心中有哪些期待？”，环球网，2023 年 9 月 14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EWsWGqjrF>

俄罗斯对西方信任的破裂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西方违背了 1990 年德国统一过程中对苏联领导人作出的口头外交承诺，当时西方领导人曾保证北约“不会向东扩张一寸”，但北约持续东扩直至今天迫近俄罗斯西部边境的程度。普京对此耿耿于怀，以至于在 2021 年的年度记者会上称：“俄罗斯被欺骗了，简直是被明目张胆地蒙蔽了。”^①即便西方官员和学者始终否认西方对苏联领导人作出过北约不东扩的承诺，^②但是在俄罗斯人看来，西方的否认是对历史的背叛，加剧了俄罗斯对西方的不信任。因此，在俄罗斯，北约扩张被视为对俄罗斯国家生存的直接威胁和对冷战后不扩张之承诺的违背。^③

同时，西方的安全秩序被视为对俄罗斯的一种地缘政治包围——一种旨在孤立俄罗斯、通过在其边境煽动暴力民族冲突和“颜色革命”来削弱其影响力、并最终击败和肢解俄罗斯联邦的“蟒蛇战术”。^④而西方在 2015 年《明斯克协议》上的欺骗态度，进一步摧毁了俄罗斯对西方的幻想。在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承认《明斯克协议》是骗局后，2022 年 12 月 9 日普京总统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原以为还能在明斯克和平协议的框架内达成一致。还能说什么呢？信任问题摆在那里，而信任，当然，现在几乎为零了。”^⑤2022 年俄乌冲突带来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历史性决裂，迫使俄罗斯进一步提速并深化其“转向东方”战略，将其从重要选项提升为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① Путин: РФ «надули, нагло обманули», когда в 1990-х обещали не продвигать НАТО на восток. ТАСС. 23 декабря 2021 г. <https://tass.ru/politika/13281595>

② 2014 年俄罗斯新闻网站“幕后真相”（Russia behind the Headlines）刊登了对戈尔巴乔夫的采访，戈尔巴乔夫称，“‘北约扩张’这个话题根本没有被讨论过，在那些年里也没有被提及……我们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确保北约的军事结构不会扩张，确保在德国统一后，不会在当时的东德领土上部署额外的武装力量。贝克的声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表的……所有能够做且需要做的事情，为了巩固这一政治义务，都已经做完了，并且履行了”。西方国家纷纷援引戈尔巴乔夫的原话否认西方曾承诺北约不东扩。See Steven Pifer, “Did NATO Promise Not to Enlarge? Gorbachev Says ‘No’” *Brookings*, November 6, 2014.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did-nato-promise-not-to-enlarge-gorbachev-says-no>

③ W. Hill, *No Place for Rus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45-46.

④ Bruno Rukavina, “The Crimean Peninsula – A geopolitical and geostrategic review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Forum for Security Studies*, 2022, Vol.6, No.6, p.99.

⑤ “Putin says loss of trust in West will make future Ukraine talks harder”, December 10, 2022, <https://ca.news.yahoo.com/putin-says-loss-trust-west-162840596.html>

在俄罗斯与西方彻底决裂导致外部环境空前恶化的背景下，俄罗斯的“转向东方”战略承载着多重、交织的战略目标。

第一，实现能源经济的战略转型与多元化，将能源出口的重心从日益萎缩且政治风险极高的欧洲市场，果断转向经济充满活力、能源需求持续快速增长的亚太市场。事实上，欧洲在 2022 年俄乌冲突之后逐渐减少了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并将在 2027 年最终停止购买俄罗斯天然气。^①

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能源与原材料的出口。与欧洲逐渐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相比，亚太地区作为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能源需求最旺盛、市场容量最庞大的区域，自然而然地成为俄罗斯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稳定的关键目标市场。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 2025 年 4 月 12 日批准的《俄罗斯联邦 2050 年前能源战略》规划，俄罗斯将“锚定东方”，加速基础设施建设，为向相关市场调整油气及成品油出口创造条件，包括通过北方航道提升北极与远东港口转运能力等。^②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系统的扩建、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即“西伯利亚力量”管道）以及 2025 年中国、俄罗斯、蒙古三方签署的“西伯利亚力量 2 号”管道等重大能源外运基础设施项目的推进与落地，正是俄罗斯能源出口战略“转向东方”的最新成果。

第二，巩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在由美国同盟体系主导的传统西方秩序之外，在拉夫罗夫 2017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提出的“后西方世界秩序”^③中寻求并且确立可靠的战略支点。

第三，解决远东西伯利亚和欧洲本土长期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寄希望于借助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开发蕴藏巨大潜力的远东西伯利亚，抑制东部地区人口流失趋势，以此缩小俄罗斯不同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巨

① 2025 年 12 月 17 日，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批准欧盟在 2027 年年底之前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的法案。2026 年 1 月 26 日，欧盟 27 个成员国正式通过关于逐步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法规。根据该法规，对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 2027 年年初生效，对进口管道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 2027 年秋季生效。

②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50 год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от 12 апреля 2025 г. № 908-р.

③ “Russia calls for ‘post-West world order’” *Washington Examiner*, February 17, 2017, <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news/2306706/russia-calls-for-post-west-world-order/>

大差距。^①

第四，强化俄罗斯自身的“亚太国家”身份认同，积极主动地参与亚太区域的经济整合与安全对话进程，在“东升西降”的百年大变局趋势愈发明显的背景下，至少避免在这一未来将塑造世界格局的关键区域被边缘化。^②上述的多重目标反映了俄罗斯试图通过系统性的“转向东方”，突破西方的战略围堵，力求巩固俄罗斯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关键地位。

俄罗斯社会民众与精英阶层对“转向东方”战略的认知与支持度近年来持续上升，为俄罗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国内政治基础。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在 2023 年 9 月 6 日进行的民调显示，67% 的俄罗斯公民明确表示支持国家的“转向东方”政策，其中多数受访者理性地认为，如果这一政策能够侧重于务实的经济合作而非空洞的地缘政治宣示，“转向东方”将取得“最成功”的效果。^③2025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61% 的俄罗斯民众认为俄罗斯与东方国家文化“有同有异”，仅 23% 认为二者根本不同，11% 认为高度相似，整体对东方文化持客观认知，无极端对立态度；30% 民众对与东方国家合作持积极态度，11% 存在警惕、不信任等负面情绪，反映出认知的多元性。^④俄罗斯民众对东向外交整体持客观且偏积极的态度，认可文化层面的契合性与经济、民间合作的重要性，民意层面为俄罗斯的东向外交提供了社会基础。广泛的民意基础为俄罗斯政府持续推进东方战略提供了内在动力与合法性来源。

与此同时，俄罗斯精英阶层也在此过程中深刻反思并逐渐认清过度依赖西方的历史弊端与现实危害。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资深教授、外交与国防政

① 崔珩：“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61-94 页

② 2023 年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明确将“转向东方”提升为国家战略优先项，强调俄罗斯作为欧亚大国及亚太文明组成部分的特殊地位，旨在通过深化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应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防止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被孤立。См.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В. Путиным 31 марта 2023 г. МИД РФ. <https://www.mid.ru/ru/detail-material-page/1860586>

③ “Идем на Восток!” 6 сентября 2023 г. <https://wciom.ru/analytical-reviews/analiticheskiy-obzor/idem-na-vostok>

④ Вдовиченко Л. Н.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россиян о восточ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Гуманитарий Юга России. Т.14. №5. 2025. С.17-27.

策委员会荣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指出，“俄罗斯正在自觉地、坚定地远离现代形式的欧洲——大西洋文明。西方文明曾经给了俄罗斯很多，但在很多方面俄罗斯已经不再需要它了，更何况它越来越违背俄罗斯的国家历史传统、文化态度和核心价值观”^①。俄罗斯知识精英的思想转变，为“转向东方”战略的全面深化与长期化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支撑。

可见，俄罗斯的“转向东方”战略绝非一时的权宜之计或应激性的外交调整，而是一个深植于自身独特历史脉络、为剧烈地缘政治变化所驱动、并为国家内在经济结构特征所决定的复合型、长期性国家战略选择。“转向东方”经历了从思想萌芽、初步尝试到全面深化与系统化的复杂演进过程，深刻体现了俄罗斯在探寻国家发展道路与文明定位过程中的艰难探索与战略抉择。

二、2014—2024 年俄罗斯“转向东方”的实施成果与讨论

2014 年的克里米亚危机被视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转折点。自那时以来，俄罗斯的“转向东方”战略经历了从理念规划、政策宣示逐步转化为具体政策行动的过程。从 2014 年到 2024 年的十年间，“转向东方”在对外贸易、能源合作、制度建设和区域合作等多个关键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同时也暴露出若干深层次的结构矛盾。这一阶段俄罗斯“转向东方”的实施，不仅为后续“转向东方 2.0”的推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机制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俄罗斯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互动模式。

第一，在贸易结构调整方面，这十年间亚洲在俄罗斯对外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实现了历史性跃升。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持续恶化乃至决裂，客观上引发了明显的贸易转移效应。亚太国家，尤其是中国，填补了西方市场留下的部分空间，构成了对西方“脱钩”进程中的有效替代。^②中国作为俄罗斯在东方最重要、最稳定的战略伙伴，2024 年两国贸易额达 2448 亿美元，同比

① Караганов С. А. От не-Запада к Мировому большинству//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2. Т.20. №5. С.6-18.

② Арапова Е. Торговый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куда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разворачивается Россия?//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23. Т.67. №2. С.41-51.

增长 1.9%，再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 15 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①除中国这一核心伙伴外，俄罗斯与亚洲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关系也在过去十年间取得了长足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积极趋势。印度已经成为俄罗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所占份额接近 10%。而在 2024 年俄罗斯前十大贸易伙伴中，仅有德国、意大利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国家，所占份额合计不足 4%。亚洲在 2024 年俄罗斯对外贸易中的份额上升到 72.6%，而欧洲所占的份额在 2022—2024 年的短短三年间由 42.8% 萎缩到 19.6%（见表 1）。这一深刻的结构性转变，并非西方制裁下俄罗斯的权宜之计，而是“转向东方”战略长期积淀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俄罗斯经贸合作的重心已历史性地、不可逆地锚定在亚洲大陆，也意味着俄罗斯对外贸易格局完成了历史性的结构性转向，亚洲市场成为俄罗斯突破西方封锁、稳定国内经济、实现长期发展的压舱石。

表 1 2022—2024 年俄罗斯对外贸易分布（单位：十亿美元）

时 间 地 区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亚洲	436	494	520
非洲	18	25	28
欧洲	355	163	141
美洲	37	27	27
合计	846	709	716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自制。

然而，贸易结构失衡与对初级产品依赖度过高的问题，依然是俄罗斯与亚洲国家合作面临的最主要、最深刻的挑战。俄罗斯对亚洲的出口商品构成仍然高度集中于能源、各类矿产、粮食及农产品等初级产品。俄罗斯学者认

^① “中俄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助力发展振兴”，《光明日报》，2025 年 5 月 6 日第 12 版。

为，初级产品主导俄罗斯与亚太国家的贸易，一方面反映了俄罗斯资源禀赋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表明，俄罗斯与亚洲国家贸易额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同期国际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周期性上涨，而非源于贸易质量的提升、附加值的增加或产业结构的优化。^①如何在未来持续扩大贸易规模的同时，从根本上优化贸易结构，增加机械装备、高科技产品等高附加值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成为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在下一个阶段必须直面并着力解决的核心议题。

第二，在制度框架构建方面，俄罗斯在过去十年积极探索，试图通过机制化的安排来巩固其“转向东方”的成果。首先，俄罗斯利用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这个平台，将自己与亚洲国家的合作纳入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合作框架（如“一带一路”对接欧亚经济联盟、欧亚经济联盟与东南亚多国签署自贸协定等），以此拓展其经济外交空间，打破西方的经济孤立。其次，创建于 2015 年的“东方经济论坛”（Восточ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форум），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被成功打造成俄罗斯远东开发和国际合作的首选平台与重要名片，俄罗斯瞄准的主要合作对象正是亚太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市场。该论坛每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定期举行，并且已经成为俄罗斯吸引亚太投资、展示远东开发政策与成果、签署重大合作协议的关键窗口。再次，在更宏观的区域合作机制层面，俄罗斯积极参与金砖国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并大力推动自身所倡导的“大欧亚伙伴关系”构想。特别是在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面对西方金融体系的排斥，俄罗斯加速推进与中国、印度等主要贸易伙伴的本币结算，致力于构建独立的支付与清算渠道，以减少对美元和欧元的系统性依赖。^②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的远东开发政策也取得了一定进展。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及相关配套法律法规正式生效并实施，旨在将其打造成面向亚太的枢纽，并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规划进行对接。

① Гнидченко А. А. Взаимосвязи России с ЕС, США, Китаем и АСЕАН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х цепочка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ВШЭ. 2023. Т.27. №4. С.527-549.

② C. Westemeier, M. Campbell-Verduyn, B. Brandl, “Alternative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s in Russia”, *The Cambridge Global Handbook of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5, pp.281-298.

第三，能源合作无疑是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在过去十年中成果最为突出、最具实质性的领域。面向亚太市场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其中，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俄罗斯境内段被称为“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和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系统的扩建，是俄罗斯面向亚太地区修筑的最重要、最具战略意义的油气外运基础设施。上述多个巨型工程的建设 and 投运，为俄罗斯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降低对欧洲管线依赖的战略目标提供了坚实的物理基础和运输保障。即便是日本出于政治考虑追随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其在现实的能源安全需求面前也不得不保持与俄罗斯的合作。日本的三菱集团、三井物产均表示将继续参与“萨哈林 2 号”液化天然气项目。日本前经济产业大臣武藤容治也明确表示，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对日本的能源安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①2025 年 10 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中明确表示，禁止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难度很大”，当面拒绝了美方要其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的要求。美国财政部虽多次强化对俄制裁，但也不得不延长与“萨哈林 2 号”相关交易的豁免许可至 2026 年 6 月。即便“萨哈林 2 号”项目的大部分供应合同将在 2028 年至 2033 年之间陆续到期，日本若因寻求替代来源而面临高昂成本和电价上涨压力，现实的约束将决定日本在短期内难以彻底切断与俄罗斯的能源纽带。^②

作为 2014—2024 年“转向东方”的直接受益者，远东地区在过去十年间享受了宏观政策的红利，在多个宏观经济指标上超过俄罗斯整体增长水平。例如，从 2014 年到 2024 年，远东地区投资增长了 99%，是俄罗斯平均水平（38%）的 2.6 倍；工业生产增长了 30%，而全国平均水平为 29%；矿产开采增长了 32%，而全国平均水平为 10%。^③俄罗斯远东与北极发展部共

① “Japan to act in national interest on Russian energy, says industry minister”, *Reuters*, October 21, 2025,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japan-act-national-interest-russian-energy-says-industry-minister-2025-10-21>

② “Replacing LNG supplies from Russia's Sakhalin-2 would be costly, Japan says”, *Reuters*, October 23, 2025, <https://www.reuters.com/sustainability/boards-policy-regulation/replacing-lng-supplies-russias-sakhalin-2-would-be-costly-japan-says-2025-10-23>

③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развит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тоги,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9 июня 2025. <https://www.eastrussia.ru/news/desyatiletie-razvitiya-dalnego-vostoka-itogi-tendentsii-i-perspektivy>

推进 3779 个国家支持的投资项目，总规模 11.5 万亿卢布，其中已投入 5.5 万亿卢布，建成了 1157 家新企业，创造了 17.7 万个就业岗位。^①

尽管如此，俄罗斯学者也在反思过去十年“转向东方”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政策工具在实践中往往遭遇“雷声大、雨点小”的困境，不少区域沦为空有规划的“纸上蓝图”——既未能吸引到预期规模的实质性投资，也未能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几乎是所有学者的共识。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工业生产经济与组织研究所所长、院士瓦列里·克鲁科夫在其论文《向东的空间机动：事实、障碍、解决方案》中指出，远东西伯利亚的“优先地位”仅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先地位上，这是国家积极投入的结果。他认为，这些投入几乎未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影响，2022—2024 年远东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低于俄罗斯平均水平，而工业生产增长率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②并且，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极其不均衡。远东地区大多数联邦主体的发展速度仍较慢，只有少数资源丰富地区的经济指标呈现出较高的增长率（见表 2）。

瓦列里·克鲁科夫院士在总结过去十年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的实施效果时，指出了其面临的四个方面的系统性障碍。第一，国家发展政策存在根本性设计缺陷，未能回应空间结构优化的核心诉求。俄罗斯的宏观政策仍以扶持重点居民点为核心，固化了现有布局，而非缩小区域差距；财政资源的分配方式偏向政治游说，进一步加剧了地方间的社会极化；财政体系仍以跨地区转移支付为主，未能转向激励地方挖掘内生发展潜力；制度层面缺乏对空间维度的立法关注，跨区域协作缺乏法律保障；政策重点亦未聚焦于构建长产业链或跨区域互补型工业项目，导致东部仍被锁定为“物流走廊”，难以建立自主产业体系。

第二，区域空间发展的严重失衡与碎片化，从根本上破坏了东部地区的整体性，尤其表现为远东西伯利亚的南北割裂。南部地区集中了人口、多元

^①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развит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тоги,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9 июня 2025. <https://www.eastrussia.ru/news/desyatiletie-razvitiya-dalnego-vostoka-itogi-tendentsii-i-perspektivy>

^② Крюков В. А., Коломак Е. А.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ый манёвр на восток: факты, барьеры, решения// Научные труды Воль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России. 2025. №2. С.30-50.

化工业、农业及科教资源，而北部及北极地区尽管布局了大型资源项目，却因气候恶劣、人口稀少而缺乏生产与科研支撑，且南北之间为大面积的无人区所阻隔，导致南部无法为北部开发提供有效服务。并且，人口呈孤岛式的点状分布，居民点相距遥远，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内部的关联性断裂。

表 2 远东地区经济数据表（2014—2024 年）

地 区	2014 年地区 生产总值 (百万卢布)	2024 年地区 生产总值 (百万卢布)	名义增 长率 (%)	实际增 长率 (%)	2014 年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 (千卢布)	2024 年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 (千卢布)
滨海边疆区	620.50	1900.00	206.20	68.24	344.79	1073.45
哈巴罗夫斯克边 疆区	473.70	1347.00	184.36	56.24	353.53	1036.15
萨哈林州	762.60	1800.00	136.03	29.69	1394.93	3461.54
阿穆尔州	232.00	838.00	261.21	98.47	290.00	1112.88
萨哈共和国	747.60	2600.00	247.78	91.09	742.73	2600.00
堪察加边疆区	209.30	416.00	98.76	9.21	726.23	1540.74
马加丹州	98.10	517.60	427.62	189.90	670.33	3697.14
犹太自治州	55.30	117.10	111.75	16.35	324.15	731.88
楚科奇自治区	55.30	230.90	317.54	129.42	1005.45	4712.2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部网站整理自制。

第三，交通体系呈现碎片化特征，缺乏东西与南北方向的立体统筹，难以支撑区域内部的产业整合与资源流动。路网布局严重失衡，东西走向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与贝加尔-阿穆尔铁路构成了货运与客运主轴，而南北向支线极为薄弱，无法支撑南北方向的产业协作与资源开发。与此同时，基础设施

覆盖不足，西伯利亚南部部分联邦主体至今无铁路接入，公路运输则面临货运能力低、成本高等问题。内河航运虽具天然优势，但因航运季节性及港口设施长期失修而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第四，区域间的协作机制严重缺失，创新潜力与资源优势难以形成协同效应。远东西伯利亚的各联邦主体间的竞争动机远强于合作意愿，缺乏跨区域产业互补与资源共享的制度安排，使得区域的科技潜力无法与资源开发有效结合，创新成果难以转化为生产力，经济活动仍停留在初级资源开采层面，未能实现产业链延伸与结构升级。^①

过去十年俄罗斯“转向东方”在远东西伯利亚的实践，清晰地折射出国家战略雄心与区域发展现实之间的明显反差。克鲁科夫院士所揭示的四重障碍——政策设计的结构性缺陷、空间发展的极度失衡、交通体系的功能碎片化以及区域协作机制的实质性缺失——并非孤立的技术性问题，而是相互交织、互为因果的系统性困境。远东西伯利亚经济表现实际上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呈现出高度依赖少数资源富集区的畸形格局，便是这种悖论的最直观注脚。远东西伯利亚依旧深陷“资源诅咒”的困境，其作为“物流走廊”的功能被强化，在“转向东方”表现为俄罗斯与亚洲国家“双向奔赴”的花团锦簇下，远东西伯利亚获得的实际收益相对有限。

三、“西伯利亚化”——“转向东方 2.0”的逐步展开

考虑到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可能陷入长期的对抗状态，以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教授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对过去十年的“转向东方”战略进行了系统性的深入反思、理论重构与战略升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西伯利亚化”为核心标识的“转向东方 2.0”构想。“西伯利亚化”标志着俄罗斯“转向东方”思路有了显著调整，从被动地应对西方压力、寻求生存空间的权宜之计，转向主动谋划、塑造未来欧亚大陆秩序的长期战略。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马克

^① Крюков В. А. Коломак Евгения Анатольевна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ый манёвр на восток: факты, барьеры, решения// Научные труды Воль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России. 2025. №2. С.30-50.

西姆·奥列什金在“第二届托博尔斯克研讨会”上提到，“西伯利亚化”并非意识形态建构，而是客观因素所决定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必然选择，包括全球经济中心向亚洲转移、确保东部领土主权的需要，以及为国家整体寻求新的增长动力。^①

作为俄罗斯的战略学者、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资深教授和曾对俄罗斯外交政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智囊，卡拉加诺夫在 2022 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发表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文章，例如《从非西方到世界的大多数》《战争世纪？第二篇，应该做什么》^②。他在其中系统地提出了“俄罗斯堡垒”论，并迅速引发了俄罗斯学界、媒体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与激烈讨论。^③值得注意的是，卡拉加诺夫本人早期曾带有一定的亲西方色彩，他所领导的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系长期得到西方资助，其思想深刻转变的轨迹本身，就清晰地反映了过去十年间俄罗斯战略界整体的思想“转向东方”。“俄罗斯堡垒”论的核心论点在于强调，俄罗斯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时，必须同时兼顾两个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目标：一方面，需要空前地加强国家的独立性、主权完整以及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另一方面，必须坚定不移地保持对外开放的心态与姿态，绝不能走向封闭的孤立主义或自给自足的“堡垒”状态。卡拉加诺夫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如果把‘俄罗斯堡垒’简单地理解为自我孤立、自给自足，那将是完全错误和危险的。真正的‘堡垒’是指在西方极限制裁下，俄罗斯拥有维持国家运转与发展的自给自足的能力，同时保持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战略主动性。”^④“俄罗斯堡垒”论本质上是在探讨生存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平衡，主张俄罗斯一方面应最大限度地挖掘和激发自身在经济、技术、智力与精神文化领域的内部潜力；另一方面，则需更加积极主动地与世界上所有愿意合作

① Санников С. Сибирьзация России. 22 января 2026 г. <https://persona-strany.ru/sibirizacija-gossii/>

② Караганов С. А. От не-Запада к Мировому большинству//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2. Т.20. №5. С.6-18; Караганов С. А. Век войн? Статья вторая. Что делать//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4. Т.22. №2. С.37-52.

③ 李勇慧、吕贞蓉：“俄战略界抛出‘俄罗斯堡垒’论”，《世界知识》，2024 年第 10 期，第 57-59 页。

④ Караганов С. А. Век войн? Статья вторая. Что делать//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4. Т.22. №2. С.37-52.

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多元化的伙伴关系，避免俄罗斯被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边缘化，从而在新的全球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①

“俄罗斯堡垒”论包含四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具体战略主张。第一，文明独特性的重塑，即着力塑造并彰显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从根本上摆脱几个世纪以来对西方文明在精神与思想上的依赖。第二，国际秩序的重构愿景，认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体系正在日渐式微，西方发达国家集团正在不可逆转地失去其全球统治地位，而俄罗斯、中国、印度等新兴力量理应共同承担起新国际规则和新全球治理体系的奠基者责任。第三，外交优先方向的再定位，主张俄罗斯必须更加坚决、彻底地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同时在合作实践中确保合作伙伴的多元性，审慎管理与最大伙伴中国的关系，避免形成新的、单一性的过度依赖。第四，专注于内部发展的转向，特别是将国家发展的地理重心向广袤且尚未充分开发的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转移，将这些地区打造成俄罗斯未来真正的经济引擎、军事保障甚至精神复兴的中心。

在“俄罗斯堡垒”论的宏大框架下，“转向东方”的新版本——“西伯利亚化”^②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内涵与国家意义。“西伯利亚化”远不止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开发或资源开采，更是全面的国家发展战略重构、空间重组与身份再认同的愿景。卡拉加诺夫等学者所倡导的“西伯利亚化”概念，深刻植根于该地区的历史脉络与思想遗产。按照俄罗斯学者的描述，自哥萨克人开始拓殖以来，西伯利亚便遵循着一种以资源输出为导向的、独特的殖民模式——俄罗斯商人将西伯利亚的珍贵毛皮等物产输往中国以换取茶叶和丝绸，这些商品一部分被转运至西方，另一部分则进入俄罗斯腹地。卡拉加诺夫等人提出，俄罗斯的殖民模式与欧洲在美洲或非洲的殖民模式存在本质区别，俄罗斯移民与当地居民发生了相当程度的融合，历史上，西伯利亚地方主义和欧亚主义思想的兴起与传播，为当代的“西伯利亚化”构想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养料与历史合法性依据。西伯利亚在俄罗斯历史上具有不

① 李勇慧、吕贞蓉：“俄战略界抛出‘俄罗斯堡垒’论”，《世界知识》，2024 年第 10 期，第 57-59 页。

② Караганов С. А., Козылов И. С. Восточный поворот 2.0, или «Сибир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 //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5. Т.23. №1. С.221-229.

可替代的作用。五个世纪以来，这片广袤土地不仅是重要的地缘战略屏障，更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资源库，从早期的毛皮、贵金属到近现代的能源矿产，持续支撑着国家发展。苏联时期，西伯利亚的工业与资源成为国家的战略保障，在二战中为胜利作出了关键贡献。

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西伯利亚发展陷入停滞，人口流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与亚洲市场脱节等问题凸显。此前的“转向东方”战略，因缺乏全国性动员理念、忽视核心区域潜力等原因，未能达成预期目标。自苏联解体前夕至今，西伯利亚地区人口持续流失。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的统计，每年约有 30 万人流出西伯利亚。在过去三十年间，该地区人口减少了约 22%~23%。^①对西伯利亚而言，俄乌冲突并未成为人口涌入的驱动因素，反而加剧了现有的结构性问题。自 2022 年以来，俄罗斯联邦预算支出的很大一部分被分配给了国防和国内安全需求，有研究认为，两者占俄罗斯 GDP 的 10%。^②这意味着俄罗斯用于基础设施、交通、住房建设和社会服务的联邦资金减少，而这些领域恰恰会影响远东西伯利亚等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对移民的吸引力。

卡拉加诺夫等人提出，“西伯利亚化”不仅是经济地理的重构，更是文明认同的回归。西伯利亚的多民族文化遗产与历史积淀，有助于俄罗斯重拾欧亚大国的身份认同，融合拜占庭与蒙古帝国的文明传承，凝聚强大的政治意志与全民共识，打破官僚体系阻力，整合西伯利亚各区域的人力、科技与资源优势，摆脱对低效的西方市场的依赖，充分对接充满活力的亚洲经济圈。在全球格局重塑的关键时期，“西伯利亚化”为俄罗斯提供了一条立足自身历史根基、对接全球发展潮流的转型路径，其核心在于通过激活西伯利亚的巨大潜力，实现国家发展重心的历史性东移，使俄罗斯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在 2026 年俄乌冲突很可能迎来尾声的背景下，卡拉加诺夫提到，“俄罗斯不仅要打赢这场战争，还要结束长达一个半世纪、过于漫长的

^① «Территория сама по себе никому не нужна». Что не так с кремлевской идеей «сибиризации России»// Сибирь реалии. 22 января 2026 г. <https://www.sibreal.org/a/territoriya-sama-po-sebe-nikomu-ne-nuzhna-chno-ne-tak-s-kremlevskoy-ideey-sibirizatsii-rossii-/33649804.html>

^② Laura Solanka, “Rough times for the Russian economy”, January 22, 2026, <https://www.bofbulletin.fi/en/blogs/2026/rough-times-for-the-russian-economy>

欧洲之旅。欧亚大陆的西部没有未来”^①。

在未来三年，俄罗斯将推行名为“西伯利亚化”的“转向东方 2.0”计划。^②具体而言，该计划包含以下几个核心要素与实践方向：

第一，地理空间与功能的重构。西伯利亚将被重新定位为连接欧洲与亚洲贸易、能源与信息流的核心桥梁，其中北海航线（北方海路）的开发被提升到关乎国家命运的战略高度。同时，西伯利亚被视为新兴的“南北运输战略”的关键区域，历史上曾出现的阿拉斯加-楚科奇-中国铁路走廊构想被重新提及并加以研究。^③在西伯利亚建立“第三首都”的构想也再次被提起，其意图是使莫斯科继续作为传统的政治权力中心，“第三首都”则将承担起俄罗斯未来经济引擎、军事指挥中心乃至精神文化高地的功能。

第二，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西伯利亚必须彻底摆脱其作为单一资源产地和初级产品供应地的传统角色，转型为具备强大现代工业体系与高科技产业潜力的发达经济区域。西伯利亚独特而脆弱的自然条件，恰恰为生态型产业、绿色科技、可再生能源、大数据冷存储中心等新兴领域提供了天然的发展基础，并使其拥有全球竞争优势。西伯利亚南部地区正在形成的生态农业集群，其生产的有机农产品、野生药材及由此衍生的制药产品，在亚洲市场、欧亚经济联盟内部正日益受到青睐。

第三，社会生活与文化认同的重塑。西伯利亚地区的高校和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凭借其不断提升的科研实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留学生群体，正使该地区转变为欧亚大陆腹地新兴的教育与科研中心。俄罗斯甚至提出计划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叶尼塞斯克、伊尔库茨克-赤塔地区打造两大产学研综合体，旨在深化资源深加工与技术创新。^④

① Сибирские пути и дороги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7 января 2026 г. https://rg.ru/2026/01/27/reg-sibfo/sibirskie-puti-i-dorogi-rossii.html?utm_referrer=https%3A%2F%2Fjamestown.substack.com%2F

② Сибирские пути и дороги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7 января 2026 г. https://rg.ru/2026/01/27/reg-sibfo/sibirskie-puti-i-dorogi-rossii.html?utm_referrer=https%3A%2F%2Fjamestown.substack.com%2F

③ “俄罗斯-阿拉斯加隧道将为全球贸易开辟全新通道：如何实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5年10月18日，<https://sputniknews.cn/20251018/1067962534.html>

④ Караганов С. А., Козылов И. С. Восточный поворот 2.0, или «Сибир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5. Т.23. №1. С.221-229.

如果我们跳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从知识谱系来看，“转向东方 2.0”的理论体系深深地植根于并极大地发展了新欧亚主义的思想指引。2023 年俄罗斯正式出台的新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明确宣称，“俄罗斯是具有独特性的伟大文明”，并强调俄罗斯要向北方和南方、西方和东方全面开放，但主要指向东方和南方，显示出新欧亚主义对俄罗斯外交政策战略思想的影响。^①新欧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强国理念与文明自信的体现，是在为俄罗斯的国家发展探索自己的道路。在俄罗斯思想史上，常用“堡垒”和“桥梁”这两个看似对立的意象来隐喻俄罗斯文明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堡垒”象征保护自身精神文化根源、防御西方文明扩张和入侵的坚定意志；“桥梁”则代表搭建本民族与广阔外部世界联系、吸收养分并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开放姿态。这两个概念共同构成了俄罗斯战略思维中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并在卡拉加诺夫等人的“转向东方 2.0”的理论中得到了新的统一与阐释。

在“转向东方 2.0”框架下，俄罗斯学者提出了一些天马行空的项目，例如，建设一个横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伊尔库茨克州以及哈卡斯共和国和图瓦共和国的“安加拉-叶尼塞集群”科技中心，将西伯利亚的资源潜力转化为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动力。该项目计划整合稀土金属的开采和加工、先进材料、微电子、能源解决方案以及人工智能系统的研发。普京亲自支持该项目，并已邀请投资者入驻安加拉-叶尼塞集群。^②然而，自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经济日益军事化，限制了其他领域的资金投入，如此规模的项目需要超过 7000 亿卢布的支出，这是俄罗斯政府短期内无法承担的。^③

“西伯利亚化”作为“转向东方 2.0”的核心纲领，其真正的战略价值

①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В. Путиным 31 марта 2023 г. МИД РФ. <https://www.mid.ru/ru/detail-material-page/1860586>

②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2025 年 12 月 19 日的年度记者会上表示，建立安加拉-叶尼塞集群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并强调需要吸引私人投资者入驻。See “Putin called the creation of the Angara-Yenisei cluster an interesting project”, December 19, 2025, https://en.iz.ru/en/2011756/2025-12-19/putin-called-creation-angara-yenisei-cluster-interesting-project?main_click

③ Vadim Shtepa, “Plans for the “Siberianization” of Russia Remain Unrealized”, February 2, 2026. https://jamestown.substack.com/p/plans-for-the-siberianization-of?utm_campaign=email-1-half-post&r=1epvcn&utm_source=substack&utm_medium=email

在于为俄罗斯的东转进程注入了久违的思想深度。回顾过去十年的俄罗斯“转向东方”，其动因更多源于地缘政治需求的危机应对，虽在经贸合作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却因缺乏内生性的文明叙事与理论根基，难以凝聚全国性的共识与动员力，呈现出浮于表面的状态。而“西伯利亚化”的提出，恰恰通过回溯西伯利亚五百年来的殖民史、地方自治传统以及欧亚主义的思想遗产，将资源开发、空间重构与文明认同熔于一炉，不仅将西伯利亚从边界的“资源仓库”重塑为国家的“文明心脏”，更使“转向东方”摆脱了单纯外交方针的工具属性，升华为关乎俄罗斯文明存续的道路选择。“堡垒”与“桥梁”并非对立，而是俄罗斯在东方寻找自我的辩证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西伯利亚化”弥补了此前战略在思想史上的短板，为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重新扎根提供了可依凭的精神土壤与历史纵深。

四、“转向东方 2.0”对接“一带一路”互动合作的方向

在“转向东方 2.0”这一更具主动性、系统性和雄心的战略框架下，俄罗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之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更为广泛、深入且充满潜力的合作空间。卡拉加诺夫等学者所阐发的“大欧亚”构想正在被努力推动变为现实——该构想旨在推动从东亚到欧洲整个欧亚空间内，实现政治协调、经济融合、文化信息交流及人文往来领域的全面整合。俄罗斯极其广袤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被重新定位和寄予厚望，将成为连接中国与欧洲贸易通道的天然陆桥，对于强化整个欧亚大陆的跨国经贸往来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中俄在理念层面的战略契合，使得俄罗斯不再仅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被动参与者或旁观者，而转变为积极的共建方与利益攸关者，这极大地提升了双方合作的政治意愿、政策协调性与项目执行力。“转向东方 2.0”与“一带一路”的互动合作超越了能源贸易互补和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地方合作层面，成为共同塑造未来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经济新格局的深度战略协作。互动合作将在以下几个主要方向全面展开。

第一，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成为俄罗斯“转向东方 2.0”背景下“一带一路”合作最为迫切的环节。“北方航道”的开发是俄罗斯“转向东方 2.0”

战略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支柱项目，与“冰上丝绸之路”构想高度契合。北极运输走廊被视为“冰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2024 年该通道货运量达 3790 万吨，为“一带一路”与东北振兴战略拓展了新的空间。特别是在近年来红海航线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安全不稳定因素增加的背景下，穿越北极的航线在一年中相当长的时间内提供了一种“既安全又经济”的替代性选择，其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中国的相关企业对参与北海航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港口现代化、破冰船队建设、导航服务等，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参与意愿，认为这为中国具有优势的工程装备、建筑材料和相关产品出口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除“冰上丝绸之路”外，中俄在“转向东方 2.0”框架下的基础设施合作还呈现出多点开花的态势。备受关注的“中蒙俄经济走廊”中线铁路升级改造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①既有铁路的现代化改造将极大提升三国间的过货效率，为构建欧亚大陆新的交通大动脉注入强劲动力。通过打通关键节点，中蒙俄经济走廊有望成为连接亚欧大陆最便捷、最稳定的陆路通道之一，为深化三国经贸往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第二，能源合作始终是“转向东方 2.0”与“一带一路”对接中最具实质内容、最有确定性前景的领域。与 2014—2024 年“转向东方”相比，当前的中俄能源合作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一是从单纯的资源贸易向全产业链合作进行根本性转变。中国企业将更深入地参与俄罗斯上游的能源勘探与开发、中游的管道与液化设施建设，以及下游的加工炼制与销售服务，形成深度利益捆绑格局。俄罗斯在北极的液化天然气项目、东西伯利亚未开发油气田的巨大潜力，都需要中国企业的资本投入、技术支持，特别是稳定的市场消纳作为保障。二是能源基础设施合作迈向新的、更复杂的水平。中国拥有世界领先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与经验，能够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油气田开发、区域性电力供应保障、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从规划设计到建设运营的全面支持。尤其是在俄罗斯规划的远东巨型工业项目和产业集群领域，中俄双方的互补性与合作潜力巨大。

^① 《中俄总理第三十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5 年 11 月 4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11/content_7047103.htm

第三，“转向东方”战略为中俄海洋合作开辟了经济与安全协同推进的新空间。在经济层面，俄罗斯远东的海洋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与中国的技术资金优势形成互补。俄罗斯远东海运集团计划将符拉迪沃斯托克港集装箱场站扩大 20%，中国青岛、连云港、宁波至该港进而转运至俄罗斯内陆的海铁联运方案日益增多，中国企业正积极投身远东港口的现代化进程，这将有效地提升中俄海运效率与供应链韧性。^①在能源领域，全球变暖使北极航道通航期延长，俄罗斯加快北极开发，中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和北极液化天然气 2 号项目稳步推进，不仅深化了能源合作，更在物流运输领域开辟了经白令海峡的北极新航道。“转向东方”战略使俄罗斯更加重视远东与亚太。中俄东北-远东地区经济合作蓬勃发展，两国在海洋安全与海洋经济领域的共同利益持续拓宽，战略契合点显著增加，推动中俄海洋合作迈入了协同发展的新阶段。

五、结 论

俄罗斯的“转向东方”战略历经超过十年的演进与深化，已经从最初的理念构想、被动应对外部策略，发展为今天系统全面、主动谋划的国家级长期战略。特别是进入以“西伯利亚化”和“大欧亚”构想为标志的“转向东方 2.0”阶段后，其战略内涵、理论支撑、实施路径与合作模式均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化。

第一，俄罗斯的“转向东方”战略已经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外部压力到主动谋划国家未来的根本性转变。早期的“转向东方”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俄罗斯在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后遭受西方制裁挤压的被动反应和危机管理，它的战略内涵相对单一，实施过程也常显摇摆。而“转向东方 2.0”则体现了俄罗斯基于对国际格局“东升西降”大趋势的深刻洞察，以及对自身文明特性和发展道路的重新定位，而作出的主动的、长期的战略选择。卡拉加诺夫等顶尖战略学者提出的“俄罗斯堡垒”论和“西伯利亚化”构想，标志着俄

^① 张建：“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背景下的中俄海洋合作”，《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5 年第 2 期，第 79-80 页。

罗斯战略界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系统、完整且具有内在逻辑自洽性的东方战略理论体系，这为未来数十年持续不懈地实施这一战略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理论支撑和意识形态合法性。俄罗斯不再仅仅将自己定位为在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或“中介”，而是越来越清晰地追求作为一个独立的欧亚文明主体。

第二，西伯利亚以及远东地区在俄罗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定位，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从过去的边缘地带、原料附庸和战略后方，跃升为关乎国运的核心战略区域与国家未来的希望所在。“西伯利亚化”这一概念的提出与推广，不仅意味着对这片广袤土地经济价值和地缘价值的重新评估，更意味着对其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建构方式、人口分布格局乃至文明认同的重塑。西伯利亚被视为俄罗斯未来真正的经济引擎、军事安全保障和精神文明复兴的中心，其开发模式被要求从传统的资源掠夺型、殖民式开发，向可持续发展的、创新驱动的、以人为本的综合枢纽型发展模式转型。这一根本性的定位转变，为中俄两国在俄罗斯东部的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空间、新场景与新动能，特别是在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全产业链合作、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有望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形成深度交融的利益共同体。

第三，俄罗斯“转向东方 2.0”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互动合作，其战略意义已超越简单的项目合作与经贸互补层面，正在升华为共同重塑欧亚大陆未来政治经济秩序的战略协作。两者的对接与融合，不仅仅是具体公路、铁路、管道等硬件设施的连接，更是发展理念、制度规则、技术标准和治理模式的深度磨合与创新。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机制化对接，“大欧亚伙伴关系”构想的持续推进，以及北海航线开发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协同，都在为欧亚大陆探索一条不同于欧美中心主义传统模式的、更加平等、包容、开放、基于合作共赢的区域一体化新路径、新模式。中俄深度的战略协作，不仅有助于对冲单边主义和霸权政治的风险，也对二战以来欧美主导的传统全球化模式形成了有益补充和建设性替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区域实践。

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俄罗斯“转向东方 2.0”与“一带一路”的

深化互动合作依然面临诸多严峻的、深层次的挑战。一是俄罗斯经济结构单一性、能源依赖性的“资源诅咒”问题在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其与中国的贸易失衡状况可能会持续存在，这制约了合作的可持续性与平衡性。二是俄罗斯部分精英阶层和知识界人士思想上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情结”依然存在，在心理上和认知上仍对国家全面转向东方存有疑虑和阻力，这可能在政策执行层面产生内部摩擦。三是亚太地区本身地缘政治结构复杂，大国博弈激烈，俄罗斯在深化对华合作的同时，也需要协调与地区内其他重要力量如印度、日本、东盟等的关系，其平衡外交面临考验。四是西方集团很可能持续向中国施加强大的政治和外交压力，企图离间中俄关系，迫使中国在维持对俄合作与维系对西方关系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这为合作增添了复杂的外部变数。这些问题都需要中俄双方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通过创新合作模式、拓展合作领域、完善机制建设、深化人文交流来共同应对与化解。

展望未来，俄罗斯“转向东方 2.0”与“一带一路”的互动合作，必将在合作的广度、深度与高度上不断拓展与提升。这种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战略合作，不仅将极大地惠及中俄两国人民，为两国的发展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也将为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贡献不可或缺的积极力量，开启一个合作共赢的欧亚新时代。

（责任编辑 宋羽竹）

大国地缘博弈下南高加索三国的战略调适： 供给赤字与秩序重组*

张家郡 毕洪业**

【内容提要】自2020年以来，南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经历深刻变迁。面对俄罗斯与欧盟两大传统主导力量的影响力同步退却，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三个南高加索国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战略调适路径。基于“大国供给赤字-地区秩序重组-小国战略调适”这一分析框架，俄罗斯的供给退却可以界定为俄乌冲突消耗下能力赤字导致的被动收缩，欧盟的供给退却可界定为能源利益优先下意愿赤字引发的主动压缩。在此基础上观察发现，在供给赤字扩大的背景下，第三方力量通过体系渗透、存在维持、经济合作等方式进行功能性分层的结构性介入。这种介入与小国自身的资源禀赋深度互动，共同重塑了地区秩序，且早于俄乌冲突。通过将小国资源禀赋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可以发现三种差异化调适路径：阿塞拜疆凭借能源与通道双重禀赋实现主动调适，调适成效显著；亚美尼亚因缺乏关键资源禀赋被迫多向扩散，调适成效有限；格鲁吉亚虽具备通道禀赋，却因强烈的制度身份偏好陷入困境调适，调适成效最低。这三种调适路径共同揭示了供给赤字背景下，资源禀赋与制度身份偏好对小国战略调适路径及其成效的系统性影响。

【关键词】供给赤字 小国战略调适 资源禀赋 南高加索 秩序重组

【中图分类号】D736**【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2-0091(30)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俄乌冲突僵局下中美俄三方博弈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24BGJ016）、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项目“俄罗斯的对外援助路径研究——以中东欧、非洲与中亚为例”（项目编号：2025KFKT00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张家郡，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毕洪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双聘研究员。

一、问题的提出

2020 年至今，南高加索地区经历了深刻的地缘变局。2020 年下半年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以下简称“纳卡地区”）的冲突打破了多年以来的地区现状，俄罗斯虽以调停者的身份向纳卡地区派驻维和部队，但亚美尼亚已经基本失去了对该地区的控制。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俄罗斯对南高加索的战略与资源优先级逐渐下降。2023 年，阿塞拜疆完成了对纳卡地区的实际军事控制；随着维和部队的撤出，俄罗斯作为该地区主要安全仲裁者的角色受到根本性冲击。2024 年，作为俄罗斯地区盟友的亚美尼亚宣布冻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国身份。与此同时，深度嵌入欧盟制度的格鲁吉亚也于 2024 年通过《外国影响透明度法案》，导致格鲁吉亚入盟进程被冻结。2025 年 8 月，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美国的斡旋下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标志着美国开始参与南高加索地区秩序构建的议程。^①随着中亚南高加索通道功能日益凸显，土耳其、以色列、法国、印度、伊朗等国也在不同领域加深了对南高加索的主动介入。南高加索的地区秩序正经历深刻转型：俄罗斯长期主导的地缘政治格局面临侵蚀，多方行为体的介入使地区博弈趋于多元化，但新的稳定秩序尚未成型。

面对地缘变局的挑战，南高加索三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调适。阿塞拜疆利用俄欧在南高加索地区影响力下降带来的地区失序，主动参与地区议程设置，在解决纳卡问题的同时成为地区秩序的重要参与者。亚美尼亚在俄罗斯的安全承诺失效后，被迫向多个供给方同时扩展，通过多向外交的方式对冲单一依附失效后的风险，但并未形成对新供给方的深度嵌入。格鲁吉亚长期坚持向欧盟对齐，但入盟依然遥遥无期；俄罗斯的安全威慑使其陷入两难，战略稳定性持续受损。地区变局之下，三国为何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径？探究其背后的分化逻辑，不仅有助于厘清南高加索地区秩序的转型机理，更

^① “Joint Declaration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 the Outcomes of Their Meeting in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8, 2025,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5/08/2025JointDeclaration.AzerbaijanArmenia.pdf>.

能为观察大国供给赤字下小国的战略行为提供系统性的解释视角。

现有文献对小国的战略行为、大国的影响力退却以及南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政治研究已有一定积累，但尚未有就供给赤字下小国差异化的调适路径进行系统性分析。在小国战略行为的理论研究层面，学界关于“小国”的定义和范围已经明确，一般从客观实力（人口、经济体量、军事能力）、主观认知（自我定位与威胁感知）和体系特征（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三个维度进行界定，^①将综合国力有限、在国际体系内缺乏独立影响力且安全与经济高度依赖外部环境的国家界定为小国，并就小国的脆弱性和依附性达成了基本共识。韦民指出小国对外部大国的经济依附和安全的脆弱性构成了小国战略行为的双重结构约束。^②在小国行为逻辑层面，华尔兹（K. Waltz）和沃尔特（S. Walt）分别从权力分布与威胁感知维度揭示了小国追随与制衡行为的结构根源。^③乔恰里（J. Ciorciari）和郭清水（C. Kuik）研究了小国的对冲策略，指出灵活、不对齐是小国分散风险、最大化选择空间的核心机制。^④因此学界将小国回应策略归纳为追随、平衡、对冲等基本类型。^⑤关于小国回应策略的进一步分析，现有研究认为小国在面临多个大国压力时面临双重威胁，大国竞争的性质与强度深刻影响着小国的回应策略；而大国与小国的邻近性放大了小国的地缘价值，进而影响小国回应策略的空间边界。^⑥陈

① 孙西辉、金灿荣：“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马来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当代亚太》，2017年第2期，第12-17页。

② 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8-280页。

③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5-171页；[美]斯蒂芬·沃尔特著：《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50页。

④ J. D. Ciorciari, *The Limits of Alignment: Southeast Asia and the Great Powers since 1975*,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0; C. Kuik,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008, Vol.30, No.2, pp.159-185.

⑤ 王传剑、张松：“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形成条件与实施效度研究——以菲律宾的对华对美关系实践为例”，《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5期，第29页。

⑥ 魏冰：“双重威胁与小国的联盟选择”，《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3期，第150页；顾炜：“地区战略与大国崛起时对周边小国的争夺：俄罗斯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迪”，《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第43-44页；冯立冰、连昌惠：“南亚小国的战略对冲与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选择”，《外交评论》，2022年第4期，第87-109页。

旭将小国的权力细化为自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行为权力四个维度，解释了小国如何将资源禀赋转化为战略机制。^①此外，根据刘若楠的研究，处于地理要冲或掌握重要资源的小国，在安全问题上面临更为复杂的情况。^②上述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即均假设大国的供给相对稳定，对大国供给能力同步退却下小国战略路径分化的系统解释存在一定不足。

在大国影响力的退却与地区秩序重组层面，吉尔平（R. Gilpin）的权力转移理论和基欧汉（R. Keohane）的霸权后合作理论均指出，大国影响力的退却是国际体系周期性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③在南高加索的语境下，迈斯特（S. Meister）指出，俄乌冲突加速了俄罗斯对南高加索地区控制的终结并进入了一种“交易型”秩序。^④在欧盟战略层面，德尔库尔（L. Delcour）与沃尔丘克（K. Wolczuk）指出，欧盟在南高加索的角色期待与其实际绩效存在落差，其影响力受制于欧盟内部的政策矛盾。^⑤曾向红和宋黎磊分别从规范扩散困境和欧盟东部伙伴计划分析了欧盟能力和意愿的双重制约。^⑥在俄罗斯战略层面，艾莉森（R. Allison）系统考察了俄罗斯通过军事存在和制度框架维持地区影响力的内在逻辑。^⑦萨克瓦（R. Sakwa）分析了俄罗斯安全

① 陈旭：“国际关系中的小国权力论析”，《太平洋学报》，2014 年第 10 期，第 42 页。

② 如果小国恰好处在地理要冲或者拥有重要的战略资源，中等国家或大国的战略关注将会进一步增加小国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参见刘若楠：“次地区安全秩序与小国的追随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11 期，第 73 页。

③ 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44-162 页；[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20-257 页。

④ S. Meister, “The End of Russian Hegemony: A New Transactional Order Arises in the South Caucasus” in Forschungsinstitut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Auswärtige Politik, *DGAP Analysis*, 10, Berlin, 2024, pp.1-16.

⑤ Laure Delcour, Kataryna Wolczuk, “Mind the Gap: Role Expectations and Perceived Performance of the EU in the South Caucasus”,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21, Vol.62, No.2, pp.156-177.

⑥ 曾向红：“‘规范性力量’遭遇‘新大博弈’：在中亚推进民主的三重困境”，《欧洲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34-60 页；宋黎磊：“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意图、推进与问题”，《国际问题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85-102 页。

⑦ Roy Allison, “Virtual Regionalism, Regional Structures and Regime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8, Vol.27, No.2, pp.185-202.

战略的结构性脆弱。^①上述研究对大国能力退却的原因和过程作了较为充分的分析，但对大国退却后地区秩序如何重组、小国如何进行差异化应对的分析较为薄弱。

在南高加索三国的战略演进层面，现有研究以个案描述和双边关系分析为主，缺乏更系统的解释框架。托马斯·德·瓦尔（Thomas de Waal）和查尔斯·金（C. King）的长期研究揭示了南高加索地区安全秩序的脆弱性源于长期的领土争端和大国博弈的共同作用。^②孙超的研究指出南高加索三国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安全复合体。^③在国别研究层面，卡卡奇亚等（K. Kakachia）区分了格鲁吉亚交易型对冲和价值型对冲两种模式，揭示了格鲁吉亚正在面对俄欧之间的深层张力。^④现有研究指出，亚美尼亚采取有限对冲策略的原因，是资源禀赋的局限；^⑤根据布鲁尔斯（L. Broers）的研究，长期依附性的安全结构加剧了亚美尼亚的战略困境。^⑥康奈尔（S. E. Cornell）指出，阿塞拜疆在外交政策上多向平衡的传统在苏联解体后就已产生，在大国供给能力同步退却的情况下主动转化为塑造地区秩序的战略资本。^⑦李静雅、曾向红等分析并揭示了土耳其的介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南高加索的力量对比。^⑧此

① R. Sakwa, *Frontline Ukraine: Crisis in the Borderlands*, London: I. B. Tauris, 2015, pp.1-10.

② T. de Waal, *Black Gard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through Peace and Wa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3; C. King, *The Ghost of Freedom: A History of the Caucas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 孙超：“南高加索安全复合体的生成困境探析”，《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2期，第128页。

④ K. Kakachia, B. Lebanidze, S. Kakabadze, “Transactional Hedging versus Value-Based Hedging: How Small Frontline States Balance between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Russian Influence”, *European Security*, 2024, Vol.33, No.4, pp.594-614; G. Gvalia, D. Siroky, B. Lebanidze, Z. Iashvili, “Thinking Outside the Bloc: Explaining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Small States”, *Security Studies*, 2013, Vol.22, pp.98-131.

⑤ T. Pipoyan, G. Meibauer, “Handling the Hegemon: Permissiveness, Ideas, and Armenia’s Limited Hedging in the Face of Russian Assertivenes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025, Vol.21, No.4, <https://doi.org/10.1093/fpa/oraf028>

⑥ L. Broers, *Armenia and Azerbaijan: Anatomy of a Rival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⑦ S. E. Cornell, *Azerbaijan Since Independence*, New York: M. E. Sharpe, 2011.

⑧ 李静雅：“第二次纳卡战争背后的各方战略博弈”，《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期，第29-37页；曾向红、王昊语：“伺‘机’而动：机会窗口视角下土耳其对第二次纳卡冲突的介入”，《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2期，第49-80页。

外，亦有研究从通道竞争视角分析南高加索地区秩序的重塑。^①上述研究从地区格局、安全复合体以及国别策略等多个维度，为理解南高加索地缘动态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支撑，但仍缺乏系统性的比较视角，特别是资源禀赋如何作为关键变量驱动战略路径的分化，仍是一个亟待填充的理论空间。

综合上述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研究对大国能力退却的类型缺乏区分，能力赤字和意愿赤字的生成根源不同，对小国的战略调适路径的影响亦有本质的差异；第二，现有研究未能对小国的资源禀赋给予重视，导致难以对三国面临相同压力时的路径分化进行解释；第三，现有研究对第三方力量的分析仅停留在动机和行动层面，忽视了其选择与小国资源禀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此，小国进行战略调适的理论基础在于“结构约束-资源禀赋-路径选择”的逻辑，而现有研究缺乏对小国的资源禀赋在供给赤字条件下的作用分析，正是这一缺口构成了本文的核心切入点。

二、分析框架：大国供给赤字、地区秩序重组与小国的战略调适

小国的战略调适往往受到大国博弈下的结构性约束。规模和资源上处于劣势的小国更依赖权力分布下的生存空间。因此，小国的战略行为被限定在追随和制衡两种状态。然而，当掌控权力分布的大国陷入能力危机时，小国的战略行为该如何变化？这也是大国供给能力出现同步退却时小国面临的现实困境。在现实主义关于权力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尝试构建“大国供给赤字-地区秩序重组-小国战略调适”的分析框架，系统分析大国能力退却背景下小国战略调适多样化的生成机制。

（一）供给赤字：概念界定与类型划分

在现实主义视角下，大国对周边小国的影响力本质上是以大国自身能力为基础的“庇护-依赖”关系。大国通过提供安全保障、经济支持和制度框架换取小国战略上的顺从和依附。然而，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并非一成不变，

① 樊凡、吴冰冰：“南高加索地区秩序的重塑与关键通道的争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5年第5期，第47-73页。

当大国无法履行上述供给时，便出现了供给赤字。供给赤字的本质是大国与小国非对称关系的结构性失衡。大国对小国的影响力并非单纯的双边供给关系，也涉及地区层面的秩序塑造。大国因地理上的邻近对周边小国的影响，不仅体现为公共产品供给，也体现为非对称权力结构下小国的依附性生存逻辑。^①大国作为公共产品供给方掌握主动，小国作为需求方处于依附地位；而一旦供给方的实际履约能力或意愿低于需求方的合理预期，这种不对称关系便会出现失衡，供给赤字由此形成。^②

供给赤字并非指大国资源的客观下降，而是大国实际的供给能力与小国不断升高的安全与发展需求之间的落差。一旦前者的供给无法覆盖后者的需求，这一赤字将持续扩大。为区分供给赤字的生成机制，本文将供给赤字分为两种类型，用于解释大国供给能力退却的不同生成逻辑。能力赤字指大国因战略资源过度消耗，导致维持既有公共产品供给的客观能力下降。意愿赤字指大国尽管具备客观的供给能力，但基于战略优先级或战略收益，选择性压缩供给意愿，并通过抬高制度门槛掩盖其供给的收缩。两种赤字在现实中常常并存，但生成逻辑有本质差异。需要强调的是，能力赤字与意愿赤字的区分并非对大国供给能力退却的二元定性，而是理解不同大国赤字生成的不同逻辑，以及小国差异化战略调适的起点。在实践层面，能力赤字和意愿赤字常常相互建构。战略意愿的持续收缩终将导致嵌入能力的退却，而客观能力的下滑亦会重塑主观的收益预期。供给赤字揭示了大国供给逻辑的复杂

① [美]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非对称与国际关系》，李晓燕、薛晓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31-152页。

② 本文界定的“供给赤字”，承接了霸权稳定论的核心命题，综合了金德尔伯格关于大国公共产品供给角色、吉尔平关于供给能力内生于相对国力、基欧汉关于供给意愿制约合作延续的三重判断。能力赤字对应肯尼迪帝国过度延伸的逻辑，意愿赤字对应施韦勒的欠平衡与米尔斯海默的离岸制衡的分析框架。参见[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著：《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美]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美]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王保存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美]兰德尔·施韦勒著：《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刘丰、陈永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性，并为分析小国的战略调适提供了理论起点。

（二）地区秩序失序下第三方的结构性介入

当大国出现供给赤字时，其与小国长期构建的供给关系出现松动，并在安全、经济领域引发地区秩序失序。这种供给关系有别于国际关系研究中常见的“庇护-代理”关系：前者以公共产品供给为核心纽带，大国作为供给方，小国作为需求方；后者以政治代理为本质特征，庇护方提供资源，换取代理方替代其参与直接的安全行动。^①本文分析的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侧重供给逻辑而非政治代理逻辑。因此，当这一关系出现变动时，其他具备能力和动机的行为体便会主动介入，填补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口。第三方力量介入的内生动力，正是大国供给赤字下形成的地区秩序失序。然而，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并非同质化，可以根据他们能够提供的替代公共产品的功能加以分类。第一类是以体系渗透为目标的行为体，这类行为体试图将自身议程嵌入地区秩序的重构过程。第二类是以存在维持为目标的行为体，这类行为体会通过选择性嵌入防止在地区秩序重组中被边缘化。第三类是以经济合作为目标的行为体，这类行为体会通过通道联通和基础设施投资参与地区秩序的重组，不谋求对安全议程的介入。

上述三类第三方力量的介入，本文称之为“结构性介入”，第三方力量以功能性分层介入的方式，在安全、规范、经济三个维度上分别承接原有大国的部分供给角色，形成多方并存、功能交叉的新格局。结构性介入的本质是供给结构的重新分配，而非简单的权力替代，体现了这一过程中的渐进性与多元性。第三方力量结构性介入的实际效果已经深刻改变了既有地区秩序格局，并为小国的战略调适提供了差异化的外部条件。

（三）小国战略调适的类型

面对多重的外部结构压力，小国的回应往往也可以被视为持续校准的战略调适过程。小国战略调适路径由三个关键维度共同决定：一是大国主导的供给赤字；二是第三方力量结构性介入的类型；三是小国自身的资源禀赋。本文所指的资源禀赋，特指小国所掌握的、对大国需求具有刚性吸引力的战

① 关于“庇护-代理关系”的界定可参考陈翔：“理解国际冲突中的庇护——代理关系”，《国际政治科学》，2020 年第 3 期，第 47-77 页；Andrew Mumford, *Proxy Warfa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p.11-29.

略性资产，主要包括能源出口能力、关键地理通道控制权及可转化为议价筹码的稀缺战略资产。决定资源禀赋充裕或匮乏的关键在于小国掌握的资源是否满足大国的刚性需求，且难以被替代，而非资源的绝对体量。小国拥有资源禀赋并非调适成功的充分条件。大国博弈下的地区形势与小国的威胁感知，同样构成调适的边界条件；当小国的制度和身份偏好与资源杠杆方向相冲突时，前者作为刚性约束将封堵资源优势的兑现，使资源禀赋无法转化为实际的战略自主空间。由此，小国的战略调适分为三种类型。

1. 主动调适。当小国具备关键资源禀赋时，大国的供给赤字不仅不会造成小国的生存危机，反而在小国所掌握的关键领域暴露其需求刚性。小国在此条件下得以从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协商者，通过议题分离和资源杠杆，主动引入第三方力量并明确划分合作领域，甚至反向作用于大国，使其修正供给模式。小国不再谋求任意大国的系统性保护，而是以功能性嵌入的方式从多方获取利益。这一类型的前提是，小国不存在对特定大国供给模式强烈的制度身份偏好，即便存在偏好，该偏好也与资源杠杆方向相一致而非冲突，因此不对议题切割构成刚性约束。

2. 被动调适。当小国不具备关键资源禀赋时，原有的大国供给出现严重赤字，无法为小国提供安全和经济领域的结构性支持。小国此时的战略调适并非主动，而是基于多个第三方力量结构性介入下的多向选择，本质上是分散当前小国面临的风险。但由于缺乏关键性筹码，小国往往难以摆脱对大国的结构性依赖，亦无法与多个第三方力量进行深度联结，始终处于多种不完整供给下的结构性困境。此时小国对制度的偏好并非主要因素，决定调适的因素依旧来自小国自身的资源禀赋。

3. 困境调适。当小国具备一定的资源禀赋时，却因为强烈的制度身份偏好而无法运用其资源优势的杠杆，由此便陷入了困境调适。小国陷入了以高成本向大国模式对齐和第三方力量无法满足自身需求的两难困境。小国的制度身份偏好使自己无法有效运用多元的外部供给，所以，第三方力量虽已介入，却难以转化为可用的战略资源，导致小国的战略调适缓慢甚至出现停滞，并在国内政治层面形成围绕外交路线的结构性分裂。此时小国的制度身份偏好决定了其资源禀赋的可用边界。

为进一步厘清三种调适类型的差异，主要从资源禀赋、制度身份偏好、调适方向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比较（见表 1）。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种调适类型存在一定的边界条件，即以大国安全供给能力同步退却为适用前提。

表 1 小国的战略调适路径的类型比较

调适类型	资源禀赋	制度身份偏好	调适方向	调适成效
主动调适	充裕	不构成刚性约束	议价主导，主动重塑供给结构	高
被动调适	匮乏	尚未固化	多向扩散，以广度代替深度	中
困境调适	一定禀赋	强烈且刚性，封堵资源优势兑现	受身份制度偏好约束，杠杆无法发挥	低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综上所述，小国的战略调适并非单纯的意志选择，而是由外部的供给赤字、第三方力量的结构性介入类型与内部的资源禀赋共同决定：具备关键资源的小国能借助供给赤字开启的战略窗口实现主动调适；资源匮乏的小国则在多方浅层供给中被迫周旋；而当小国具备一定的资源禀赋却深陷制度身份偏好时，后者作为边界条件封堵了小国资源优势向战略自主的转化，这正是困境调适与主动调适走出截然不同路径的根本原因。

南高加索地区为检验上述解释框架提供了案例。俄罗斯与欧盟作为该地区长期的两大主导力量，其供给能力与意愿的同步退却构成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这三个国家战略分化的共同外部背景。它们同属典型小国，却在资源禀赋与制度身份偏好上存在显著差异，恰好对应三种调适类型的核心特征。以下首先考察俄欧供给赤字的具体表现及第三方力量的结构性介入格局，继而系统分析上述三国的差异化调适实践。

三、俄欧传统影响力的下降与第三方力量的介入

俄罗斯与欧盟的供给赤字生成路径不同。俄罗斯的能力赤字集中体现在军事存在的阶段性收缩与经济角色的被动转化。欧盟的意愿赤字则源于能源利益考量下规范供给的主动压缩。两种赤字叠加，共同造成了南高加索地区的秩序失序，进而引发了第三方力量的结构性介入。由此，南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格局由俄罗斯的长期主导转向多极分散的新形态。

（一）俄罗斯的战略调整：从主导角色到功能性利益攸关者

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战略退却是供给赤字中能力赤字的典型体现。由于俄罗斯安全承诺的兑现能力出现明显下降，南高加索三国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出现了信任危机。俄乌冲突的持续，加速了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长期主导地位的收缩。从2005年与格鲁吉亚达成撤军协议，到2020年在纳卡地区冲突中保持中立态度，俄罗斯在该地区的角色出现了明显调整，主导秩序的能力受到阶段性约束，对该地区通道利益的依赖程度有所上升。面对俄乌冲突带来的国力消耗，以及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西向战略的牵制，这一制约在军事上表现为部分军事力量的撤出，在经济上表现为对南高加索国家的功能性依赖。

1. 军事力量的阶段性收缩与威慑力的相对稀释。长期以来，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保持着三方面的军事威慑：在争议地区维持前线驻军，在关键节点保留实际控制，以及维护作为地区安全保障者的威慑信誉。然而，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因战略资源大量消耗于乌克兰战场，无暇充分顾及南高加索，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出现阶段性收缩，但这一收缩系战略优先级的重新排列，而非能力的永久丧失。就仲裁者角色而言，俄罗斯充当阿亚冲突唯一调停者的能力明显受限。2024年，俄罗斯军队全面撤出纳卡地区，^①也未在阿塞拜疆境内保留任何哨所和军事基地。这一撤军表明俄罗斯阶段性地收缩了其在阿亚两国之间的调停角色，但俄罗斯在亚美尼亚的军事基地依然存续，在南北走廊的经济利益持续存在，其南高加索的

^① “Information of Azerbaijan Defense Ministry”, *Ministry of Defense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June 12, 2024, <https://mod.gov.az/en/news/information-of-azerbaijan-defense-ministry-video-52059.html>.

战略存在并未终结。

此外，对关键节点失去控制，进一步表明俄罗斯的威慑能力下降。2024 年 7 月，俄罗斯边防正式撤离亚美尼亚埃里温国际机场，结束了自 1992 年以来对亚美尼亚这一内陆国的空中门户管理，失去了对亚美尼亚关键物资和人员流动的管控。^①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威慑信誉出现了战略降级。针对俄罗斯防空系统错误击落阿塞拜疆民航客机事件，俄罗斯总统普京极为罕见地向阿方道歉并承诺后续赔偿。^②这一不对称妥协并非单一的外交辞令，而是折射了俄罗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的战略调整，确保南部运输通道安全的功能性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维持地区主导地位的战略空间。

2. 通道权力下的经济身份转换与功能性依赖。俄罗斯战略地位的调整，也反映在其与南高加索国家经济关系的变化过程中。随着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持续与深入，俄罗斯与南高加索国家形成了与此前相反的经济依赖关系，这一关系说明了南高加索国家对自身特有的通道权力的有效运用。

首先，南高加索国家利用能源置换，为俄罗斯天然气找到了绕开制裁的“灰色接口”。2022 年，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签署《联盟互动宣言》，并展开实质性合作。^③尽管欧盟否认使用俄罗斯天然气，但俄阿双方这一协议使俄罗斯天然气间接保持了与欧洲市场的联系。然而，俄罗斯也丧失了通过将能源武器化进行地区制约的部分能力。

其次，俄罗斯在物流基础设施方面面临压力。由于西方制裁下俄罗斯的海洋通道受阻，为了保障贸易通道安全，俄罗斯加紧投资并推进国际南北运输走廊的建设，并与阿塞拜疆签署协议推进该走廊西线货运铁路的发展。与其他沿线国家相比，俄罗斯对这一走廊有着更为直接的需求。由此，俄罗斯同阿塞拜疆保持着紧密的战略合作，同时对亚美尼亚提出的替代方案保持警惕。亚美尼亚提出的替代方案主要指“和平十字路口”（Crossroads of Peace）

① “Russian Border Guards Leave Yerevan Airport”, *Radio Free Europe*, July 31, 2024, <https://www.rferl.org/a/armenia-russia-guards-airport-withdrawal/33058381.html>

② “Putin Admits Russian Air Defences were to Blame for Azerbaijani Jet Crash”, *The Guardian*, October 9,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5/oct/09/putin-russian-air-defences-azerbaijani-jet-crash>

③ “Declaration on Allie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February 22, 2022, <https://president.az/en/articles/view/55498>

倡议，旨在发展连接亚美尼亚、土耳其、阿塞拜疆、伊朗的区域交通网络，以降低对俄罗斯过境通道的依赖。

最后，由于南高加索国家一直保持对西方金融体系的准入，因此成为俄罗斯受限商品和外汇流动的“影子枢纽”，南高加索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借助这一渠道提升了自身在地区博弈中的相对地位。2024年3月，亚美尼亚支付系统（ArCa）正式停止服务俄罗斯米尔银行卡（Mir），直接展示了影子枢纽的挟制作用。^①金融贸易上的脆弱性，使俄罗斯在政治层面对南高加索国家的外交转向保持审慎克制。

上述两方面共同表明，俄罗斯在南高加索的角色出现结构性调整，其对该地区通道利益的依赖程度明显上升，规则塑造能力随之受到约束。俄罗斯在安全存在方面的阶段性收缩与经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共同构成其在南高加索面临能力赤字的具体表现。俄罗斯的能力赤字与意愿调整在实践中相互影响，能力的下降促使其主动收缩战略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彻底退出南高加索，只是由于能力下降，难以支撑过去的秩序主导地位。但是，南高加索地区在安全和政治仲裁领域出现地区失序，为第三方力量的结构性介入提供了入口。

（二）欧盟价值观外交与地缘功能的结构悖论

与俄罗斯因战略资源消耗而被迫收缩的情况不同，欧盟对南高加索的供给退却是现实利益驱动下的主动选择。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面临能源安全压力，因此选择性地压缩了规范供给的意愿，从而造成了价值观外交和地缘利益间的结构性悖论。欧盟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核心困境在于规范信用的透支。长期承诺的民主化红利与入盟前景无法兑现，导致欧盟规范性力量的可信度下降。安全供给缺位是欧盟长期以来的结构性局限，并不是俄乌冲突后的新问题。由此，欧盟意愿赤字的核心表现是，在能源安全优先的现实压力下主动收缩规范的输出，其以入盟前景为杠杆的规范性影响力由此出现系统性弱化。

1. 欧盟的能源安全压倒规范输出。能源安全是欧盟当前的优先事项，

^① “Armenian Banks Stop Accepting Russia’s Mir Cards as US Sanctions Start to Bite”, *CivilNet*, March 15, 2024, <https://www.civilnet.am/en/news/768638/armenian-banks-stop-accepting-russias-mir-cards-as-us-sanctions-start-to-bite>

寻求去俄化的能源供应成为欧盟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尽管欧洲议会对阿塞拜疆的民主人权问题高调谴责，但并不妨碍欧盟委员会与阿塞拜疆深入能源合作。欧盟的这种政策分裂，实质上赋予了阿塞拜疆在地缘博弈中的豁免。2025 年 12 月，欧盟进一步谴责阿塞拜疆的人权状况；^①然而，欧盟委员会同月将阿塞拜疆确立为欧盟能源转型的核心伙伴，持续拨款黑海海底电缆项目，并接洽与阿塞拜疆的风电合作项目。另外，欧盟进一步承认了阿塞拜疆的能源枢纽地位。除天然气外，2024 年，阿塞拜疆与中亚国家签署绿色能源战略伙伴协议，^②计划将中亚的绿色能源过境阿塞拜疆并通过黑海海底电缆输送至欧盟。由此，欧盟的规范制裁工具实际上已经失效。尽管欧盟持续批评其人权问题，但并未采取对阿塞拜疆的实质性制裁，暴露了欧盟价值观外交在现实利益面前的结构性局限。

2. 地区国家通道权力对欧盟的反制。除能源焦虑外，通道需求是欧盟面临的又一问题。首先，南高加索地区作为欧盟绕开俄罗斯的关键陆路通道，其战略价值因此大幅上升。欧盟在 2023 年设置亚美尼亚观察团之后，更加依赖陆路通道的补给。欧盟就这一事项面临通道咽喉国家格鲁吉亚的反制，一旦欧盟对格鲁吉亚实施严厉制裁，格方只需切断过境许可，即可导致欧盟在南高加索唯一的安全工具陷入瘫痪。而观察团自身又与 2025 年 8 月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和平协议的草签存在矛盾。阿亚和平协议正式签署后，观察团将不得不撤出亚美尼亚。除此之外，欧盟在能源和物流领域同样高度依赖南高加索这一陆路通道。因此，当格鲁吉亚通过《外国影响透明度法案》后，欧盟对其制裁相对有限，尽管暂停了入盟谈判，但欧盟并未实质性地剥夺格鲁吉亚对齐欧盟制度后所获得的核心成果。

3. 欧盟硬安全供给的缺位。相比俄罗斯和后来的美国、土耳其，欧盟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安全保障角色面临长期缺位的局面。当地区面临领土争端等硬安全问题时，欧盟不仅无法提供安全保障，甚至亦无法维持调停者的角

①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Azerbaijan, Nigeria and Guinea-Bissau”, *European Parliament*, December 11, 2025,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251211IPR32170/human-rights-violations-in-azerbaijan-nigeria-and-guinea-bissau>.

② “Kazakhstan, Azerbaijan and Uzbekistan Sign Agreement on Energy System Integration”, *The Astana Times*, November 14, 2024, <https://astanatimes.com/2024/11/kazakhstan-azerbaijan-and-uzbekistan-sign-agreement-on-energy-system-integration>

色。首先，欧盟亚美尼亚观察团尽管是西方安全力量首次进入南高加索地区，但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并未填补俄罗斯维和部队撤离后的硬安全缺口。其次，欧盟角色在硬安全领域的多边作用正在被双边作用替代，亚美尼亚已获得的安全支持均是基于双边框架的基础，尤其是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法国，面对欧盟机制的失灵，跳出欧盟框架与亚美尼亚建立深入的军事合作，进一步暴露了欧盟在硬实力和安全保障领域的行动力不足。

综上，欧盟基于现实利益的选择性退出，与俄罗斯在能力层面的物理性收缩共同叠加，使得过去主导南高加索地区秩序的两大行为体出现供给缺口，进而造成该地区在安全、规范、经济三大议题上的地区秩序失序同步加剧，吸引了多个第三方行为体的结构性介入。由此，南高加索地区从俄罗斯长期一家独大、欧盟规范持续渗透的主导格局，转向多方行为体分散介入的竞争态势，但这一转型仍处于过渡期，新的稳定秩序尚未成型。

（三）第三方力量的结构性介入

俄、欧权力在南高加索地区的退却，并未导致该地区陷入完全失序的状态，而是诱发了第三方力量的结构性介入。

1. 体系渗透：美国、土耳其、以色列的影响力嵌入。体系渗透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其介入不仅旨在填补俄、欧能力退却后的供给缺口，更试图借此将自身议程嵌入南高加索地区秩序的重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体系渗透国家并未形成正式的战略协调机制，其利益交汇更多体现为目标方向的相近性，而非明确的战略分工。

美国在南高加索的政策取向出现明显调整，从以安全援助为主转向借助推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达成和平协议，积极参与地区秩序重构。2025年8月草签的阿亚和平协议涉及“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之路”的通道构想，显示美国试图在地区互联互通安排中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同期分别提升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战略伙伴关系，强化双边制度联系。美国南高加索战略的上述转变，体现了其借俄、欧供给赤字之势，进一步扩大地区影响战略意图，但其实际成效有待观察。^①

^① Zaur Shiryev, “Europe Falls Behind in the South Caucasus Connectivity Rac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February 3, 2026,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europe/strategic-europe/2026/02/europe-falls-behind-in-the-south-caucasus-connectivity-race>

土耳其的体系渗透更为直接。其在南高加索的硬实力介入早已超越了单一的武器贸易，逐渐成为地区安全秩序的塑造者之一。在 2020 年纳卡地区冲突后，土耳其通过联合军事演习、条令对齐等方式完成了对阿塞拜疆的互操作性置换，使其军事力量符合北约标准。^①同时，土耳其与阿塞拜疆签订的《舒沙宣言》^②将两国松散的合作转化为体系化、同盟化，拓展了土耳其自身的防御半径。此外，土耳其将安全合作多边化，直接与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形成对冲。上述事件标志着土耳其有意在南高加索地区构建独立于俄、欧之外的安全体系。

最后，以色列虽为小国，但其体系渗透意图明显。其利用武器贸易的优势与阿塞拜疆进行深入的军事合作，延伸其中东安全战略的外延。以色列不仅在南高加索地区建立了针对伊朗的情报合作，^③同时通过与阿塞拜疆之间以技术换能源的合作方式，深入介入南高加索地区的地缘博弈，进而强化其中东的安全战略。

2. 存在维持：法国、印度、伊朗的积极介入。与体系渗透国家不同，存在维持国家的介入同样具有积极主动的一面：其目标在于防止在地区秩序重组中被边缘化、触及战略红线，或在特定议题上巩固自身存在。存在维持国家的介入具有选择性与议题针对性，不谋求全面替代原有秩序主导者的角色，但绝非消极被动。

法国的主动介入服务于其在北约内部制衡土耳其的战略目标。土耳其在该地区的迅速崛起与法国谋求欧洲的战略自主构成矛盾。在不与土耳其产生直接对抗的同时，法国绕开了欧盟集体行动的框架，与亚美尼亚展开军事合作。在挤压俄罗斯在该区域势力范围的同时，法国强化了在南高加索地区独立于美、土之外的独特的战略存在，并防止了土耳其-阿塞拜疆同盟对地区安全议程的垄断。

印度为了遏制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南高加索地区势力的扩张，出于对自

^① A. Garibov, "Azerbaijan, Georgia, Turkey: Advancing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trilateral partnership", *L'Europe en Formation*, 2018, No.385, pp.37-44.

^② *Shusha Declaration on Allied Relations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and the Republic of Turkey*, June 15, 2021, <https://president.az/en/articles/view/52122>

^③ A. Murinson, "The ties between Israel and Azerbaijan", *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Ramat Gan, Israel, 2014.

身战略安全环境的考量，采用跨区域的方式向亚美尼亚投射军事影响力。与此同时，经由伊朗恰巴哈尔港的国际南北运输走廊为印度提供了主动介入南高加索经济领域的接口，但因美以伊冲突而存在极大不确定性。上述两方面共同服务于印度在南高加索维持存在的防御性目标。

伊朗鉴于美国在南高加索构建的通道新概念，为防止该通道建成后有助于对伊朗的进一步制裁，而采取双向下注的方式，同时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开展通道合作，即与阿塞拜疆合建国际南北运输走廊西线的阿拉斯走廊，与亚美尼亚开辟波斯湾-黑海走廊并加强与其海关的合作。^①伊朗的双向通道战略并非谋求地区的主导地位，而是确保自身不因区域内任何一条通道的建成而被边缘化，保留了区域内的否决权。

3. 经济合作：中亚国家与中国的通道参与。经济合作国家通过通道联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方式，参与南高加索地区秩序的重组，并不谋求体系的渗透与安全议程的存在。由于南高加索位于亚欧大陆的十字路口，随着俄罗斯受到制裁后物流运输作用的减弱，中亚国家交通节点的崛起和中国的通道投资共同塑造了通道治理的新逻辑。

首先，中亚国家作为南高加索通道的上游交通节点，通过对自身过境通道的塑造成为中间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欧亚运输的关键通道。近年来，中亚五国积极与世界大国互动，不断强化其重要的通道作用。中亚国家通道治理方的重要地位已被国际认可。2025年，欧盟拟与中亚五国和南高加索国家共同提出“跨区域互联互通倡议”。足见中亚国家在通道权力再分配和南高加索通道发展领域的重要作用。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企业目前以商业合作为主要形式，参与了格鲁吉亚深水港等部分通道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并为相关项目提供融资担保，这与美国、土耳其的体系渗透在性质上有本质区别。

综上所述，第三方力量的结构性介入并没有在南高加索地区形成新的霸权，而是形成了共存、互补、竞争的多极格局。“体系渗透国家”试图通过新的制度安排替代俄、欧双方的旧秩序；“存在维持国家”则通过积极介入，

^① Vali Kaleji, “Is the Aras Corridor an Alternative to Zangezur?” *The Central Asia-Caucasus Analyst*, February 6, 2024,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788-is-the-aras-corridor-an-alternative-to-zangezur?.html?tmpl=component&print=1>

维持自身在南高加索的利益；而“经济合作国家”利用通道获得经济性、功能性的收益。这三种类型的第三方力量，共同将南高加索地区推向多极分散的新形态。而这一格局也为南高加索三国差异化的战略调适提供了空间。

四、大国博弈下南高加索三国的战略调适

在俄、欧供给赤字与第三方力量结构性介入的双重作用下，南高加索三国均面临外部供给的根本性重组，但三国的战略调适路径却因资源禀赋与制度身份偏好的差异而截然不同。

（一）阿塞拜疆：利用地区秩序重组的主动调适

由于阿塞拜疆的资源禀赋与俄、欧的刚性需求相契合，阿塞拜疆并未采取小国通常使用的被动调适策略，而是基于自身能源和通道的双重资源禀赋，实施主动调适策略。这一策略的基础，源于阿塞拜疆在南高加索地区建立的压倒性军事优势。2025 年，阿塞拜疆军费预算约 49 亿美元，分别是同期亚美尼亚（17 亿美元）和格鲁吉亚（6.15 亿美元）的 2.8 倍和 8 倍。^①阿塞拜疆在战略上抓住了大国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刚性需求，利用俄罗斯对通道、欧盟对能源的刚性需求，将自身的资源禀赋转化为对俄欧的反向规制能力。同时，阿塞拜疆引入土耳其作为自身安全的核心硬支撑，并加强与美国、以色列的战略合作，从而成功解决了纳卡问题，在南高加索地缘的重塑过程中占据主动，完成了向地缘枢纽角色的跃升。

1. 引入土耳其，实现从装备优势到体系嵌入的安全保障。长期以来，与区域内的其他国家相比，阿塞拜疆的武器具有代际优势。^②在阿塞拜疆与土耳其签订《舒沙宣言》之后，双方的军事合作向更为深层的战术同盟层面拓展。土耳其军事高层曾经作为顾问进入阿塞拜疆的军事核心。^③2025 年 9

^① Nerses Kopalyan, “Deterrence and Coercion: Armenia and Azerbaijan’s Diverging Defense Postures”, *EVN Report*, June 20, 2025, <https://evnreport.com/politics/deterrence-and-coercion-armenia-and-azerbaijans-diverging-defense-postures>; “GD Parliament Approves 2025 State Budget”, *Civil.ge*, October 13, 2025, <https://civil.ge/archives/643485>

^② Pieter D. Wezeman, Alexandra Kuimova, Jordan Smith, “Arms Transfers to Conflict Zones: The Case of Nagorno-Karabakh”, April 30, 2021, <https://www.sipri.org/commentary/topical-backgrounder/2021/arms-transfers-conflict-zones-case-nagorno-karabakh>

^③ Can Kasapoğlu, *Turkey’s Overlooked Role in the Second Nagorno-Karabakh War*, Washington D. C.: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2021, No.1, pp.1-12.

月，在巴库举行的“永恒兄弟情-4”特种部队演习，集结了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中亚国家的军事力量，这一带有若干泛突厥色彩的军事演习，对冲了以俄罗斯为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该区域的影响力。^①除此之外，阿塞拜疆的技术人员已经加入了土耳其第五代战机的研发团队，这标志着两国在军事领域走上了从传统的武器贸易到技战术合作、最终嵌入国防工业体系的合作之路。^②

值得注意的是，阿塞拜疆并不止于同土耳其的双边合作，还积极推动所谓突厥国家组织的多边合作，试图将这一组织的文化作用过渡到安全与经济的双重助力，形成独立于俄、欧主导之外的新地缘概念板块，从而为自身的主动调适策略争取新的多边制度依托。

2. 运用通道权力规制俄罗斯，实现从战略附属到对等议价的角色转换。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为了规避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更加重视国际南北运输走廊的战略意义。而阿塞拜疆作为该走廊的关键枢纽，战略地位陡然上升。阿塞拜疆利用自身作为通道关键节点所拥有的议价能力，与俄罗斯进行博弈。由此，俄罗斯维和部队提前从纳卡地区撤离并在纳卡问题上保持中立。与之相对应，阿塞拜疆充分发挥枢纽作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阿塞拜疆与俄罗斯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率迎来显著增长（见表2）。^③这一现象表明，阿塞拜疆通过保障俄罗斯的物流通道安全，换取了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安全秩序上的战略让步。阿塞拜疆利用通道换安全的策略将俄罗斯的能力赤字转化为议价筹码。

3. 凭借能源枢纽地位，构建抵御欧盟规制的防御工具。阿塞拜疆利用南部天然气走廊与欧盟形成能源的物理锁定。由于该走廊是欧盟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重要一环，阿塞拜疆的能源输送对欧盟的能源安全至关重要。

① “Baku Hosts Eternal Brotherhood – IV Multinational Joint Special Forces Exercise”, *Ministry of Defense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September 9, 2025, <https://mod.gov.az/en/news/baku-hosts-eternal-brotherhood-iv-multinational-joint-special-forces-exercise-55504.html>

② “Ankara, Baku to Cooperate in Development of Türkiye’s 5th Generation Fighter Jet”, July 28, 2023, <https://aze.media/ankara-baku-to-cooperate-in-development-of-turkiyes-5th-generation-fighter-jet>

③ “Trade Turnover Between Azerbaijan and Russia Shows Noticeable Growth in 2025”, *Ministry of Defense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Trend*, January 25, 2026, <https://www.trend.az/business/4145575.html>

正是利用欧盟对能源的刚性依赖，阿塞拜疆得以化解来自欧盟的政治施压。2024 年，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对阿塞拜疆的人权状况进行指责并要求对其进行制裁。^①然而，欧盟内部规范输出与能源利益的结构性矛盾，以及欧盟委员会在能源问题上的切割式回应，表明只要南部天然气走廊持续供气，欧盟的规范性力量就不会对阿塞拜疆施以实质性制裁。在阿塞拜疆明确拒绝欧盟的规范绑定后，欧盟对阿塞拜疆的政策转变为利益导向。由此，能源成为阿塞拜疆抵御大国规范渗入的防御工具。

表 2 2014—2025 年阿塞拜疆与俄罗斯双边贸易额及增长率

年 份	贸易总额（亿美元）	同比增长率（百分比）
2014	19.55	-24.31
2015	18.56	-5.06
2016	20.51	10.51
2017	21.41	4.39
2018	25.50	19.10
2019	30.22	18.51
2020	26.72	-11.58
2021	29.95	12.09
2022	37.10	23.97
2023	43.59	17.49
2024	48.00	10.12
2025	49.20	2.5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阿塞拜疆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制作。^②

①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n the Situation in Azerbaijan,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Relations with Armenia (2024/2890(RSP))” October 24, 2024,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10-2024-0036_EN.html

② State Statistical Committee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Azerbaijan*, <https://www.stat.gov.az>

综上所述，阿塞拜疆运用通道对俄罗斯进行规制，对欧盟能源利益实现锁定，不仅完成了实现领土完整的目标，更在南高加索新一轮变局中占据了地缘枢纽的地位，成为该地区地缘政治的重要参与者。2025年8月，阿亚和平协议草案的签署以及“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之路”构想的提出，进一步揭示了阿塞拜疆的主动调适路径，即试图引入美国资本的开发租赁权，完成本土与飞地纳希切万的关键连通。通过引入美国这一新的第三方力量，阿塞拜疆不仅促成了南高加索大国力量多极平衡的态势，更将该区域的地缘政治竞争转化为可变现实的地缘租金。这样，阿塞拜疆通过与土耳其结盟、对俄罗斯议价、对欧盟切割的不对称博弈，完成了自身在南高加索战略地位的跃升。就调适成效而言，阿塞拜疆在三国中的调适成效最为显著，不仅实现了领土完整目标，更将自身从大国供给的接受者转变为地区秩序的重要参与者，战略自主空间显著扩展，主动调适基本达成预期效果。

（二）亚美尼亚：基于生存危机的被动调适

与阿塞拜疆的主动调适不同，亚美尼亚的战略调适呈现出基于生存危机的被动特征。作为深锁于高加索山脉南麓的内陆小国，亚美尼亚长期处于地缘封锁和依赖单一大国的双重困境：一方面，亚美尼亚在地缘上长期受到土耳其、阿塞拜疆的封锁；另一方面，其在安全和经济上长期对俄罗斯有结构性依赖。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对南高加索地区的安全供给持续下降，导致亚美尼亚在维持对俄经济依赖的同时，在安全领域急于寻求第三方力量的保障。这一战略调适并不是亚美尼亚的主动选择，而是其在大国治理赤字下的生存焦虑和被动避险。第三方力量的介入虽然缓解了亚美尼亚即时的安全压力，但无法改变自身资源禀赋造成的弱势地位。亚美尼亚资源局限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具有对大国所需能源的出口能力；二是不掌握任何大国无法绕开的关键通道节点；三是缺乏可转化为反向规制筹码的战略资产。上述三方面的缺失，决定了亚美尼亚无法像阿塞拜疆那样将大国的供给赤字转化为议价的能力，只能通过扩大接触的方式分散风险，因此难以主动塑造新的供给结构。

1. 驱离与制度冻结，降低对俄传统安全机制的依赖。在俄罗斯供给赤字的影响下，亚美尼亚采取了较为激进的去俄化步骤。亚美尼亚的国家安全

长期高度依赖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但当亚美尼亚面临 2022—2023 年的纳卡冲突时，该组织未能履行对亚美尼亚的安全承诺。^①由此，亚美尼亚的执政精英对俄罗斯的认知发生重大转变，并将这一转变付诸实践。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于 2024 年宣布冻结亚美尼亚在该组织的成员国资格，并停止缴纳会费、缺席该组织的相关会议。2024 年 7 月，亚美尼亚正式终止俄罗斯在其首都埃里温机场的执勤任务并接管空港，完成了对俄罗斯物理空间的驱离与制度冻结。^②尽管俄罗斯边防人员仍参与亚美尼亚与伊朗、土耳其的边境管理，但该事件标志着，自 1992 年以来，俄罗斯首次对亚美尼亚关键物理节点失去控制。

2. 引入北约标准装备，构建独立于俄制以外的威慑平衡。在降低旧安全供给的同时，亚美尼亚迅速引进西方力量填补安全供给缺口，并加快了武器的“北约化”的改造。俄罗斯对亚美尼亚武器出口的占比，已由过去十年的 94% 迅速下降到 2024 年的 10%。^③与此同时，向法国寻求武器援助成为亚美尼亚弥补安全供给缺口的主要手段之一。2024 年 6 月，亚美尼亚与法国签署了“凯撒”榴弹炮的采购协议，成为该国建国以来首次获得北约规划的进攻型武器。此后，亚美尼亚开始系统性部署法制武器，并寻求技术转让与本地化生产的可能。此外，亚美尼亚与印度开展了重要的防务合作。亚美尼亚从印度进口了大量“皮纳卡”多管火箭炮及反无人机系统，构建了法印双轨的武器采购模式。武器装备制式的转换，揭示了亚美尼亚的国防安全从俄式体系强制切换到欧制体系的现实，同时引入的“北约标准”和作战互操作性，使亚美尼亚军队接触到了西方的军事标准，尽管俄亚双方关于俄军驻亚美尼亚基地的续期仍至 2044 年，但法制、印制军事装备的引入，使亚美

① “Speech by Prime Minister Nikol Pashinyan at the Session of the CSTO Collective Security Council”, *Prime Minister of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November 23, 2022, <https://www.primeminister.am/en/statements-and-messages/item/2022/11/23/Nikol-Pashinyan-CSTO-meeting>

② “Russian Border Guards Leave Yerevan Airport”, *Radio Free Europe*, July 31, 2024, <https://www.rferl.org/a/armenia-russia-guards-airport-withdrawal/33058381.html>

③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23”, March 2024, p.4,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3/fs_2403_at_2023.pdf; “Russia’s Share of Armenia’s Arms Imports Drops from 94% to 10%”, March 12, 2024, <https://bm.ge/en/news/the-share-of-arms-deliveries-from-russia-to-armenia-has-decreased-from-96-to-10>

尼亚初步构建了一套独立于俄罗斯的威慑能力。

3. 提升与美欧伙伴关系层级，从对大国的单一依赖过渡到多元化嵌入。在与法国开展防务合作的同时，亚美尼亚试图提升与西方的制度性关联，以填补俄罗斯留下的政治信誉缺口，避免陷入后续可能出现的更为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亚美尼亚与美国于 2025 年年初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①在军事领域，美国同样强化了与亚美尼亚的联系，曾于 2023 年至 2025 年连续三年开展联合军演，表明美军在亚美尼亚的实质性存在。亚美尼亚与欧盟的关系于 2025 年也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并明确将安全和防务列为新的合作领域。欧盟民事特派团于 2023 年 2 月开始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边境部署，^②成为首个在亚美尼亚部署的西方安全机构。更为重要的是欧盟对亚美尼亚的经济帮扶，2024 年启动的《韧性增长计划》承诺提供 2.7 亿欧元的资金支持。^③与此同时，欧盟通过加快签证自由化进度，将亚美尼亚置于欧盟东部伙伴的特殊地位，试图通过规范力量将亚美尼亚深入锁定。

综上所述，亚美尼亚的被动调适是基于大国供给赤字下的应急反应。然而，这种策略调适面临结构性悖论。尽管亚美尼亚在政治上“向西看”的趋向明显，但其经济的基本盘仍深陷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的体系之中（见表 3），这种分裂的政策态度容易受到俄罗斯通过经济杠杆带来的反制。因此，亚美尼亚不得不寻求地缘生存的消极保障，即利用伊朗对两国边界现状的极度关切。伊朗明确反对赞格祖尔走廊的强行推进。这客观上为亚美尼亚提供了底层的地缘安全保障。亚美尼亚的案例揭示了缺乏关键资源的小国在摆脱大国依附时所需承受的高昂且极具风险的转型成本。就调适成效而言，亚美尼亚的被动调适在短期内缓解了即时安全压力，但经济基本盘仍深度嵌入俄罗斯体系，安全领域的新依赖尚未稳固，“安全向西、经济向东”的结构性

① “Armenia and U.S. sign document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Armenpress*, January 15, 2025, <https://armenpress.am/en/article/1209493>

② “Armenia: EU Establishes a Civilian Mission to Contribute to Stability in Border Areas”,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January 23, 2023,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3/01/23/armenia-eu-sets-up-a-civilian-mission-to-ensure-security-in-conflict-affected-and-border-areas>

③ “A Resilience and Growth Plan for Armenia”,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April 2024, https://www.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24/STR_EU-AM%20Growth%20plan%20V3.pdf

撕裂构成了持续的隐患，调适成效有限。值得注意的是，未来，随着亚美尼亚对欧盟制度嵌入的持续深化，其战略调适路径存在着从被动调适向困境调适演变的可能。届时，制度身份偏好将对亚美尼亚尚不充裕的资源优势形成叠加约束，其战略处境将更为复杂。

表 3 亚美尼亚关键物资中的俄罗斯占比

类别	占比
粮食（小麦、玉米、大麦）	99.9%（2024 年）
意大利面、人造黄油、面粉	82.2%、72%、66.6%（2022 年）
天然气	79.5%（2025 年）
石油	75%（2025 年）
核电（境内唯一核电站由俄方运营）	100%（2025 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亚美尼亚共和国统计委员会数据整理制作。^①

（三）格鲁吉亚：加入欧盟框架下的困境调适

格鲁吉亚表现出困境调适的典型特征。格鲁吉亚作为南高加索地区加入欧盟意愿最强的国家，通过对国家历史的重新描述，将融入欧盟和北约写入国家宪法。^②然而，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南高加索地区的安全赤字以及欧盟的制度红利迟迟无法兑现，导致格鲁吉亚陷入两难。而第三方力量虽然为

① 表中数据来自亚美尼亚国家统计委员会（Armstat）及相关能源运营协议。其中，能源及基础设施领域的依赖受长期协议绑定，采用截至 2025 年的现状评估；食品类物资的进口占比受国际贸易波动影响，故采用亚美尼亚官方在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初期以及 2024 年公布的最终核查/海关清算数据。参见亚美尼亚共和国统计委员会官网（<https://armstat.am/en>）。

② 2018 年全面修订生效的《格鲁吉亚宪法》（*Constitution of Georgia*）第 78 条。该条款明确将全面融入欧盟和北约确立为国家既定目标并延续至今。这一最高法律承诺不仅为格鲁吉亚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根本法层面的路线指引，也深刻反映了加入欧盟是多数格鲁吉亚人的共同选择。

格鲁吉亚提供了反制欧盟的筹码，但并未向格鲁吉亚提供实质的安全保障。尽管通道的资源禀赋成为其进行议价的基础，但由于深度与欧盟对齐，导致格鲁吉亚不能像阿塞拜疆那样对大国进行议题切割，其通道资源并未转化为有效的议价筹码，而是被制度身份偏好的刚性约束所封堵，由此陷入难以突破的困境调适。

1. 依靠深厚的制度和民意基础，维持向欧盟对齐的亲欧底色。自 2024 年以来，格鲁吉亚国内政治风波不断。但经过长期向欧盟对齐的过程，格鲁吉亚已经形成了制度存量与惯性。格鲁吉亚与欧盟在 2014 年签署《联系国协定》与《深度和全面自由贸易区协定》以来，在 160 余个欧盟能力建设项目的影响下（见表 4），^①合作已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与欧盟法规的趋同方面。^②截至 2025 年 3 月，格鲁吉亚立法已与《深度和全面自由贸易区协定》规定的欧盟法案实现了 68% 以上对齐。^③根据欧盟 2025 年开展的民意调查，有 74% 的格鲁吉亚人投票支持加入欧盟，反对率仅为 5%；80% 的受访者表示，加入欧盟将给国家带来利大于弊的影响。^④强大的制度惯性和民意基础决定了格鲁吉亚只能在保留欧盟候选国地位的前提下寻求回旋空间。

2. 借助主权立法向俄罗斯释放缓和信号，换取大国安全赤字下的生存空间。格鲁吉亚于 2024 年通过的《外国影响透明度法案》是其战略调适的分水岭。对于西方而言，该法案的颁布是格鲁吉亚民主的倒退，欧盟因此冻

^① 目前，欧盟在格鲁吉亚开展 160 余个能力建设项目，涉及行政、法律、商业、日常生活等多个领域。“EU Launches New Website Showcasing Over 160 Active EU Projects in Georgia”, *EEAS*, May 29, 2020, https://www.eeas.europa.eu/delegations/georgia/eu-launches-new-website-showcasing-over-160-active-eu-projects-georgia-eu4georgiage_en

^② 该报告指出，格鲁吉亚的新《公共采购法》已提供了更详细和广泛的规定，特别是在利益冲突方面，与欧盟 2014/24/EU 指令保持一致。See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Georgia 2023 Report”,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and Enlargement Negotiations*, November 8, 2023, https://enlargement.ec.europa.eu/system/files/2023-11/SWD_2023_697%20Georgia%20report.pdf.

^③ “Genadi Arveladze Presented DCFTA Implementation Report, 2025 Action Plan and Recommendations within Enlargement Report to Parliament”, *Ministry of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eorgia*, March 12, 2025, <https://www.economy.ge/index.php?page=news&nw=2677&lang=en>

^④ “Annual Survey 2025 – Georgia”, European Union, *EU Neighbours East*, August 25, 2025, <https://euneighbourseast.eu/news/publications/annual-survey-2025-georgia>

结了格鲁吉亚的入盟进程。^①在地缘政治的视角下，由于长期未获得欧盟及北约的安全供给，并担心乌克兰危机外溢的风险，因此，尽管与俄罗斯存在着历史矛盾，格鲁吉亚还是选择了与俄罗斯缓和的战略调适。《外国影响透明度法案》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限制了西方非政府组织在格鲁吉亚的资金渗透，以立法的形式表明了格鲁吉亚不会成为西方向俄罗斯输出“颜色革命”的中继站。通过主权叙事向俄罗斯释放缓和信号，格鲁吉亚试图换取俄方降低对自己的安全压力，从而避免成为地缘政治的直接牺牲品。

3. 引入资本与通道权力，实现对欧盟规范输出的反向制约。 欧盟虽然冻结了格鲁吉亚的入盟进程，但始终未采取更严苛的制裁，原因在于格鲁吉亚在通道中的“咽喉效应”。无论是绕开俄罗斯的南方能源走廊，还是向欧盟输送电力的黑海电缆项目，抑或是欧盟驻亚美尼亚观察团的陆路补给，以上事关欧盟重大事项的物理通道均无法绕过格鲁吉亚领土。这种“咽喉效应”为格鲁吉亚带来了部分豁免欧盟规范的权力，例如，使欧盟仍维持格鲁吉亚公民免签待遇等关键的合作成果。此外，格鲁吉亚引入中国资本作为其战略支点。2024 年，格鲁吉亚政府宣布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参与阿纳克利亚深水港的建设，^②该港是中间走廊西端的关键港口。格鲁吉亚通过引入中国资本参与其重要港口建设，向欧盟表明其合作伙伴的多元化，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欧盟对其的政治压力。

综上所述，格鲁吉亚的困境调适解释了强烈的制度身份偏好对小国资源禀赋转换的影响。格鲁吉亚并非缺少资源禀赋，其同样拥有与阿塞拜疆相似的通道资源，然而，格鲁吉亚深度嵌入欧盟制度形成的身份认同，导致其无法实际利用通道资源的杠杆作用。因为一旦使用，格鲁吉亚将会背离国家几十年来的制度惯性和民众意志。格鲁吉亚的案例表明，资源禀赋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战略调适的自主空间。当制度身份偏好与资源杠杆方向相冲突时，前者作为边界条件就会限制资源优势的兑现，这正是困境调适区别于主动调适的核心机制。就调适成效而言，格鲁吉亚在三国中成效最低，拥有通道禀赋

^① “European Council Meeting (27 June 2024) – Conclusions”, June 27, 2024,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4/06/27/european-council-conclusions-27-june-2024>

^② “Minister of Economy Announces Sino-Singaporean Consortium Winner in Anaklia Port Selection Competition”, *Civil.ge*, May 29, 2024, <https://civil.ge/archives/610259>

却无法将其转化为有效议价筹码。入盟进程停滞，战略自主空间持续收窄，体现了格鲁吉亚左右为难的困境。

表 4 格鲁吉亚运行的欧盟能力建设项目类别

项目类别	代表性项目
经济与贸易	中小企业增长与创新、企业发展服务、商业支持组织建设
农业与乡村发展	欧洲农业和农村发展睦邻计划、农业设备共同融资、农业保险计划、农场登记项目
教育与技能发展	职业技能提升计划、青年技能提升、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
数字化与连接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宽带网络扩展、电子政务项目
民主与治理	公共行政改革、选举监督、反腐败项目、法治与人权倡导
环境与气候变化	可再生能源项目、气候适应性建设、环境保护倡导
文化与社会	欧盟文化支持计划、社会企业支持、文化创新项目、青年参与和赋权项目
公共卫生	疫情监测与基因组学能力建设、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提升、健康教育与宣传项目
统计与数据	国家统计系统强化、数据收集与分析能力建设、统计方法与标准对接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欧盟公布的资料整理制作。^①

（四）资源禀赋、第三方力量如何决定战略调适路径

通过对南高加索三国案例的考察，可以归纳出小国的资源禀赋如何决定

^① “EU for Georgia”, *European Union*, <https://eu4georgia.eu>

其调适路径。

第一，俄、欧供给赤字是南高加索三国调适路径的开端，但供给赤字并不完全决定调适路径。三国不同的调适路径表明，来自外部的结构性约束只是塑造了小国战略调适的边界，并不决定调适路径的方向。关键要素还是在于小国自身的资源禀赋。

第二，资源禀赋的差异揭示了三国战略调适路径的分化。阿塞拜疆将能源和通道资源作为杠杆，将大国的刚性需求转化为自身在地缘政治中的筹码，最终实现主动调适。而亚美尼亚缺乏关键资源禀赋，只能通过多向接触替代对单一国家的深度依附，通过同时与欧盟、法国、印度、美国等多方接触分散风险，但与各方的接触均停留于浅层，未能形成深入的战略嵌入，结果陷入被动调适。而格鲁吉亚同样拥有可观的通道资源，但由于长期将加入欧盟和北约写入宪法，加上民众对入盟的高度支持和数十年的制度嵌入所形成的制度和身份偏好，导致格鲁吉亚通道资源的杠杆效用受到刚性约束，陷入困境调适。

第三，第三方力量对南高加索三国的结构性介入呈现不对等。这一不对等是第三方力量的战略需要与小国资源禀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安卡拉的泛突厥战略目标与巴库的能源、通道等资源禀赋高度契合，推动了土耳其与阿塞拜疆深入合作，扩大了土耳其在南高加索地区影响。法国对亚美尼亚的支持，出于自身制衡土耳其在该地区扩张的战略需要；印度支持亚美尼亚，出于制衡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战略考量。但两国受到自身战略成本的约束，介入深度都较为有限。中亚国家与格鲁吉亚的合作仅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并不涉及格鲁吉亚的安全需求。

综上所述，第三方力量的结构性介入与小国的资源禀赋相互强化。资源禀赋强的小国，其资源优势与第三方力量的战略需求契合度更高，更容易获得第三方力量的深度支持，从而进一步扩大小国主动调适的空间；资源禀赋弱的小国吸引的第三方力量往往有限且分散，无法弥补大国供给退却后的缺失。这表明，南高加索地区的多极化趋势并非对三国均等赋权。在多极化的趋势下，资源禀赋的差异会被第三方力量不均等的结构性介入进一步放大（见表 5）。

表 5 南高加索三国战略调适路径比较

国 家	资源禀赋	制度身份偏好	调适类型	调适成效
阿塞拜疆	充裕（能源、通道双重禀赋）	不构成刚性约束	主动调适	高：战略跃升，调适成效显著
亚美尼亚	匮乏（缺乏关键战略资产）	西方认同形成中，尚未固化	被动调适	中：缓解即时压力，结构困境未变
格鲁吉亚	一定禀赋（通道资源）	强烈且刚性，入盟计划已写入宪法	困境调适	低：调适停滞，调适成效最低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 语

本文通过对 2020 年以来南高加索地缘政治秩序演变中大国供给赤字、地区秩序重组与小国战略调适的系统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俄、欧供给赤字是南高加索三国战略调适的结构触发条件，但外部结构只划定调适边界，不决定调适方向。第二，资源禀赋是解释三国调适路径分化的核心变量，制度身份偏好作为边界条件决定资源优势能否充分兑现。第三，第三方力量的结构性介入效果因三国资源禀赋而产生系统性分化，南高加索的多极化趋势对三国赋权不均，在结构上进一步放大了既有的资源禀赋差距。

就地区秩序重组与小国战略调适的关联性而言，本文的核心发现在于，地区秩序重组为小国提供了战略机遇窗口，但能否把握住这一窗口，根本上取决于小国自身的资源禀赋与战略运用能力。秩序重组本身并不决定调适路径，小国对资源禀赋的主动运用才是路径分化的核心驱动力。俄、欧供给赤字造成的秩序失序，使阿塞拜疆的能源与通道禀赋从既有约束下的潜在资产转变为可兑现的战略筹码，使亚美尼亚的资源匮乏在多极竞争中愈发凸显，也使格鲁吉亚的通道禀赋因制度偏好的刚性约束而无从发挥。这一发现揭示了地区秩序重组的差异化放大效应，秩序重组本身并不为小国创造资源，而

是决定了小国既有资源能否或以何种方式转化为战略自主空间。通过对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三个南高加索国家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三国在相同外部压力下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调适路径，对现实主义的结构决定论构成了一定的理论挑战。外部结构制约固然存在，但无法解释小国调适的路径分化。阿塞拜疆的主动调适、亚美尼亚的被动调适与格鲁吉亚的困境调适，共同为资源禀赋决定调适路径这一核心判断提供了系统性的经验支撑。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有两点贡献：第一，以资源禀赋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系统地比较三国战略调适的分化，并将制度身份偏好作为边界条件引入，解决了既有对冲理论无法解释具有资源禀赋的小国仍陷入调适困境的问题；第二，通过区分能力赤字与意愿赤字两种类型，细化了大国供给退却机制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既有研究的不足。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以大国安全供给能力同步退却为适用前提，在大国供给相对稳定的情境下，资源禀赋对调适路径的决定性作用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干扰。此外，本文的三种调适类型是基于南高加索特定地缘结构下的经验归纳，对原苏联空间其他地区乃至更广泛情境的解释力，有待后续研究加以检验。

在政策层面，南高加索三国战略调适的差异性说明，当地缘政治秩序向多极化过渡时，小国能否抓住机遇，取决于其资源禀赋能否与各方的刚性需求相契合。更重要的是，如果小国试图在大国林立的环境下寻求一定的战略自主，自身资源的价值与外交议题分离的能力，或许比单纯的阵营选择更具意义。

（责任编辑 宋羽竹）

美国运筹赞格祖尔的政治逻辑 ——走廊治理的制度嵌入与权力重组*

张泽明**

【内容提要】在世界多极化与区域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交通走廊逐渐从单一的物流与经济通道演变为大国嵌入地区秩序的重要制度载体。2025年签署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美国在该协议框架下获得了赞格祖尔走廊的长期独家开发与运行权，该安排随后被正式命名为“特朗普国际和平繁荣之路”。和平协议使赞格祖尔走廊成为外部力量通过基础设施治理重塑南高加索地区秩序的关键案例。赞格祖尔走廊的治理实践表明，当代走廊治理既不同于传统的殖民式控制，也有别于多边合作型互联项目，呈现出“制度嵌入-租赁化”的中间形态。通过整合走廊政治、主权协商与互联互通研究脉络，并提出“走廊治理三角”分析框架，将主权协商与功能性配置、互联互通利益与安全保障视为相互耦合的治理维度，对“特朗普国际和平繁荣之路”的形成、谈判与制度运行展开了过程追踪分析。在具体进程中，外部大国通过长期开发权、法律嵌入与安全-经济绑定机制，使交通走廊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性存在，从而弱化既有调停结构并重塑地区秩序。与此同时，小国在安全脆弱性与发展压力下，通过有限主权协商换取投资与安全承诺，形成了一种有条件的制度交易结构。

【关键词】走廊治理 赞格祖尔走廊 区域秩序 主权协商 基础设施政治

【中图分类号】D736**【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2-0121(25)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危机、秩序与全球大转型：俄乌冲突后的世界秩序演进”（项目批准号：25JJD810002）的阶段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张泽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亚历山大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生。

当今国际秩序正处于剧烈的转型期。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单极格局在 21 世纪 20 年代逐渐走向多极化，美国、欧盟、俄罗斯与中国在欧亚大陆的力量分布、竞争方式与制度化介入路径呈现出日益复杂且相互交织的变化趋势。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全球战略层面的力量再平衡，更具体地表现为大国在区域层面通过制度安排、基础设施项目与安全承诺重塑影响力边界的过程，其中交通走廊、能源通道与跨境基础设施逐渐成为连接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重要制度载体。大国关系的结构性调整不仅体现在全球战略层面，也深刻影响着地区性秩序的重组。在这一结构性背景下，南高加索地区因其处于里海、黑海、地中海体系的交汇位置，并同时承载欧亚大陆东西向与南北向交通线路的枢纽功能，重新被纳入外部大国竞争性治理与制度性嵌入的政策视野。与传统聚焦军事部署或外交调停的干预方式不同，近年来外部力量在该地区的介入越来越多地通过基础设施治理、通道制度设计与长期运行权安排展开，使交通走廊本身从通行空间转化为具有规则、权力与分配效应的治理场域。

2025 年 8 月 8 日，在美国主导的斡旋下，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签署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其核心突破之一是，围绕赞格祖尔地区建立新的跨境交通通道。更具制度性意义的是，美国在该协议框架下获得了该走廊的长期独家开发与运行权，该安排随后被正式命名为“特朗普国际和平繁荣之路”（Trump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Prosperity Path，以下简称“TRIPP”）。这一设计不仅为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两国关系正常化提供了物质与制度基础，也标志着外部大国以基础设施治理替代传统调停机制、实现长期嵌入的新型介入路径。与此前由俄罗斯、法国与美国共同主导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明斯克小组（OSCE Minsk Group）相比，TRIPP 的建立意味着调停权、治理权与制度性存在的重心发生了实质性转移，从而使交通走廊成为重构地区秩序的关键制度节点。

在此背景下，本文关注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美国缘何能够在俄罗斯传统影响区内建立制度化、长期性的存在；TRIPP 的制度设计将如何重塑南高加索地区的权力结构与秩序形态；这一案例对理解“走廊治理”在区域秩序重构中的作用机制有何理论启示。在理论层面，本文提出并发展“走廊治理”

概念，强调交通走廊不仅是地缘经济与地缘战略的连接通道，更是外部力量实现制度嵌入与地区国家在主权安排、发展利益与安全需求之间进行策略性制度选择的重要平台。在实践层面，TRIPP 案例展示了在多极竞争与安全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小国如何通过有限的制度性协商换取投资、连通性与安全保障，同时也揭示了大国如何利用基础设施安排实现影响力的制度化延伸。通过对 TRIPP 协议形成、谈判与治理机制的系统分析，本文旨在深化对欧亚地区秩序转型的理解，并拓展国际关系理论在基础设施政治与区域治理维度的解释边界。

一、文献综述：走廊政治的学术脉络

从交通地理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既有研究来看，“走廊”（Corridor）通常被视为一种依托跨境基础设施网络而形成的空间组织形式，其基本功能在于实现人员、货物与能源的跨区域流动，并通过交通线路、物流体系与制度规则的整合，推动地理空间的重组与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①在此基础上，政治地理学进一步指出，走廊并非单纯的物理通道，而是在多国互动中逐步制度化的治理空间，其运行过程往往伴随着规则嵌入、治理权分配和权力关系的再配置，因此天然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与战略含义。^②在国际政治实践层面，交通走廊日益被纳入国家战略规划与区域合作框架，成为大国塑造地区秩序、推进制度嵌入与经济整合的重要政策工具。例如，连接中国与欧洲的“中间走廊”（Middle Corridor）及其沿线的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Baku-Tbilisi-Kars）和配套的能源通道，被广泛视为欧亚互联互通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接波斯湾与黑海的跨区域交通走廊（Persian Gulf - Black Sea Corridor），则体现了能源运输与地缘政治竞争的高度耦合。^③而长期处于争

① Jean-Paul Rodrigue, *The Geography of Transport Systems (5th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20, pp.7-8.

② Colin Flint, Peter J. Taylor,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London: Routledge, 2018, pp.47-88.

③ Shabnam Dadparvar, Vali Kaleji, “The Persian Gulf-Black Sea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and Transit Corridor: Goals and Constraints”,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2024, Vol.26, No.2, pp.203-225.

议状态的赞格祖尔走廊，更集中反映了走廊建设过程中主权安排、治理模式与安全议题的交织关系。由此可见，从国际关系与区域治理的综合视角来看，走廊既是物质基础设施的集合体，也是各行为体通过制度设计与权力协商所构建的战略性治理空间，其形成与运作往往伴随着主权相对化、联盟关系调整以及区域权力结构的重塑。本文将“走廊”界定为一种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政治实体以基础设施网络为物质载体，通过制度化安排实现多个行为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战略性空间单元。在这一空间中，交通功能、制度规则与权力关系相互嵌入，其形成与运作不仅影响区域经济联系，也深刻塑造国家间的治理结构与秩序形态。

既有研究多集中于能源管道与国际运输网络的政治功能。例如，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Baku-Tbilisi-Ceyhan Pipeline）、中亚天然气管道以及中欧班列等项目就被视为“联通性政治”（Connectivity Politics）的典型案列，被广泛讨论。^①这些研究揭示了，走廊不仅是物流与能源输送的物理通道，更是国家间权力投射、规范竞争与战略合作的重要载体。我国学者樊凡、吴冰冰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南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格局与关键通道建设，指出该地区处于俄罗斯、欧美、土耳其、以色列与伊朗五方力量的交汇点，是文明板块碰撞与安全冲突频发的“地缘破碎带”，亦是连接欧亚的重要陆桥。俄乌冲突的爆发进一步凸显了南高加索在能源通道与贸易捷径方面

① См. Коломойцева А. Ю. К вопросу об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основного экспортного трубопровода Баку-Тбилиси-Джейхан// Вестник РГГУ. Серия: Полит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9. №8. С.102-109; Минаков А. В., Эриашвили Н. Д. Актуаль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транспортных коридоров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Европой// Аудитор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2024. №3. С.222-230; Мамедов Л. Р.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равовые аспекты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и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нефтепровода «Баку-Тбилиси-Джейхан»//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 2023. №3. С.30-39; Роберт Р. Хэйворд. Проблем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Трансафганского газопровода и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25 ноября 2019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lumns/asian-kaleidoscope/problemy-bezopasnosti-transafganskogo-gazoprovoda-i-rossijsko-amerikanskije-otnosheniya/?ysclid=mhalgfmex0273712856>; W. Tang, E. Joldybayeva, “Pipelines and Power Lines: China, Infrastructure and the Geo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of Central Asia”, *Geopolitics*, 2023, Vol.28, No.4, pp.1506-1534; Michael R. Glass, Jean-Paul D. Addie, Jen Nelles, “Regional Infrastructures, Infrastructural Regionalism”, *Regional Studies*, 2019, Vol.53, No.12, pp.1651-1656; Marcin Kaczmarek, “Two Ways of Influence-building: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Europe-Asia Studies*, 2017, Vol.69, No.7, pp.1027-1046.

的战略价值；而第二次纳卡冲突后，阿塞拜疆与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显著上升，促使亚美尼亚加速“西向化”，并在战略上与俄罗斯逐渐疏离。与此同时，土耳其地位的提升及以色列-阿塞拜疆-美国的三边合作，进一步加剧了伊朗在地区事务中的边缘化与安全焦虑。^①俄罗斯学者安东·恰布林（А. Чаблин）指出，巴库与埃里温在走廊治理方式上仍存在根本分歧：亚美尼亚主张在走廊两端设立配备海关与边境管控的检查站；而阿塞拜疆则将其视为“自由运输动脉”，无需对运往纳希切万的货物进行强制检查。考虑到新丝绸之路沿线潜在的货运规模，只有在阿塞拜疆愿意向亚美尼亚支付过境费的情况下，埃里温才可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此外，该学者提到，安卡拉与巴库的“运输与物流雄心”也引发了伊朗的强烈警惕，德黑兰对任何绕过其领土的赞格祖尔走廊方案都高度敏感。在美国的推动下，赞格祖尔走廊的启动如今直接取决于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和平协议的正式签署。尽管该条约已在华盛顿会晤中由双方领导人草签，但在正式签署的道路上仍存在诸多政治障碍——其中包括阿塞拜疆需要修改宪法、删除与纳卡相关条款，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Nikol Pashinyan）希望将与阿塞拜疆的和平问题推迟到2026年之后，以应对2026年议会选举的国内政治压力。若反对派赢得选举，协议现有形式将可能作废，从而使赞格祖尔走廊继续停留在构想阶段。^②

除此之外，也有文献逐渐关注走廊在互联互通与大国博弈中的战略功能，但对其内在的治理机制，尤其是涉及主权权能协商、制度安排与跨国治理结构的分析仍显不足。这一不足不仅体现在早期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讨论中，也反映在对于走廊作为地缘政治空间的制度性建构研究中，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框架。早期研究有从文化地缘政治角度揭示走廊作为连接欧亚空间的政治象征意义的，^③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① 樊凡、吴冰冰：“南高加索地区秩序的重塑与关键通道的争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5年第5期，第47-73页。

② Чаблин А. Есть ли будущее у Зангезурского коридора как «Маршрута Трампа»? 11 сентября 2025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est-li-budushche-u-zangezurskogo-koridora-kak-marshruta-trampa-/?sphrase_id=238244531&ysclid=mh9z550jqs465078293

③ Meijer Hugo, “Merje Kuus, Geopolitics and Expertise: Knowledge and Authority in European Diplomacy”, *Europe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5, Vol.2, No.1, pp.159-161.

中提供了一种新丝绸之路走廊框架，从中可以观察中国的战略意图，但这些研究尚未深入考察走廊作为一种制度性治理结构，是如何通过主权威能的部分重构实现不同国家行为体间的权力协调与规则嵌入的。^①在此之后，区域政治与治理研究逐渐引入走廊治理（Corridor Governance）视角，强调走廊不仅是物质连通的节点，更是制度安排与多主体互动的政治过程。例如，在南部非洲的跨境走廊治理中，走廊的空间生产与治理模式是在国家间权力结构与区域合作机制相互作用中形成的。^②而近期对跨里海走廊的分析也显示，走廊建设过程中的利益主体参与、标准化协调与多方协调机制，是理解其作为战略空间的关键维度。^③因此，将相关的地理空间治理研究纳入走廊治理的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走廊主体间在制度安排与权力协调上的互动机制，而且有助于揭示主权部分协商、联盟重构与区域权力体系重塑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为主权协商型走廊治理的理论建构提供更为丰富的经验与分析框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走廊建设可能涉及临时性租赁、治权分区或主权协商，但相关研究仍较为零散，也并非针对欧亚地区。这些尚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为 TRIPP 这一新型政治经济空间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基于既有关于交通走廊的地缘政治与空间治理研究，本文进一步提出走廊治理三角（Corridor Governance Triangle）分析框架，用于系统刻画当代国际政治中交通走廊作为一种制度化空间治理单元的运作逻辑。该框架认为，在全球化深化与地缘政治竞争并行的结构性背景下，交通走廊本质上是由主权安排、互联互通利益与安全保障逻辑共同构成的治理结构，其稳定运行依赖国家行为体在上述三个维度之间形成的动态平衡与制度性协调。具体而言，走廊治理三角并非将走廊视为单一功能的基础设施，而是将其界定为一种通过主权威能重组、利益分配机制与安全承诺安排而被持续建构的政治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大国、小国与区域性组织围绕规则设定、风险分担与秩

① Fallon Theresa, “The New Silk Road: Xi Jinping’s Grand Strategy for Eurasi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2015, Vol.37, No.3, pp.140-147.

② Zajontz T., “Seamless imaginaries, territorialized realities: the regional politics of corridor governance in Southern Africa”, *Territ Politic Gov.* 2022, Vol. 12, No.8, pp.1073-1094.

③ J. Rentschler, A. Reinhardt, R. Elbert, D. Hummel, “The Trans-Caspian Corridor –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and transport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25, Vol.125,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66692325001024>

序塑造展开持续互动。通过引入该分析框架，本文将从结构层面、行为层面与认知层面三个维度，系统揭示外部大国介入、小国策略选择与地区秩序演化之间的互动机制，从而解释走廊政治如何在地缘竞争压力与制度合作需求之间实现相对稳定的治理均衡。

二、理论：走廊治理三角的概念、命题与操作化

在既有研究中，学界对交通走廊的分析虽然不断深化，但其理论化路径呈现明显的维度分化特征，不同的研究往往从功能性、制度性或安全性角度切入，对走廊的政治属性的刻画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一些学者从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发展研究的视角，将走廊理解为促进贸易流动与区域整合的制度化平台，强调互联互通带来的经济收益、基础设施外溢效应与区域增长潜力。^①在这一路径中，走廊被视为以效率与收益最大化为核心目标的经济治理工具。政治地理与区域治理研究则强调走廊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主权边界调整、制度嵌入与治理权能重组问题，指出跨境走廊往往意味着国家对部分空间控制权的制度性再配置，从而形成一种介于主权完整与功能性协商之间的混合治理形态。^②与此同时，安全研究与战略研究则从地缘政治竞争视角出发，强调走廊在军事投送、战略纵深与区域威慑中的功能，认为走廊的稳定性依赖大国提供的安全承诺或隐性安全保障，这在中亚、南高加索与东欧地区尤为明显。^③

然而，上述三类研究虽然分别揭示了走廊的经济、主权与安全维度，却往往将其割裂处理，缺乏一个能够同时解释主权调整、利益分配与安全承诺如何共同构成走廊治理结构的综合分析框架。基于此，本文提出走廊治理三

① Henry Farrell,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Vol.44, No.1, pp.42-79; *Infrastructure governance*, Paris: OECD Publishing, <https://www.oecd.org/en/topics/infrastructure-governance.html>

② B. Jessop.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p.186, p.198; T. Zajontz, “Seamless imaginaries, territorialized realities: the regional politics of corridor governance in Southern Africa”, *Territ Politic Gov*, 2022, Vol.12, No.8, pp.1073-1094.

③ A. Cooley, D. Nexon, *Exit from Hegemony: The Unraveling of the American Global Order*, New York, 2020, pp.110-136.

角分析框架，认为交通走廊的持续运作建立在多重制度要素相互嵌套、协同运作的治理结构之上。具体而言，走廊治理通常涉及三类相互耦合的核心维度。第一，主权协商（Sovereignty Arrangement）与功能性配置构成走廊治理的制度基础，体现相关国家在特定空间范围内通过谈判与制度设计，对控制权、规则制定权与治理职责进行重新划分与功能性重组，从而为跨境基础设施的稳定运行提供可预期的制度框架。第二，互联互通利益（Connectivity Benefits）构成走廊治理的经济激励，使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获得持续参与的物质动因。第三，安全保障（Security Guarantee）构成走廊治理的稳定条件，通过大国背书、联盟承诺或安全依附机制，降低走廊运行的不确定性。三者共同构成一个最小但完备的治理结构。缺失其中任何一环，走廊治理都将面临制度脆弱性、参与动机不足或安全失序的风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走廊治理三角并非对既有研究的简单综合，而是对走廊政治中多重逻辑交汇机制的结构性的提炼。

在走廊治理情境中，主权并非以绝对化或零和化的形式存在，而是呈现明显的功能性分解与空间性再配置特征，其核心表现为国家围绕特定跨境空间的治理权限、规则制定权与执行职责所展开的制度化协商与动态调整。与传统以排他性控制为特征的领土主权观不同，交通走廊往往涉及多国基础设施联通与持续性运营需求，因此更依赖一种通过谈判、契约与制度设计实现的治理权能配置机制。

主权协商与功能性配置是指，相关国家基于安全保障、经济发展或政治稳定等的综合考虑，在自愿、平等与互利的前提下，通过法律协议或制度安排，对特定空间内的管理权限与治理责任进行阶段性划分与功能性重组，从而为走廊的长期运行提供可预期的制度框架与外部支持。这一做法在国际组织合作、跨境基础设施共建以及区域一体化实践中均有所体现。

在具体制度形态上，此类安排通常表现为长期租赁、国际化管理、独家运营授权或联合监管等多样化形式，其内在逻辑并非削弱或放弃主权本身，而是通过对主权利能的结构性的重组与差异化配置，实现国家整体利益的优化组合。历史经验显示，无论是巴拿马运河的国际托管机制，还是苏伊士运河的多边管理模式，均反映出国家在高度战略化空间中通过制度化方式协调控

制权与开放性的实践路径，体现出主权运作方式的制度弹性与治理理性。^①在当代地缘政治竞争较为激烈的地区，体量相对有限或安全环境较为脆弱的国家，往往将此类制度工具视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一种政策选项，通过引入外部承诺与多边嵌入机制来增强安全保障与发展能力。在南高加索地区，这一治理逻辑在赞格祖尔走廊及 TRIPP 的制度设计中得到集中体现：相关国家并非简单转移或放弃主权，而是围绕走廊运行所需的管理权、投资权与安全责任进行协商性配置，在主权安排与安全-发展目标之间实现制度化权衡。正是在此意义上，主权协商与功能性配置构成走廊治理得以运作的制度基础，使交通走廊从单一国家排他性控制的领土空间，转变为多方参与、规则共构的治理空间。

作为一种空间治理结构，走廊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其联通性，正是这一特征使其成为不同国家、市场与制度之间的枢纽节点。互联互通利益由此构成走廊治理的经济核心，它不仅体现为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还体现为国家在区域与全球供应链中的战略位置的提升。对于小国而言，走廊能够显著改善交通与物流条件、增强外部市场接入能力、增加过境收入，并通过节点化嵌入，强化其在区域经济网络中的不可替代性。对于外部大国而言，走廊则是实现制度嵌入、规范输出与经济影响力扩展的重要工具。因此，走廊治理本质上也是一种“互联互通政治”（Connectivity Politics），即国家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与制度安排重塑权力分配结构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控制走廊的小国往往对主权采取更具弹性的理解方式，将主权视为可被战略性配置的资源，而不是不可触碰的边界。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跨区域走廊密集的关键地带，如中亚、南高加索以及中国与东盟的接壤地区，围绕走廊的制度创新与主权重组现象频繁出现。

与此同时，走廊的开放性与战略敏感性又使其运行不可避免地依赖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这一保障既可以体现为单一国家的军事存在或防御承诺，

^① See M. Sullivan, “The United States’ Impact on Panama and the Panama Canal: An Intervention Case Study”, *Journal of Student Research*, 2023, Vol.12, No.4; Mostofi Khosrow, “The Suez Dispute: A Case Study of a Treaty”,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957, Vol.10, No.1, pp.23-37; R. Sabel, “International Law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Through the Suez Canal”, in C. Lutmar, Z. Rubinovitz eds., *The Suez Canal: Past Lessons and Future Challenges*.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3, pp.135-145.

也可以表现为国家集团的集体安全安排、外交担保或制度化冲突管理机制。安全保障因此构成走廊治理的第三个支撑维度，它既可以表现为单一国家的军事存在与防御安排，也可以体现为国家集团的集体承诺、外交条约、冲突调停机制或制度化安全协作。

对于小国而言，在地缘政治高度不确定的地区环境中，通过让渡部分主权以换取外部安全背书，往往是实现战略存续与风险管理的必要选择。而对外部大国而言，走廊则提供了一种低成本、可持续的安全嵌入路径，使其能够在不直接承担全面责任的情况下实现地区影响力的制度化存在。因此，安全保障不仅是走廊运行的外部条件，更是走廊能够长期制度化存在的稳定机制，其形式越多元，承诺越制度化，走廊治理结构的稳健性也就越高。

既有研究表明，围绕跨国通道、关键基础设施与战略运输线路的安全安排，往往并不局限于单一国家的军事驻守，而是通过国家集团承诺、外交条约、联合巡逻、制度化冲突管理机制以及功能性安全合作等多种形式来实现的。^①例如，在欧洲地区，跨境交通走廊与能源通道的安全往往嵌入北约集体防御承诺、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以及双边军事协定之中，使走廊的安全不依赖于单一国家，而是由制度化联盟网络加以支撑。在中亚与高加索地区，走廊安全则更多表现为外部大国通过维和部署、冲突调停、边境监控或安全援助实现的“间接保障”，其本质是一种以走廊稳定为目标的安全嵌入过程。^②

此外，随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制度整合的深化，走廊安全还日益通过法律条约、国际组织授权与多边机制得以制度化，如过境安全协议、通道中立化安排或第三方监管机制，这些非军事化安全承诺在降低冲突风险、提升可预期性方面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正因为如此，走廊治理中的安全保障应被理解为一种涵盖军事、外交与制度性安排的复合结构，其功能并非单纯提供防御，而是在高度竞争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为走廊的持续运行创造可预期的

^① Barry Buzan,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6-26; Allison Roy, "Virtual Regionalism, Regional Structures and Regime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8, Vol.27, No.2, pp.185-202.

^② A. Cooley, *Great Games, Local Rules: The New Great Power Contest in Central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30-73.

稳定条件。

综合上述分析，交通走廊能够成为一种可持续的制度化治理安排，是因为主权协商、互联互通利益与安全保障在特定制度结构中形成了内在嵌合关系。主权协商为走廊提供制度空间，互联互通利益为走廊提供参与激励，安全保障则为走廊提供稳定预期，三者共同构成一个最小但完备的治理结构。若其中任何一维失效，走廊治理便可能陷入制度脆弱、利益不足或安全失序的困境。由此，走廊不仅是国家间资源流动的通道，更是权力、制度与安全逻辑交汇的空间节点，在地缘竞争条件下对地区秩序的重塑具有深远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走廊治理被理解为一种建立在主权协商、互联互通利益分配与安全保障承诺相互嵌套之上的制度化安排，其运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安全供给能力与制度可信度的持续性，因此，相关国家围绕治理权配置所作出的策略选择具有明显的条件性与情境依赖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两项可检验的分析假设：第一，当区域外大国能够通过制度化方式为走廊运行提供持续且可信的安全保障与规则承诺，并形成明确的投资、开发或管理框架时，走廊所在国家更可能通过协商性制度安排，对特定空间内的治理权限、管理职责与规则制定权进行功能性配置，以换取稳定的安全支持与互联互通收益，从而推动该区域外的大国在走廊治理中的制度性嵌入；第二，当既有安全供给方的承诺能力下降、制度可信度削弱，或其他国家提出更具吸引力与可替代性的安全与经济支持方案时，走廊治理的制度安排可能发生调整，原有治理主体的主导地位面临挑战，相关治理权限与制度控制权将出现重新配置甚至向其他国家转移的趋势。在实证层面，围绕主权协商与功能性配置、互联互通利益分配以及安全保障承诺三个相互关联的治理维度展开机制追踪，系统考察不同安全供给结构与制度安排如何影响走廊治理权的形成、稳定与变动过程，从而对上述假设进行经验检验，并揭示地缘政治竞争条件下交通走廊治理的制度演化逻辑。

三、案例研究：TRIPP 的形成机制与治理权重组

为进一步阐释走廊治理的内在机制，本章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 TRIPP 协议进行案例研究。该协议在纳卡冲突后的权力真空期内迅速发展，通过一

系列高度制度化的安排，实现了从地理通道向治理空间的转化。本章将分为两个部分：首先还原 TRIPP 从冲突遗产到美国主导倡议的形成路径，揭示其主权协商与制度嵌入的底层逻辑；其次讨论地区大国对治理权再配置的竞争与适应，从而展现走廊治理如何作为一种替代性装置，推动南高加索地区秩序的结构重组。

（一）制度嵌入的形成：从纳卡冲突遗产到美国主导的走廊倡议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简称“纳卡”）从 1988 年苏联后期开始，民族矛盾激化，成为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之间冲突的核心。随着苏联解体，纳卡问题逐渐演化为主权争议、人口迁徙与军事对峙的结合体。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多轮停火和谈判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①2020 年爆发的新一轮冲突，使阿塞拜疆夺回了部分控制权，2023 年进一步通过军事实力全面恢复对纳卡及周边地区的控制，导致原来居住在这里的亚美尼亚人大规模撤离。^②这一历史积累使得双方在走廊通道、互联互通、安全保障等问题上长期存在深刻的互不信任。

随着阿塞拜疆在 2023 年军事行动中取得优势，亚美尼亚的战略态势受到严重压迫。与此同时，纳希切万飞地与阿塞拜疆本土之间缺乏陆路连通，这一结构性弱点长期被视为该国国家安全与经济动态的短板。^③因此，通过一条穿越亚美尼亚领土的战略通道来连接阿塞拜疆本土与纳希切万，一直是阿方在谈判桌上的重要要求。

从外部环境看，2022 年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俄乌冲突爆发，俄罗斯战略收缩、欧盟调停无力、美国介入窗口出现。自 2022 年以来，俄罗斯在全球和地区的战略资源被大规模调用，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注意力与资源投入受到削弱。^④部分观察者认为，俄罗斯的战略重心向乌克兰与欧洲战线

① “Armenia and Azerbaijan: The Hard Road to a Lasting Peac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eptember 5, 2025. <https://www.crisisgroup.org/europe-central-asia/caucasus/armenian-azerbaijani-conflict/98-armenia-and-azerbaijan-hard-road-lasting-peace>

② Joe Penney, “Special Report: For Armenia, ‘Peace Is Established’” *PassBlue*, September 28, 2025, <https://passblue.com/2025/09/28/special-report-for-armenia-peace-is-established>

③ M. Ohanjanya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Peace or Pause?” *Clingendael*, September 25, 2025, <https://www.clingendael.org/publication/armenia-and-azerbaijan-peace-or-pause>

④ Rikard Jozwiak, “Why the OSCE Minsk Group Is Ending – And What Comes Next”, *Radio Free Europe*, September 2, 2025, <https://www.rferl.org/a/osce-minsk-group-legacy-end-future-implications/33519655.html>

倾斜，使其在南高加索地区难以深度介入。与此同时，欧盟及其他欧洲国家在调停纳卡冲突中的作用因内部政治分歧、外交能力局限与战略优先级调整而逐渐式微。^①在这种大国介入能力弱化的情况下，出现了新的战略空隙。

美国敏锐地捕捉到南高加索地区出现的战略机遇，并逐步实现了对该地区事务的制度性嵌入：其外交团队自 2025 年 3 月起多次派遣特使进入南高加索地区，参与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和平谈判的中间过程。^②在美国的外交斡旋下，双方于 2025 年 8 月 8 日在华盛顿签署包含通道条款在内的新和平协议。美国通过介入走廊治理，用战略基础设施作为进入俄罗斯传统影响区的新杠杆。而在南高加索事务中，土耳其历来是极具影响力的区域行为体。阿塞拜疆与土耳其的民族与宗教联系，使得土耳其在阿方外交战略中占据核心位置。在 TRIPP 设计阶段，土耳其发挥了关键的政治支持与协调功能。^③通过推动美国在南高加索的嵌入，土耳其不仅能获得更为直接的区域连接，更可借此将自身定位为横跨中亚-高加索-东地中海交通网络的枢纽力量。此外，TRIPP 路线设计意在通过亚美尼亚领土连接土耳其、阿塞拜疆和中亚，这正契合土耳其重振古丝绸之路通道角色、扩大区域影响力的外交意图。^④在这种地缘利益契合的背景下，土耳其愿意为美国提供政治与调解支持，助力其更易承接走廊开发与治理的角色。

综上所述，纳卡冲突的历史包袱、俄罗斯战略资源重心的转移、欧盟调停能力的衰落和土耳其对美国参与的推动，共同塑造了 TRIPP 得以突破传统区域权力结构的历史条件。2025 年 8 月 8 日，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Ilham Aliyev）与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什尼扬在华盛顿签署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及联合声明。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应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管辖权，并强调通过“不受

① M. Ohanjanya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Peace or Pause?” *Clingendael*, September 25, 2025, <https://www.clingendael.org/publication/armenia-and-azerbaijan-peace-or-pause>

② S. Holland, “U.S. secures strategic transit corridor in Armenia-Azerbaijan peace deal”, *Reuters*, August 7,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secures-strategic-transit-corridor-armenia-azerbaijan-peace-deal-2025-08-07>

③ J. Penney, “Special Report: For Armenia, ‘Peace Is Established’” September 28, 2025, <https://passblue.com/2025/09/28/special-report-for-armenia-peace-is-established>

④ M. Ohanjanya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Peace or Pause?” *Clingendael*, September 25, 2025, <https://www.clingendael.org/publication/armenia-and-azerbaijan-peace-or-pause>

阻碍的交通连接”，在阿塞拜疆本土与纳希切万之间建立通道，同时强调这种连接应兼顾对亚美尼亚的利益回报。该安排并非单纯的基础设施条款，而是一套将主权、经济与安全要素制度化嵌入走廊空间的治理机制。双方还共同呼吁关闭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和相关结构。具体而言，和平协议框架包括 17 项条款，涵盖边界划定、撤军、难民安置、外交关系正常化、交通通道与能源合作等方面的内容。通道条款成为协议的核心焦点之一，是重塑相互关系与区域互联互通的突破口。

联合声明在确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管辖权原则的同时，通过强调在阿塞拜疆本土与纳希切万之间建立稳定的联通通道，并要求该通道兼顾亚美尼亚的利益回报，从制度层面为走廊的跨境运行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也为后续主权权能的功能性调整预留了制度空间。由此，走廊在协议框架中被界定为一种可被治理的政治空间，而非单一国家控制下的交通设施。

在具体制度安排上，TRIPP 通过长期、独家且高度制度化的开发权与运营权设计，将基础设施治理权从主权国家的直接控制中剥离出来，使外部行为体得以在不改变主权归属的前提下获得实质性的制度控制权。据报道，美国获得了对赞格祖尔走廊的独家开发权，租赁期限为 99 年（部分报道为 100 年）。走廊将按亚美尼亚法律运作，美国将土地以次租赁形式交由一个财团负责铁路、能源、电信基础设施及其他通讯线路的建设与管理。^①在 TRIPP 的文本中，尽管给予美国独家开发权的安排被称为“租赁”（Lease/Sublease），但亚美尼亚强调其国内法中不存在“租赁道路”的制度安排，实际所给予的是一种“建设权”或“长期运营权”。正是这种法律上模糊化的制度设计，使主权在形式上得以保留，而治理权在实践中实现转移，从而形成典型的功能性主权协商机制，使走廊成为外部力量可持续嵌入地区秩序的制度支点。

与此同时，TRIPP 通过多模式基础设施整合与商业化运作机制，将互联互通利益转化为一种长期经济锁定结构。帕什尼扬在议会解释这一协议时指出，TRIPP 基础设施将建在亚美尼亚领土上，亚方保有对基础设施的主权监督权，保障其法律与国家利益不被完全剥离。走廊项目的设计还包括公路、

^① S. Holland, “U.S. secures strategic transit corridor in Armenia-Azerbaijan peace deal”, *Reuters*, August 7,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secures-strategic-transit-corridor-armenia-azerbaijan-peace-deal-2025-08-07>

铁路、管道、电力传输、光纤通信等多种基础设施整合，旨在形成一个多模式、综合性的交通与能源通道。^①美国则表示将以商业化原则运作这一通道，部分条款显示将有通行收费、基础设施收益分享机制，但目前公开资料尚不完整披露财团股权、收益分配与安全条款的细节。对于亚美尼亚而言，这种安排既意味着基础设施现代化与过境收益的提升，也意味着其经济发展路径将被深度嵌入走廊运行所塑造的区域网络之中。而对美国而言，商业化治理不仅降低了直接政治成本，也使走廊成为制度嵌入与影响力扩散的经济工具，从而将互联互通转化为可持续的治理资源。

更为关键的是，TRIPP 的走廊安排与既有地区秩序机制的解构同步推进，从而使基础设施治理与地区政治秩序重塑在制度上形成捆绑。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联合声明中呼吁删除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及其相关结构。^②之后，2025年9月1日，欧安组织部长级会议通过决议，正式宣布关闭明斯克小组及其代表机构和高层规划小组。^③欧安组织秘书长与主席均对该决定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推动地区稳定的重要一步。^④俄、法、美三方共署的明斯克小组自1992年成立以来长期担当纳卡冲突调解角色，其解散象征着传统和平架构的终结。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凭借自己在走廊开发、制度设计与协调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事实上接替了原本由明斯克小组承担的调解与治理功能，使基础设施治理成为一种新的秩序管理方式。走廊因此不再仅是连接空间的通道，而是转化为一种替代性治理装置，使外部大国能够通过基础设施安排实现对地区秩序的制度性嵌入，并在不建立正式安全同盟的前提下重塑权力结构。

总体而言，TRIPP 通过将长期开发权、商业化运作与秩序替代机制嵌入

① Sossi Tatikyan, "U.S.-Brokered TRIPP in the Armenia-Azerbaijan Deal: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ugust 18, 2025, <https://evnreport.com/politics/u-s-brokered-tripp-in-the-armenia-azerbaijan-deal-opportunities-and-risks>

② "Joint Declaration signed on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of Azerbaijan and Prime Minister of Armenia held in Washington",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August 9, 2025, <https://president.az/en/articles/view/69572>

③ Akbar Novruz, "OSCE Council of Ministers approves closure of Minsk process", 1 September 2025. <https://www.azernews.az/nation/246825.html>

④ «TRIPP – предмет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обсуждения с США»: Пашинян детализировал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с Трампом. 11 сентября 2025 г. <https://jam-news.net/ru/пашинян-о-проект-e-tripp-и-других-воросах-в>

同一制度蓝图，使走廊治理成为主权协商、互联互通利益与安全嵌入三种逻辑交汇的制度实践，这不仅解释了走廊何以成为外部大国介入南高加索的关键工具，也为后续机制分析提供了清晰的实证基础，从而使该案例能够直接检验“走廊治理三角”分析框架的解释力。

（二）治理权的竞争与再配置：地区大国的干预、受挫与适应

在 TRIPP 正式浮出水面之前，美国外交界与政策界围绕南高加索冲突治理路径的工具选择已出现显著的认知转向，并逐步形成一种具有共识性的判断，即冷战后长期依赖的多边调停机制，在当前大国对抗加剧与地区秩序碎片化并存的环境中，其制度效力与执行能力正呈现持续衰减趋势；而以关键基础设施为依托、通过长期制度化安排实现规则嵌入的新型治理工具，则更有可能在冲突后秩序重构阶段发挥稳定器与锚定器的作用。^①

首先，在对既有调停框架的反思层面，多份政策评估普遍指出，以明斯克小组为代表的传统调停机制，在制度逻辑上高度依赖大国共识、政治互信与多边协调，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及俄美关系结构性对抗深化之后，上述前提条件已难以维系，致使该机制逐渐演变为一种以冻结冲突而非解决冲突为主要结果的消极性安排。相关智库与欧盟研究报告多次强调，该框架在功能上“缺乏实质进展”，既未能推动持久政治和解，也难以在高强度地缘竞争环境下提供可执行的安全承诺。^②而欧安组织最终于 2025 年正式关闭明斯克小组的决定，则从制度层面标志着这一调停模式的阶段性终结，并客观上宣告传统冲突管理工具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基础已被削弱。^③

其次，在替代性治理工具的探索层面，大西洋理事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政策机构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的战略评估中，逐渐将南高加索置于更加广泛的地缘竞争语境之中，强调单纯依靠外交仲裁或政治谈判已经难以塑造稳定秩序。相较而言，通过对交通、能源与通信等关键基础设施实施制度化嵌入，将和平承诺、经济激励与安全存在锁定于具体的空间结构之中，反而能

^① See “Think Tank reports on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2022 - February 2024”, February 14, 2024,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documents-publications/library/library-blog/posts/tk-tank-reports-on-the-invasion-of-ukraine-2022-february-2024>

^② “OSCE Ministerial Council decision marks new step towards sustainable peace in the South Caucasus”, September 1, 2025, <https://www.osce.org/chairpersonship/596899>

^③ Ibid.

够绕开传统调停所需的高政治信任门槛，并借助技术规则、商业合同与长期运营安排，降低制度设计的政治可见度，从而提高政策的可持续性与执行确定性。^①在这一思路下，走廊逐渐被重新界定为一种“可治理空间”（Governable Space），其意义不再局限于物理运输通道，而是被赋予替代调停机制、承载秩序重构功能的制度性平台属性。正是在上述双重认知转型的推动下，美国最终选择以基础设施开发而非政治仲裁作为介入南高加索事务的核心工具，并通过高度制度化的合同安排，实现规则的长期锁定。其中，99年的超长期运营期限并非单纯的商业考量，而是旨在跨越至少两个政治世代周期，从时间维度上降低相关政策反复谈判的可能性，使制度安排获得事实上的路径依赖效应。同时，独家开发权的设置，则通过排除多方竞争与制度碎片化风险，在技术标准、安全安排与收益分配方面维持高度集中化治理结构，从而将走廊塑造成一个持续运作且难以被替代的关键制度节点。通过这种以基础设施治理取代调停机制、以规则嵌入取代政治承诺的制度设计，美国在形式上保持“低可见度”的同时，实现了“高稳定性”的长期存在，并由此完成了对南高加索地区秩序塑造方式的结构性再介入。

在 TRIPP 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后，地区大国与既有外部行为体并非缺乏反应，而是分别尝试通过替代方案、阻挠策略与规范介入来影响走廊制度的最终形态，但这些努力最终未能改变美国主导的制度路径。俄罗斯最早意识到 TRIPP 可能构成对其南高加索调停地位的结构性挑战，并在谈判初期通过外交与专家渠道提出将赞格祖尔走廊纳入俄控交通与安全体系的设想，试图延续 2020 年停火协议中俄方对交通通道的监督权安排。^②然而，在俄乌冲突导致其军事与外交资源高度受限的背景下，俄方既无法提供足以匹配美国投资规模的经济激励，也难以向亚美尼亚提供可信的长期安全保障，其方

^① John E. Herbst, Anders Åslund, et al., “Global Strategy 2022: Thwarting Kremlin aggression today for constructive relations tomorrow”, *Atlantic Council*. February 8, 2022.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report/thwarting-kremlin-aggression-today-for-constructive-relations-tomorrow>; Mankoff Jeffrey, “Prisoner of the Caucasus?: Toward a U.S. Strategy for the South Caucasu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2024, <http://www.jstor.org/stable/resrep65617>

^② Rikard Jozwiak, “Why the OSCE Minsk Group Is Ending – And What Comes Next”, *Radio Free Europe*, September 2, 2025, <https://www.rferl.org/a/osce-minsk-group-legacy-end-future-implications/33519655.html>

案因缺乏可执行性而逐渐被边缘化。

伊朗则在走廊谈判期间多次通过公开外交与双边磋商表达反对立场，强调任何外部力量的制度化存在都可能破坏地区安全均衡，并尝试以强化伊朗与亚美尼亚交通和能源合作作为对冲手段。但由于自身受到制裁和与国际金融体系的隔离，伊朗无法提供替代性的跨境通道融资方案。所以，伊朗的阻挠策略更多停留在安全话语层面，未能在制度设计上形成有效制衡。

欧盟虽然在规范层面持续倡导通过多边调停与边境监督机制推进和平进程，并试图将其既有的文职监测任务扩展为制度性参与渠道，但由于缺乏对走廊开发的投资权、控制权与安全承诺能力，其规范性介入未能转化为谈判桌上的实质筹码，最终被排除在核心制度安排之外。

正是在这一多方尝试失败的过程中，美国以唯一能够同时提供资金、技术、安全与制度框架的行为体身份完成了对走廊治理议程的垄断，并通过将 TRIPP 嵌入和平协议文本，使其制度安排与地区秩序重构形成不可分割的联动关系，从而在谈判阶段就完成了对既有调停体系的结构替代与对地区大国的制度性挤出。

在 TRIPP 协议签署并进入制度落实阶段之后，南高加索地区的权力结构开始显现出明显的政策反馈效应，即原有地区大国与外部行为体在未能阻止制度设计成形的情况下，被迫调整其战略姿态以适应新的走廊治理结构，而这种适应性反应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美国主导的制度安排，使走廊从一项协议条款转化为难以逆转的治理事实。

俄罗斯的反应最具代表性。尽管莫斯科在官方话语中对 TRIPP 协议表示欢迎，并试图将其纳入既有的区域合作与交通叙事框架之中，但明斯克小组解体与美国独家开发权的确立，已实质性地削弱了俄罗斯在南高加索作为安全提供者与政治调解者的制度性地位，使其传统的军事存在与外交斡旋失去了制度支点。^①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并未选择直接对抗新的走廊秩序，而是转而通过俄罗斯铁路公司及其子公司，寻求参与基础设施运营，以产业资本和技术网络实现一种“次级嵌入”，即在失去制度主导权的条件下，通过

^① Rikard Jozwiak, “Why the OSCE Minsk Group Is Ending – And What Comes Next”, *Radio Free Europe*, September 2, 2025, <https://www.rferl.org/a/osce-minsk-group-legacy-end-future-implications/33519655.html>

经济参与维系最低限度的战略可见性与影响力。^①这一策略本身即构成一种被动适应：它表明俄罗斯已默许走廊治理权力结构的转移，并试图在新制度内部寻找可生存空间，而非继续挑战其合法性。

然而，这种次级嵌入并未消解走廊运作层面的结构性张力，围绕主权可见性与通行自由的制度分歧仍然存在。亚美尼亚坚持在走廊两端设置具有边境与海关功能的检查站，以维持最低限度的主权象征；而阿塞拜疆则主张将其建构为完全自由的过境通道，拒绝对货物流通实施强制检查。美国在仲裁实践中明显倾向后者，试图以最大化运输效率释放走廊的商业与地缘价值，而这一立场在客观上削弱了亚美尼亚对走廊的直接控制能力。

与此同时，TRIPP 的经济激励机制亦高度依赖政治条件的兑现。只有在阿塞拜疆愿意支付过境费用并全面履行安全承诺的情况下，亚美尼亚才能从走廊中获得实际收益，这使得走廊的制度运作始终与和平协议的整体进程紧密绑定，而非独立运行。更为复杂的是，走廊的正式启动仍取决于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和平条约的最终签署，而该进程受到国内政治与宪制约束的多重牵制——阿塞拜疆需要通过修宪来删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条款，亚美尼亚则因民族主义压力与选举周期考量，试图推迟最终确认。这意味着走廊在短期内可能仍停留在“制度已锁定、实践待启动”的过渡状态，但其制度存在本身已难以被逆转。

伊朗的反应则体现为一种典型的逆平衡调整路径。伊方将 TRIPP 视为美国在其北部边界实现制度化嵌入的潜在平台，担忧走廊可能被用于军事与情报活动，从而压缩伊朗在南高加索与里海方向的战略纵深。^②面对这一威胁感知，伊朗一方面通过外交渠道反复强调外部军事存在的不可接受性，另一方面迅速推进与亚美尼亚在能源、铁路与电力领域的互联项目，以构建替代性通道网络来稀释走廊的战略集中度，同时加强与俄罗斯在地区事务中的政策协调，以地区合作对冲美国的制度嵌入。然而，这些举措更多体现为防

^① S. Holland, "U.S. secures strategic transit corridor in Armenia-Azerbaijan peace deal", *Reuters*, August 7,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secures-strategic-transit-corridor-armenia-azerbaijan-peace-deal-2025-08-07>

^② «TRIPP – предмет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обсуждения с США»: Пашинян детализировал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с Грампом. 11 сентября 2025 г. <https://jam-news.net/ru/пашинян-о-проект-e-tripp-и-других-воросах-в>

御性调整而非制度性替代，反映出伊朗虽具有反对意愿，却缺乏足以改变既有制度结构的资源与平台。^①

欧盟在该阶段的角色进一步被边缘化。尽管欧盟在此前数年间持续尝试通过调停、监测与规范性介入，推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关系正常化，但在 TRIPP 进入执行阶段后，欧盟既未获得基础设施投资权，也未能进入走廊治理架构，其影响力被压缩到事后评价与象征性支持，凸显出其在安全与秩序构建领域缺乏硬性杠杆的结构性困境。^②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土耳其在走廊制度稳定之后迅速转化为结构性受益者。安卡拉在谈判阶段通过中介外交为协议的达成创造条件，而在执行阶段则凭借地理位置与既有网络，使自身从南高加索的外围行为体转变为跨欧亚互联互通的枢纽节点，其战略收益在交通、能源与外交议程上同步扩张，构成了一种典型的“二阶受益”（**Second-order benefit**）模式——不直接掌握治理权，却可通过制度化联通获取长期红利。^③表 1 描述了上述主要外部行为体的走廊治理策略、制度工具与权力结果比较。

综上所述，TRIPP 协议并非一项孤立的交通或基础设施安排，而是一项典型的制度性走廊治理工程，其形成过程呈现出清晰而连贯的三阶段政策演化逻辑。在第一阶段，美国外交界通过将基础设施治理与和平调停功能相结合，主动以“走廊替代机制”的方式重构冲突治理路径，并借助独家开发权和超长期租赁设计，将自身嵌入南高加索秩序重塑的制度核心，从而在不直接挑战既有安全安排的前提下完成了对明斯克小组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的制度性挤出。在第二阶段，围绕走廊控制权展开的多边谈判表明，俄罗斯、伊朗与欧盟虽分别尝试以传统安全主导、地缘阻断或规范性调停等方式影响制度设计，但由于缺乏能够与互联互通、安全保障、主权协商三要素同时匹配的综合工具，均未能阻止美国主导的治理方案进入执行阶段，走廊由此在

① 樊凡、吴冰冰：“南高加索地区秩序的重塑与关键通道的争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5 年第 5 期，第 60 页。

② M. Ohanjanya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Peace or Pause?” *Clingendael*, September 25, 2025, <https://www.clingendael.org/publication/armenia-and-azerbaijan-peace-or-pause>

③ Sossi Tatikyan, “U.S.-Brokered TRIPP in the Armenia-Azerbaijan Deal: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ugust 18, 2025, <https://evnreport.com/politics/u-s-brokered-tripp-in-the-armenia-azerbaijan-deal-opportunities-and-risks>

谈判过程中完成制度锁定。而在第三阶段，当 TRIPP 进入实施与制度化运行的准备阶段后，其他行为体被迫调整自身策略，通过次级嵌入、逆平衡或功能性受益等方式适应新的治理结构，其适应性行为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走廊的制度地位，使其从一项政治协议转化为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治理事实。由此可见，走廊治理是一种能够通过制度设计、谈判排他与反馈适应逐步重构区域权力结构的治理机制，其运作逻辑正体现了本文提出的走廊治理三角框架中主权协商、互联互通利益与安全保障三要素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也揭示了外部大国如何通过基础设施治理，在不对称权力结构中实现制度嵌入与秩序重塑。

表 1 主要外部行为体的走廊治理策略、制度工具与权力结果比较

行为体	主张	制度工具	资源与承诺	结构性约束	谈判结果
俄罗斯	走廊纳入俄控交通与安全体系	军事监督、维和存在、交通管控	历史安全信誉、经济投入有限	俄乌冲突消耗、财政与信誉下滑	边缘化，转向经济性参与
伊朗	抵制外部嵌入，倡议替代通道	外交施压、能源与交通合作	地缘邻近、融资能力不足	制裁与金融隔离约束	话语性影响，未入核心设计
欧盟	多边调停与规范化治理	文职监测、调停机制、规范工具	规范合法性、缺乏硬实力	无投资与安全杠杆	被排除在核心治理结构之外
土耳其	区域中介与跨欧亚联通	外交协调、物流网络衔接	区位与运输体系优势	无直接治理权	间接受益者，获取联通红利
美国	基建嵌入式长期治理安排 (TRIPP)	99 年开发权、投融资、安全绑定、法律嵌入	资本、技术、安全、制度综合供给	政治风险相对可控	主导治理权，实现制度锁定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讨论：走廊治理的类型、条件与边界

从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来看，战略性通道与交通走廊长期以来都是大国实现制度化嵌入与主权博弈的关键空间，其治理模式往往反映出特定时代背

景下权力结构、国际法秩序与国内政治条件的综合约束。^①以巴拿马运河为代表的早期走廊治理模式表明,长期租赁或运行权可以成为外部大国维持持续影响力并反映军事与经济权力的重要制度工具。美国在 20 世纪对运河区的长期控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与行政存在,不仅构成了对当地秩序的深度嵌入,也为后来主权回归与秩序再构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然而,与这种建立在殖民或半殖民结构之上的治理模式不同,当代走廊治理已经被嵌入后冷战的国际法框架与多极化权力环境之中,外部力量的制度介入必须通过更复杂的法律表述、舆论管理与多方监督机制来实现其合法化。这使得以 TRIPP 为代表的新型走廊安排,虽然在形式上仍呈现“长期运行权+外方制度性介入”的结构特征,但在规范与治理逻辑上已经明显区别于传统的占据型模式。

与巴拿马经验形成对照的是苏伊士运河所揭示的另一种治理边界,即当主权协商被国内社会广泛解读为国家尊严的丧失时,走廊治理将触发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弹,并反向削弱外部力量的长期影响力。1956 年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不仅终结了英法的传统控制地位,也在政治上显著强化了埃及政府的民族主义合法性,这一经验表明,走廊治理能否稳定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国国内对主权协商的认知结构与政治接受度。^②相较而言,TRIPP 在签署初期并未引发群众动员或民族主义爆发,但亚美尼亚国内围绕历史记忆、国家安全与主权象征的争论依然存在,这意味着当代走廊治理虽然在制度设计上更为精致,却仍需通过法律安排、经济补偿与安全承诺来持续稳固其政治合法性。

如果进一步将 TRIPP 置于当代互联互通政治的语境中,其独特性则更加凸显。诸如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道以及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Trans-Caspian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Route)等项目,普遍采用多方投资与合作治理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合资建设、合同安排与利益分配实现连通性提升,而非将治理权长期固化于单一外部行为体之手。这类走廊的地缘政治

① Noel Maurer, Carlos Yu, “What T. R. Took: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Panama Canal, 1903-1937”,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08, Vol.68, No.3, pp.686-721.

② “The Suez Crisis, 1956”,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https://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53-1960/suez>

后果，更多体现为绕开特定大国的通道选择或结构性替代，而不是通过租赁化方式实现外部力量的深度制度嵌入。^①相较之下，TRIPP 所采用的制度设计——在保留亚美尼亚法律主权框架的同时，将长期开发与运作权交由外部大国主导——更接近一种“制度嵌入-租赁化”的混合形态，其目的并不仅是提升连通性本身，而是通过基础设施治理实现对区域秩序的长期介入。

这一制度安排的结果是，走廊治理成为外部力量重塑地区权力结构的重要杠杆。TRIPP 条款将一条关键过境通道的长期开发权授予美国，并伴随明斯克小组的正式终结，使传统地区大国通过多边调停与安全存在维持影响力的制度路径被实质性削弱。尽管俄罗斯仍可通过经济参与或功能性合作维持部分通道利益，但其在秩序塑造层面的主导权已被显著压缩。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将互联互通与安全、经济承诺相绑定，使基础设施治理转化为一种合法、长期且低可逆性的制度存在渠道，从而推动南高加索地区秩序由单一主导向多元嵌入结构演化。在这一结构中，美国成为主要制度性参与者，土耳其等地区力量则以二阶受益者的身份获得结构性红利，而欧盟与伊朗则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被排除在治理核心之外。

从小国视角看，TRIPP 的形成亦揭示了当代走廊治理的另一项关键条件，即主权功能性协商与国家生存策略之间的关系。亚美尼亚政府将走廊项目表述为在本国法律框架内运行的和平与发展工程，其背后反映的是在安全脆弱性上升与经济重建压力加剧的背景下，小国更倾向于通过制度化合作安排引入外部安全承诺与发展资源。这种选择并非被动屈从，而是一种结构性约束下的策略性调整，但其稳定性高度依赖于外部承诺的兑现程度与国内政治合法性的持续管理，一旦经济收益或安全保障未能兑现，国内反对力量与历史记忆仍可能对制度安排形成反向冲击。

赞格祖尔走廊所呈现的是一种发生在多极化国际结构、复杂法律环境与高度政治化舆论场中的新型走廊治理形态，其生成依赖于外部大国愿意长期制度嵌入、地区秩序存在结构性真空以及小国具备接受功能性主权协商的国内条件。与此同时，其运作边界亦清晰可见，即走廊治理一旦失去安全承诺、

^① S. Frederick Starr, Svante E. Cornell, *The Baku-Tbilisi-Ceyhan Pipeline: Oil Window to the West*,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2005, pp.17-38.

经济回报或合法性支撑，便可能迅速从秩序工具转化为政治风险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赞格祖尔走廊这一典型案例不仅有助于理解南高加索地区的秩序重构，也为分析当代国际政治中基础设施如何成为制度权力与秩序塑造的工具，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五、结论：走廊、主权与秩序的再配置

本文以赞格祖尔走廊的发展与 TRIPP 协议为案例，考察在后冷战、多极化与地缘竞争交织的国际结构中，交通走廊如何从单纯的连通性基础设施转化为重塑区域秩序的制度化治理工具。研究表明，当代走廊政治已不再仅仅体现为物流与经济效益问题，而是嵌入主权安排、安全承诺与制度权力配置的复合空间，其治理逻辑在大国竞争与小国生存策略的互动中逐步显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将走廊重新界定为一种制度化治理单元，并提出走廊治理三角分析框架，以揭示主权协商、互联互通利益与安全保障三要素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从而回应现有的探讨在基础设施政治与区域秩序研究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析断裂。

围绕这一理论框架，研究通过对 TRIPP 的形成过程与执行机制的追踪分析，揭示了外部大国如何通过基础设施治理实现对既有调停机制与地区权力结构的制度性替代。研究发现，美国并未以传统安全干预或多边调停方式介入南高加索事务，而是通过将走廊开发、长期运作权与安全、经济绑定，设计为一体化制度方案，在不直接挑战主权边界的前提下完成了对地区秩序的深度嵌入。这一制度性嵌入不仅挤出了原有的多边调停架构，也迫使俄罗斯、伊朗与欧盟等行为体在新的治理结构中调整其策略，从而形成了以走廊为核心节点的权力再分配过程。由此，TRIPP 不再只是一个交通项目，而成为连接和平进程、秩序重构与大国竞争的制度枢纽。

进一步的讨论表明，赞格祖尔走廊并非孤立或偶然的制度安排，而是当代走廊治理形态演化的一个集中体现。与历史上的巴拿马运河式租赁型治理或苏伊士运河所体现的民族主义反弹型路径相比，TRIPP 呈现出一种兼具合法性管理与制度嵌入特征的混合模式；与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道或中欧

铁路走廊等合作性互联互通项目相比，其关键差异在于外部力量获得了长期的、排他性的制度性运作权，从而使基础设施本身成为权力与规范嵌入的载体。这一比较视角揭示，走廊治理的效果并不取决于连通性本身，而取决于主权协商、安全承诺与制度嵌入是否形成可持续的均衡关系，一旦其中任一要素失衡，走廊即可能由秩序工具转化为政治风险源。

从更广泛的理论意义上看，本文的发现表明，基础设施正在成为当代国际政治中一种可见度低却稳定性高的制度权力形式，其通过长期运作权、法律安排与安全绑定机制，实现对区域秩序的静态重塑，而非通过剧烈冲突或显性干预完成权力转移。这一机制对于理解当前欧亚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围绕交通走廊、能源通道与数字基础设施展开的竞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本文亦强调，赞格祖尔模式的成立依赖特定的结构条件，包括地区秩序真空、外部大国的长期嵌入意愿以及小国国内对功能性主权协商的可管理性，因此其并不是可以简单复制的政策模板，而更应被视为一种需要在具体政治情境中审慎评估的治理路径。

本文通过将走廊置于主权、安全与秩序重构的交叉点，揭示了当代国际政治中基础设施治理的制度性意义，并为理解大国如何在不对称权力结构中通过空间治理重塑区域秩序提供了一个可复制但有边界的分析视角。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比较不同地区的走廊治理实践，以检验这一分析框架在不同政治与制度环境下的解释力，从而深化我们对基础设施政治与国际秩序变迁之间关系的理解。

（责任编辑 童 珊）

Аннот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Китая, России и США и построение глоб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Ян Цземьянь

【Аннотация】 Исходя из эволю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ландшафта со времён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Китай, Россия и США оказали глубок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нынешнее состояние глоб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и определяют её будуще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 областях во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экономики и технологий, а также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ускоряющейся тенденцией к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и, высокоинтенсивной, но малоконфликтн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ей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где экономика и технологии становятся основными областями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и постоянно растущим дефицитом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Китай, Россия и США по-разному оценивают эту ситуацию и реагируют на неё: Китай продвигает реформу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как внутри страны, так и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Россия делает упор на военное сдерживание и расширение диверсифицирован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а США проводят избирательную гегемонию, проводя политику «Америка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 тремя странами вращается вокруг борьбы между однополярностью и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ью, демонстриру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без полного разрушения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условиях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 Их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породила различные эффекты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и отражения в Европе,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е и Африке. На уровне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эти три страны имеют существенные различия в своих философиях и планах. Китай выступает за инклюзивное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е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основанное на принципе «создание до разрушения»,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Россия и США настаивают на принципе «разрушение до создания», при этом США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ы на сохранении своей гегемонии, а Россия — на разрушении западной гегемонии. В кратко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каждая из трёх стран будет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свои сильные стороны и изуча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о принципу «игры с нулевой суммой». В средне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они могут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тнош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конкурентов + ограниченных партнёров». В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им потребуется опираться на создание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и подъём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Юга для построения более справедливой и разумной системы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Китая, России и США; система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игра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глобальны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ландшафт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не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управления, текущие вызовы и пути оптимизации

Дэн Хао

【Аннотация】 Существующ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и оценки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находились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западн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привычно оценивая незападные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е механизм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спользуя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стандарты, операционную логику и ценностные ориентации западных либераль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Это привело к одностороннему или даже негативному восприятию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модели развития и будущих перспектив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ШОС). Будучи наиболе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ной незападной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ей платформой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Евразии пос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ШОС, в основе которой лежит шанхайский дух «взаимного доверия, взаимной выгоды, равенства, консультаций, уважения к различным цивилизациям и стремления к общему развитию», проложила новый путь управления,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щийся не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м, отсутствием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и

ненацеленностью на третьи стороны.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с незапад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 выходя за рамки единого западного стандарта оценки, предпринята попытка построить систему оценки незападных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механизмов,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пересматривая и оценивая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управления ШОС. В нём также объективно анализируются ре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стоящие перед ШОС как новым типом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е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оптимизированный пу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й логике её развития. Цель состоит в том, чтобы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истинную ценность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ШОС, предоставив основу для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построения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езапад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Незападная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шанхайский дух,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ее управление,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управления, оптимизированный путь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Д. В. Ефременко

【 Аннотация 】 С 2022 года евразийство углубило сво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концепц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дипломатии. Внутри страны оно предложило стратегию «сибиризации», выступающую за смещение духовного,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центра тяжести России на восток. Это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укрепл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потенциала развития путём создания нового центра в Сибири и изучения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ереноса столицы, что позволит устранить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дисбалансы в развитии.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оно утвердило статус России как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редложило теорию «мирово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направленную на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не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 демонтаж однополярной гегемонии и построение справедливой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ы. После февраля 2022 года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как руководящий принцип в идеях и инициативах ведущих евразийских учёных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ологи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в отношении внутренней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эволюционировало из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й парадигмы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ую основу, направляющую инициативы «поворота на Восток» и «Великой Евразии». В связи с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ю, вызванной возвращением Трампа в Белый дом,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школа подчёркивает, что, хотя диалог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ША может возобновиться, глубоко укоренившиеся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в интересах и ценностях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сохраняются. России следует сохранять свою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ую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ь и, используя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мые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м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м, ни в коем случае не допускать ухудш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Дальнейшее углублени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Китаем,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ШОС) и странами БРИКС является неизбежным выбором для России, позволяющим сохранить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ую автономию и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построению Великого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в постзападную эпоху.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европейский порядок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ибиризац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мира

«Поворот России на Восток 2.0»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рамках инициативы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

Цуй Хэн, Фу Синъян

【Аннот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развивалась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более десяти лет, от пассив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и после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2014 года д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й на «Сибирязацию» –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2.0». Эта стратегия, с её ключевыми положениями о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и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й уникальности, перестройк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изменени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го курса и развитии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ыходит за рамки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наложенных её прежним фокусом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н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становясь ключевым выбором для России в целях активного планирова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порядка. С 2014 по 2024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достигла значительн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в таких областях, как структура торговл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Азия стала её основным внешнеторговым рынком, и были достигнуты прорывы в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област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Однако она также выявила систем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такие как торговый дисбаланс, неравномер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и фрагментаци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2.0»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 согласуется с китайской инициативой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 превращая Россию из пассивного в активного участника. Обе стороны углублённо сотрудничают в таких областях, как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ная взаимосвяз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цепочках поставок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ей, а также синергия мор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ажнейшими примерами эт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тали связь между «Северным морским путём» и «Ледяным шёлковым путем», а такж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китайско-монгол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коридора. Их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ышли за рамки прост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 торговой взаимодополняемости и проект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ревратившись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направленное на перестройку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рядка Евразии, поиск нового пути равенства и инклюзивности дл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Евразии. Однако эт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по-прежнему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глубокими проблемами, включая уникальну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структуру России, внутренние когнитивные различия, сложную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динамику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и внешнее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со стороны Запад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ибирязац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и в странах Юж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в условиях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дефицит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и реструктуризация порядка

Чжан Цзяцзюнь, Би Хунъе

【 Аннотация 】 С 2020 года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ландшафт Юж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претерпел глубокие изменения. Столкнувшись с одновременным ослаблением влияния двух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доминирующих держав, России и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три страны Южного Кавказа – Азербайджан, Армения и Грузия – выбрали совершенно разные пут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В рамках 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й модели «дефицит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в крупной стране – реструктуризац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порядка –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в малой стране» сокращен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можно определить как пассивное сокращение, вызванное дефицитом мощностей вследствие истощения ресурсов из-за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сокращен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в ЕС можно определить как проактивное сокращение, вызванное дефицитом готовности в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оритета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интересов. Дальнейшее наблюдение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на фоне растущего дефицита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силы третьих стран осуществляли многоуровневые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интервенции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системного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я,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стратификации. Эти интервенции глубок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уют с глубиной ресурсной обеспеченности самих малых стран, совместно перестраивая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порядок, и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существовал ещё до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Используя ресурсную базу малых стран в качестве основной объясняющей переменной, можно выделить три различных пути адаптации: Азербайджан, используя свои двойные ресурсы –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е ресурсы и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магистрали, – добился активной адаптации со значительными результатами; Армения, не обладающая ключевыми ресурсами, была вынуждена прибегнуть к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ей диффузии,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ограниченной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адаптации; и Грузия, несмотря на

наличие транспортных магистралей, столкнулась с препятствиями со стороны сильных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х идентичностей,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наименьшей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адаптации. Эти три пути в совокупности демонстрируют системное влияние ресурсной базы 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х идентичностей н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пути адаптации и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малых стран в условиях дефицита предложения.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Дефицит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малых стран, ресурсная обеспеченность, Южный Кавказ, реструктуризация поряд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логика стратегии США в Зангезуре: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закрепление и реструктуризация власти в управлении коридором

Чжан Цзэмин

【 Аннотация 】 На фоне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и усиливающейс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коридоры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евращаются из простых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х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каналов в важные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струменты, позволяющие крупным державам закрепляться в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порядке. Соглашение 2025 года между Азербайджаном и Арменией об установлении мира и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предоставило США долгосрочные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ые права на разработку и эксплуатацию Зангезурского коридора, соглашение,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официально названное «Маршрут Трампа». Это мирн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делает Зангезурский коридор ключевым примером того, как внешние силы перестраивают порядок на Южном Кавказе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управлени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ой. Существующ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основном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ы на механизмах посредничества,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или военном балансе сил, уделяя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внимания эффектам пере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власти коридорами как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ми единицам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Практик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Зангезурским коридором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что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коридором отличается как от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колониального контроля, так и

от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проекто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транспорт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представляя собой промежуточную форму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го внедрения-аренды». Интегриру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политики транспортных коридоров,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о суверенитете и транспортной связности, а также предлагая аналитическую концепцию «треугольника управления транспортными коридорами», дан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суверенитете и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е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а также интересы транспортной связности и гаранти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ак взаимосвязанные аспекты управления. Также проводится анализ процесс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го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Маршрута Трампа». В этом конкретном процессе внешние державы,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долгосрочных прав на развитие, правового закрепления и механизмов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реобразуют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коридоры в устойчивые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структуры, тем самым ослабляя существующие посреднические структуры и перестраивая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порядок.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мал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талкиваясь с уязвимостью в сфе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давлением со стороны развития, обменивают ограничен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суверенитете на инвестиции и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формируя условную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ую структуру транзакц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Управление коридором, Зангезурский коридор,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порядок,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суверенитете, политика в сфере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Abstracts

China-Russia-U.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Interaction and the Building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Yang Jiemian

【Abstract】 Grounded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landscape, China,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hrough their strategic interaction in the fields of military security, economy and technology, and global governance, profoundly shaped the current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influence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its development.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configur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an accelerating trend toward multipolarity; great-power competition marked by high intensity but low levels of direct conflict; the rise of the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spheres as the principal arenas of competition; and a continuously widening deficit in global governance. China,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iffer in their assessments of and responses to this evolving situation. China seeks to advance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through coordinated efforts at home and abroad; Russia emphasizes military deterrence while expanding diversified diplomacy; and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banner of “America First”, practices selective hegemony.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 among these three countries revolves around the contest between unipolarity and multipolarity, displaying the dual features of rivalry without rupture and competition combined with limited cooperation. Their interaction has generated varying spillover and backlash effects in Europe, the Asia-Pacific,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At the level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three countries differ markedly in both concepts and strategies. China advocates an inclusive multilateral approach of “building the new before breaking the old”, whereas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end to favor “breaking before building”; the United States focuses on preserving its hegemony, while Russia concentrates on

undermining Western hegemony. In the short term, the three countries are likely to capitalize on their respective strengths while exploring possibilities for non-zero-sum cooperation; in the medium term, their relationship may evolve into one of “strategic competitors plus limited partners”; in the long term, only through the consolidation of multipolarity and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together with the pooling of global efforts, can a more just and equitabl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be built.

【Key Words】China-Russia-U.S. Strategic Interaction,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Great-Power Game, Global Strategic Landscape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from a Non-Western Perspectiv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Paths for Optimization
Deng Hao

【Abstract】 Existing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assessments of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have long been dominated by Western-centric discourse. They tend to evaluate non-Western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ccording to the institutional standards, operational logic, and value orientations of Western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reby producing one-sided understandings and even negative characterizations of th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development model,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non-Western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platform on the Eurasian continent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he SCO, with the “Shanghai Spirit” at its core, namely mutual trust, mutual benefit, equality, consultation, respect for the diversity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pursuit of common development, has pioneered a new model of governance characterized by non-alignment, non-confrontation, and non-targeting of third parties. From a non-Western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seeks to transcend a singular Western evaluative yardstick by attempting to construct an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non-Western multilateral mechanisms, and on this basis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re-examin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SCO’s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t also offers an 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facing

the SCO as an experiment in new-type multilateralism, and proposes optimization paths consistent with its own developmental logic. The aim is to restore the SCO's true value and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 Key Words 】 Non-Western Perspective,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he Shanghai Spirit,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Paths

Current Issues and Prospects of the Eurasianist Perspective in Russian Political Studies after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D. V. Efremenko

【Abstract】 Since 2022, Eurasianism has undergone further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in both national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and foreign-policy visions. Domestically, it has advanced a “Siberianization” strategy, advocating an eastward shift of Russia’s spiritu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By building new hubs in Siberia and debating the possibility of relocating the capital, this approach seeks to strengthen national securit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capacity while correcting regional imbalances. Externally, Eurasianism has framed Russia as a “civilizational state” and proposed the “World Majority” concept, aiming to unite a broad range of non-Western countries, dilute unipolar hegemony, and promote a more just multipolar international order. Since February 2022, ideas and initiatives advanced by leading Eurasianist figures in Russian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cerning Russia’s domestic governance and foreign policy indicate that Eurasianism has evolved from an initial civilizational research paradigm into a strategic foundation guiding Russia’s “pivot to the East” and the project of “Greater Eurasia”. In responding to the uncertainty generated by Donald Trump’s return to the White House, the Eurasianist school emphasizes that even if Russia-U.S. dialogue resumes, deep-seated divergences in interests and values will persist. Russia should maintain strategic resolve: while leveraging opportunities arising from

Russia-U.S. interactions, it must never do anything at the expense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Deepening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the BRICS countries remain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Russia to preserve strategic agency in the post-Western era and to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Greater Eurasia.

【Key Words】 Eurasianism, European Security Order, Siberianization, a Civilizational State, the World Majority

Russia's "Pivot to the East 2.0" and Prospects for its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ui Heng, Fu Xingyang

【Abstract】 Over more than a decade of evolution, Russia's "pivot to the East" strategy has developed from a passive diplomatic adjustment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2014 Ukraine crisis into a national strategy of "pivot to the East 2.0," centered on the "Siberianization" of Russia. With the reshaping of Russia's civilizational distinctiveness,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reorientation of foreign poli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as its core propositions, this strategy has broken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its earlier, primarily foreign-policy-level manifestation and has become a key choice through which Russia proactively plans it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eeks to reshape the order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From 2014 to 2024, Russia's "pivot to the East" achieved notable results in such areas as trade structure, energy coope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sia became the core market for Russia's foreign trade, and China-Russia cooperation in energy infrastructure made major breakthroughs.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systemic problems also emerged, including imbalances in trade structure, uneven development in the Far East, and fragmented infrastructure. Russia's "pivot to the East 2.0" is highly strategically aligned with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ussia has shifted from a passive participant to an active co-builder, and the two sides have carried out in-depth cooperation in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collaboration across the entire energy industrial chain, and coordination in the fields of the marine

economy and security. The alignment between the Northern Sea Route and the Polar Silk Road,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a-Mongolia-Russia Economic Corridor, has become a major highlight of this cooperation. Their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have gone beyond economic complementarity and project-based collaboration, and have been elevated into a form of strategic cooperation aimed at reshap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thereby exploring a new path of equality and inclusiveness for Eurasian regional integration.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bilateral cooperation still faces deep-seated challenges, including Russia's undiversified economic structure, internal cognitive and policy differences, the complex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the Asia-Pacific, and external interference from the West.

【Key Words】 Pivot to the East,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Russia Relations, Siberianization

Strategic Adjustments of the Three South Caucasus States amid Great-Power Geopolitical Rivalry: Supply Deficits and Order Restructuring

Zhang Jiajun, Bi Hongye

【Abstract】 Since 2020, the geopolitical landscape of the South Caucasus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As the influence of Russ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he two traditional dominant powers in the region, has receded simultaneously, Azerbaijan, Armenia, and Georgia have adopted markedly different paths of strategic adjustment.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great-power supply deficit-regional order restructuring-small-state strategic adjustment", Russia's retreat in supply can be defined as a passive contraction caused by a capability deficit stemming from the drain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while the EU's retreat in supply can be understood as an active compression triggered by a deficit of willingness under the priority given to energy interests. On this basis, it could be observed tha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widening supply deficits, third-party actors have carried out structurally embedded intervention with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through systemic penetration, maintenance of presence,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other means.

This intervention has interacted deeply with the resource endowments of the small states themselves, jointly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and in fact began prior to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By taking the resource endowments of small states as th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 three differentiated paths of adjustment could be identified: Azerbaijan, relying on its dual endowments in energy and transit, has achieved proactive adjustment with notable results; Armenia, lacking key resource endowments, has been forced into multidirectional dispersion, with limited adjustment effectiveness; and Georgia, though possessing transit endowments, has fallen into a predicament of constrained adjustment due to its strong institutional identity preferences, producing the weakest results. Together, these three paths reveal the systematic impact of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institutional identity preferences on both the trajectories and effectiveness of small-state strategic adjustment under conditions of supply deficit.

【Key Words】 Supply Deficit, Small-State Strategic Adjustment, Resource Endowment, South Caucasus, Order Restructuring

The Political Logic of U.S. Maneuvering over Zangezur: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and Power Reconfiguration in Corridor Governance

Zhang Zeming

【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creasing world multipolarization and intensifying regional competition, transport corridors have gradually evolved from mere logistics and economic routes into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carriers through which great powers embed themselves in regional order.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Agreement on Establishment of Peace and Inter-State Relations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and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signed in 2025, the United States obtained long-term exclusive rights to develop and operate the Zangezur Corridor. This arrangement was subsequently officially named the “Trump Route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Prosperity”. The peace agreement has turned the Zangezur Corridor into a key case through which external powers seek to reshape the order of the South Caucasus by means of infrastructure

governance. Existing studies have mainly focused on mediation mechanisms, energy politics, or military balance, while paying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power-redistributive effects generated by corridors as institutional units of governance. The governance practice of the Zangezur Corridor shows that contemporary corridor governance is neither identical to traditional colonial-style control nor equivalent to multilateral cooperative connectivity projects; rather, it exhibits an intermediate form of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through lease-based governance”. By integrating the literature on corridor politics, sovereignty bargaining, and connectivity studies, and by propos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corridor governance triangle”, this article treats sovereignty bargaining and functional allocation, as well as connectivity interests and security guarantees, as coupled dimensions of governance, and conducts a process-tracing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negotiation, and institutional operation of the “Trump Route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concrete process, external great powers have transformed the transport corridor into a sustainable institutional presence through long-term development rights, legal embeddedness, and mechanisms binding security and economics together, thereby weakening preexisting mediation structures and reshaping regional order. At the same time, under conditions of security vulnerability and developmental pressure, small states have exchanged limited sovereignty bargaining for investment and security commitments, thereby forming a conditional structure of institutional transaction.

【Key Words】 Corridor Governance, Zangezur Corridor, Regional Order, Sovereignty Bargaining, Infrastructure Politics

《俄罗斯研究》来稿须知与注释示例

《俄罗斯研究》多年来形成了以扎实的俄罗斯欧亚国别与区域研究为依托，有效服务中国外交政策的办刊特色。旨在刊发各领域、各学科中外学者在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尤其欢迎融经验性、理论性、时效性于一体的、有中国思想和中国关怀的研究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的论文，为推动国内外学界沟通，尤其是国内学界、青年学者的发展提供平台。常设议题主要包括俄罗斯及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国关系研究、国际组织研究等。本刊议题不囿于上述方面，诚挚欢迎有创新性的高水平成果向本刊提供新的议题引领。

一、来稿须知

1. 请使用信箱投稿或在线投稿系统：

投稿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在线投稿系统：<http://ru.ecnu.edu.cn>；

电话：021-62233816；传真：021-62238113。

2. 来稿字数 2 万-2.5 万字，需有 300-500 字的内容提要，3-5 个关键词。

3.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稿件一经采用，会向作者支付稿酬，邮寄样刊。

4.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二、注释示例

1. 中文文献

(1) 著作：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 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66 页。

(2) 期刊文章：杨洁勉：“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18 页。

2. 英文文献

(1) 著作：R. Sakwa, *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Cold War Crisis of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0.

(2) 期刊文章：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Vol.43, No.4, pp.7-8.

3. 俄文文献

(1) 著作：Замятин Д. Н. Культура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М.: Знак, 2006. С.86.

(2) 期刊文章：Лукьянов Ф.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Т.16. №2-3. С.175.

完整版本请参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s://rus.ecnu.edu.cn/>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26年第2期(总第258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刘 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http://ru.ecnu.edu.cn/>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ISSN 1009-721X



公开发行

定价：30.00 元